

前 言

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城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编写出一大批家史、村史、社史、厂史以及各种专题史。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解放前北京地区广大劳动人民，一方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饱受残酷的剥削和痛苦的煎熬，有着辛酸苦难的经历；另一方面，他们也从未屈服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这些史料，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

年轻一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任重道远。青年人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的苦难经历，经常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才能不忘过去，永不忘本；才能热爱今天，创建将来。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光荣的革命传统，才能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继续艰苦奋斗，肩负起接班人创立共产主义大业的重担。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等这些活教材，经常不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编写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是思想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

HIC(3/08)

基于这种认识，我們特从本市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中选出一部分，編成《北京四史丛书》，陸續出版，作为北京市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材料。由于編写者水平所限，加上这项工作在目前还是个新课题，这套丛书的缺点与错误一定难免。我們热烈地期望广大讀者能把讀后意見告訴我們，以便今后把这套丛书編得好些再好些。

編 者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

目 录

- 前仆后继創江山(1)
——小耕堡人民革命斗争史話
- 苦难的“神駒”換新天(36)
- 一場血債官司大兴县长子营人民公社社員 刘宝善(53)
- 苦儿恩仇記平谷县城关人民公社社員 魏承启(73)
- 一件破棉袄.....
..... 昌平区兴寿人民公社兴寿大队副大队长 赵玉宽(87)
- 闖出苦海去通县小务人民公社社員 卢秀荣(95)
- 血泪四十年大兴县凤河营人民公社社員 馮殿荣(106)
- 喜翻身，永世不忘本...通县小务人民公社社員 刘馮氏(119)

[附录]

- 土皇帝——“南霸天”(130)
——海淀区羊坊店恶霸地主刘喜亭罪恶紀实
- 橫霸“东冉”三十年(140)
——龚家地主剝削史

前仆后继創江山

——小耕堡人民革命斗争史話

概 述

小耕堡村是北京郊区通县牛堡屯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大队下有三个生产队。

小耕堡村周围地势平坦，村里树木丛生，是一个美丽的平原村庄。

全村座落南北稍长，成一长方形。村里有横贯东西的中、后两条主要干街，村里一半多人口住在这两条街上，另外还有一个前半截街，南北有几条小通道。全村的住房面积約計二百多亩。

全村有一百三十四戶人家，共有六百二十四口人，男女劳动力二百四十七个。村里居民都是汉族。姜、王、刘、路、白、凌是主姓，其次还有馮、李、高、徐、營姓等。

村里的土地比較肥沃，耕地面积有一千九百三十二亩。村西除有小块沙丘和葦塘外，其余大部是黑土地；村南是带沙碱性的黄土地；村东的地多是两合土。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公社統一领导规划下，小耕堡村和其他村一起大搞水利，

連接了“通慧灌渠”，挖了斗、支、毛等許多渠溝，並開出了排水防澇的風港河，形成一個防旱防澇的水利網。

村里主要是種植大田作物，如小麥、黃豆、玉米、白薯、棉花，此外還種有高粱、谷子、黍子和大麥，並種少量蔬菜自食。

村里主要从事粉房副业，每个生产队都設有一个粉房。其次是养猪，目前队上养的和戶上养的猪已达到二百六十多头，平均每戶两头猪。大牲畜的繁殖一九六三年又有所增加，自殖大牲畜成为村里增加大牲畜的主要途径之一，目前全村共有大牲畜三十五头。全村一九六三年养羊九十多只。

村里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現有一所初級小学，还有冬閑时的民校。目前全村有高中生三人，初中生二十多人，高小生九十多人，适龄儿童基本上都入学了。在入学学生中，百分之八十是貧下中农的子弟。

小耕堡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村庄。这里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

据传说，早在明朝以前就有了这个村子，因为这村位于大耕堡（过去叫东耕堡）以西，当时称为西耕堡。明朝成化年間，全村有六十戶人家。那时这一带是一片不毛之地的沙滩，村里的人们在这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艰难地挣扎着。到了清朝，村里的人家减到二十八戶，門、溫、梁、李等当时的主姓人家，死的死，逃的逃，逐漸絕迹了。清朝光緒十六年閏发了一次大水，淤下了一层青泥。从此，这一带的

地质才改变成比較肥沃的土地。到民国初年，村里人口增加到九十多戶。但这一帶地势低洼，当时的凉水河經常泛滥，軍閥政府只顧搜刮民脂民膏，毫不关心人民的利益，水利长期失修，使这一帶地区十年九涝，加之軍閥連年混战，这一帶人民常年处在十分痛苦的生活里。日本帝国主义占領这一地区后，人民遭到极其野蛮的残暴蹂躪，陷于暗无天日的深渊里。

小耕堡人民和全国各地农村的人民一样，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各种压榨并没有屈服，他們曾經自发地采取了种种斗争形式进行过反抗，但在沒有党的领导之前，各种斗争的結局都是失败的。当广大农民知道共产党是解放劳苦大众的救星的时候，他們迫切地渴望着救星的到来，领导他們求解放，鬧翻身，見天日。一九四五年八月，党领导下的通县地下临时政府派人来到了小耕堡村，組織和领导村里的人民开展了各种革命活动，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此，小耕堡人民的革命斗争走向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通县，小耕堡人民从此得到了新生。

解放后，小耕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康庄大道。村里人民在完成了土地改革、巩固村政权、鎮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遗留任务之后，紧接着就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走上了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党的方针政策在小耕堡各项工作中开了花結了果。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小耕堡人民，目前正在坚决地高举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

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奋勇前进。

一、封建枷鎖压在身

农民苦难似海深

“黃連苦，比不上旧社会貧苦农民的生活苦！”这是在小耕堡忆苦思甜会上貧下中农們对旧社会的控訴。从旧社会过来的貧苦农民，誰沒有一段比黃連更苦的血泪史？

解放前，村里穷苦人为了維持全家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的戶給本村和外村的地主、富农扛长活。地主富农們为了加重对长工的剝削，就在一起聚会，共同議謀压低长工工錢，規定最高的工錢每年不超过三石棒子，最低的才一石二斗，并揚言：“爱干就这么多，不干就走！”有些年輕力壮的农民不服这口气，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外村去找活扛。有些貧苦农民想到到外村也找不到高一些的活价，只得忍受本村地主富农的苛刻的剝削。貧农刘广志一九四二年給本村富农姜士富家扛活，工錢每年三石，第二年富农姜士富要減五斗，刘广志不干，但全村的地主富农都勾結在一起，到哪家工錢也是一样。他沒有办法，只好再找到姜士富家。富农姜士富更加勒索，只給一石五，刘广志为了一家人的“活路”，只得忍气吞声地答应下来。貧农刘朝宗在地主姜臣奎家的工錢更低，每年只掙一石二斗。村里的地主富农們总嫌挤不干长工們身上的血汗，千方百計想尽办法增加长工的劳动强度。地主白玉昆家有一百九十亩地，雇了三个长工。一个长工种三四十亩地就十分劳

累了，但在他家的长工每人必須种六十亩地。他把长工的活茬安排得很紧，規定每个长工每天必須耕完三十亩地（一般的只能耕十亩），因此，每天就硬逼着长工起早摸黑，来完成他的“定額”。他为了不让长工們有一点休息的机会，除了給他們派下地里的活茬外，还准备好一些“零头活”。长工們在地里劳累了一天，刚到家里，他就又把长工支到場里或家里去做“零头活”。这“零头活”往往比地里活还重，因此，长工們都叫这活为“大头”。在对待长工的生活上，地主富农們也是残酷无情的。地主白玉昆家的长工，一般早飯都是給吃稀的，只有中午才让吃頓干飯，晚飯大多吃不上新鮮飯，多是把早飯和午飯剩下的掺到晚飯里。有时也給点菜，但菜里很少見到一点油星，多是水熬菜攔把盐。有一次过节，他“优待”了一下长工，給包了一頓餃子，但餃子餡却是一团青菜疙瘩，里面既沒放油，又沒攔盐，結果，长工們沒吃多少就吃不下去了。飯后，他还說风凉話：“怎么大伙吃剩下这么多！”此外，地主富农打罵长工的事更是常見。如外乡逃难来的楊套包子（他从小就給地主家扛活，不得脫身，地主給他起名叫套包子，即牲口脖子上拉套的东西）給富农姜連弟家扛活，經常挨打受罵。有一次他进行反抗，姜連弟利用自己当伪保长的权势，把他送进伪县府押起来，搶走了他家的东西，并把他家里人赶出了村。就这样，他为富农姜連弟家辛辛苦苦干了几年，最后落了个家破人散。

地主富农們为了把长工們长期捆鎖在自己家里做牛做

馬，还利用各种圈套欺压貧苦农民。貧农苟保文給地主白玉昆家扛活，家里沒吃的，这时地主白玉昆假装好心腸借給他三石棒子，每石年利五斗。到年終算帳时，苟保文把全年掙的工錢都給了他，还欠下了一石五斗的債息。苟保文无法償还，只好第二年还給他家扛活以頂債息。就这样，长工一年年地为地主富农卖苦力，地主富农家的日子越过越兴旺，而穷苦人最后不得不落得个“場光地淨衣裳破，要穿衣服还得扛活”的惨景。在封建地主阶级統治下的社会，有多少穷苦农民被迫走这样一条路！

还有許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户，主要依靠租种地主家的土地为生。全村有三十三家租种过地主的地。当时租的土地，主要是南义閣大地主刘瑞堂的。刘瑞堂是全县聞名的大地主，家有千間房万亩田，周圍几十里的地方都有他家的土地和财产。他家的土地除小部分自己雇工耕种外，絕大部分都是出租給农民。他出租的地，除收租外，什么也不負担。租地的人除交租外，还得替他交稅粮。大地主刘瑞堂出租的地多半土质很瘦，每年每亩只能收一石二斗多粮食。但农民每年交給他的地租竟达到六斗之多，占收入的一半。地主收租时，多是采取“粮食不值錢时要錢，錢不值錢时要粮”的办法，佃戶实际交租达到收入的一半以上。另外，每亩地还得交官粮二斗，向村里交杂稅（“花銷”等）二斗（最高达到三斗）。在交租时，还受“冲斛”之害，本来应交六斗，但在量时，地主家斗大，实际交六斗五升。这样，佃戶交完租子、官粮、杂稅和遭受“冲斛”的搜刮之外，所剩无几。一

年辛苦到头只能剩把谷糠、柴禾。如果遇上天灾，佃户仍得如数交納，交不起，就得傾家蕩产。如貧农刘奎在一九三六年曾租种了大地主刘瑞堂二十二亩地，那年遇到大水灾，沒有获得一点收成，可是地主硬逼着要租子，刘奎沒法，被迫把自己心爱的六亩二分土地頂了租子，使得全家生活更加艰难。

全村多数的穷苦农民，每年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受到高利貸的剝削，每年借錢借粮的，达到全村一半人家。那时有錢人家尽量抬高債息，一般都是年息五分。这种重利盘剝，年复一年，越积越多，債務捆住了穷苦农民的身子，使他們傾家蕩产，失去自由。貧农苟保文就是因为借地主白玉昆的粮食还不起，被迫給他家扛活的。有的农民被迫把自己仅有的几亩地頂了債，貧农刘君清因为欠債达十三石之多，就把自己仅有的五亩地卖掉了。貧农姜連珠卖了地又卖了房，仍然还不上地主白玉昆等人的債。白玉昆等債主就硬搬了他家的柜子、条案、炉子，揭了他家的鍋，甚至把碗筷也拿走了。弄得一家四口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乞討为生。

村里的穷苦农民除了受当地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剝削外，还受到反动政府和軍队的欺詐和迫害，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統治时期，日寇利用法西斯的保甲制度把全村人民捆鎖在村里，不得随意出动。五次“强化治安”和惨无人道的“清乡”之苦，更使村里人們成天处在黑暗恐怖之中。日寇强征的各种繁重的捐稅，使村里的穷苦人們簡直

无法生活下去，就連村里的中农人家，生活也是动蕩不安的。美蔣反动統治时期，村里的反动階級和反动政府进一步勾結起来，抓兵、拉伕和无端勒索的苦难，更是层层加在村里的穷苦人民的身上。如村里的孤苦伶仃的拐三奶奶，仅有二亩地就硬逼着要她拿出六斗粮食，这位老人走投无路，便投井自杀了。又如貧农刘万华，被迫給地主頂了壮丁，儿子刘景兴被抓兵拉走了，弄得一家人妻离子散。国民党的反动軍隊还常常来村騷扰，借故进行敲詐，有一次就强征了每家一套衣服，吃喝、打罵更是常事。

在当地的封建势力的盘剝和反动政府的迫害下，村里人民生活之苦是可想而知了。那时，全村有一半以上人家是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不少人家連半年粮都吃不上，豆皮、麸子、高粱糠、野菜、柳树芽、杜树花、树皮等都成了人們的主食。穿的更談不上，多数穷苦人家的衣服是补釘搽补釘，甚至衣不蔽体。貧农刘君清，家有五口人，他从十四岁到四十岁一直給地主家扛活，家里租种着大地主刘瑞堂十四亩地，但每年还要借外債三四石，全家人成年过着沒吃沒穿的生活。有一年刚过大秋，全家人不得不以榆树叶充飢，这年过年时，只吃上了一頓高粱面“餡饅”。大年初一，他媳妇拿着小瓢到地主家借了一小瓢玉米面，回来掺上麸子和野菜，蒸了一鍋飯，每人只吃了个半飽。家里人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棉改单、单改棉。大儿子刘芝，在十二岁时从旧衣摊买了一件麻袋褲，穿了好几年，最后縫补得不成样子了，又小又瘦，可还得勉强穿在身上。又如貧农刘景兴的媽因丈夫被

抓走当壮丁，自己带着几个孩子，无家可归，到处流浪要饭吃，在临产前还住在村里的破碾棚里，最后逼得她实在无法，就把两个大孩子送给亲戚家，自己携带着小女儿重新嫁了人。贫农秦凤岐，是一个很强壮的劳动力，成年在外给地主家扛活，共扛了三十二年，但他所挣得的工资还不够维持一家三口人的半饱生活，在生活困难时，妻子女儿不得不沿街乞讨，家里始终房无一间，地无一垅。

贫农姜元奎一家人没有房子住，就在一家地主的破庙里安身。他们怕地主发现，每天总是等星星出来以后全村人都睡着了才进庙，天不亮又得离开。有一天下大雪，实在冻得受不了，姜元奎到外面拾了点柴禾，火刚点着就被地主发现了。地主诬说他偷柴禾，就借机把他一家赶到冰天雪地中。

村里的穷苦人们，不仅物质生活很苦，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地主剥夺了。全村除了地主富农和少数中农供子女上学外，绝大多数贫下中农根本没有钱供自己的子女上学。这种文化上的落后，正是村里贫苦人民在旧社会政治上无权和经济生活低下的直接反映。

小耕堡的穷苦农民，在这苦难岁月中，迫切渴望着救星共产党的来到，领导他们起来闹翻身，求解放，获得新生。

二、穷哥们组织起来 大闹起减租减息

日寇投降后，小耕堡人民和通县各地人民一样，刚刚摆

脫了日寇的殘酷蹂躪，却又重陷于美蔣反動派的血腥統治之中。這時我黨領導下的通縣革命力量，成立了通縣地下臨時政府，並正式建立了縣支隊。同時把全縣劃成八個區，每個區都建立了區委，並組織了精悍的武裝區小隊。當時牛堡屯一帶為五區，小耕堡村屬五區管。通縣臨時政府成立後，為了徹底解放這一地區，配合全國解放戰爭，一面打擊當地的各種反革命勢力，堅持這個地區的革命活動，一面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減租減息等民主革命運動。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五區助理任茂等三四人來到了小耕堡村，這是黨派下來的幹部第一次進村。他們進村後，召集了村里苦大仇深的扛活窮哥們開會。在會上任茂問大家：“你們掙的工錢少不少？家里吃的夠不夠？有沒有穿的？”雇農姜慶奎說：“我們每年掙的工錢，連养活家里人半飽都不夠！”雇工呂進才指着自己身上穿的破衣裳說：“衣服哪里夠穿！”他倆起了頭，大家馬上你一言我一語地訴起自己的苦來了。任茂立刻回答大家：“工錢少，咱們叫地主增加；沒有穿的，咱們叫地主給。”並給大家講了長工如何受地主的剝削，以及窮哥們組織起來鬧翻身的道理，讓大家馬上組織起來抱成一團，和村里的地主富農們展開鬥爭。大家熱烈地議論起來，會後很快地組織起來，並選出姜慶奎、呂進才為組長。

會後，任茂等率領一伙窮哥們馬上找到偽保長，命令他通知雇長工的地主富農們：必須在三天之內給每個長工增加一石五斗棒子，做一套新衣服。雇活的地主富農們看到

村里穷哥們团结起来攥成了一股绳，被迫答应了。結果所有的規定在三天之內全部兌現了。扛活的穷哥們一个个欢欣鼓舞，他們預感到翻身作主、揚眉吐气的日子即将到来

了。

九月的一天夜里，任茂又秘密来村，找到姜庆奎、吕进才、赵連成等四五人，在村东东留坟开会。任茂給他們讲了减租减息的事情，并且讓他們串連佃戶組織起来，先別交租，让长工們注意地主富农打了多少粮食。最后任茂問他們：“你們敢不敢干，参加不参加組織？”他們几位异口同声地說：“敢干，願意参加！”从此，小耕堡这块土地上就播下了地下革命的种子，并在全村不断发芽壮大，成了全村人民鬧革命的領導核心。

过了一个月，一天下午，任茂和区干部李瑞丰等三四人公开来到村里，通知全村各阶层的群众开会。群众大会是在当天擦黑时召开的。这天到会的人很多，其中有广大的貧农、下中农、中农，少数富农地主也参加了。会上任茂向大家讲了話，他首先讲了当前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又讲到地主富农們是如何通过出租土地、雇工、放高利貸等方式剝削劳苦农民的，接着讲了党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說明二五减租怎样减法。最后他坚决地說：“租子和債息一律按照党的政策减，扛活的工資一律增加。”任茂的話还没落音，下边的群众就議論开了，扛活、佃戶和借債的穷苦人一个个心里都乐开了花。他們說：“减租减息增工資，这回可好过了。”这时姜庆奎当众宣布：“凡种大庙公地的，从今以后，誰也不要

交租粮！”

这次大会后，长工的工资又增加了一石，佃户减了租子，借债的减了利息。穷苦的农民从此腰板挺得硬了，扛活的穷哥们说话也敢大声了，也敢驳斥地主了，并且还积极监督地主富农们的行动。地主富农们见了长工不但改变了过去的跋扈态度，甚至还假装低声下气说好听的。在地主白玉昆家扛活的吕进才，每次开会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地主都得给留着饭。这时村里的穷苦农民真正成为说一不二的敢做敢为的硬汉子，成为村里最有力量的人物。村里那些横行一时的地主富农们的威风一扫而光。

三、军民合作一条心

智勇击溃“壮丁队”

美蒋反动派占领通县后，牛堡屯一带为伪第四区，伪区下设伪东、西、南、北四大乡（东大乡是永和屯，西大乡是东马各庄，南大乡是大耕堡，北大乡是陆辛庄），小耕堡村是属于伪大耕堡乡管辖。在这个地区的反革命武装主要有伪区中队和各伪大乡的乡队。驻通县的伪保安十三团和驻北平的国民党军队也经常到这个地区来骚扰。同时，这一带的地主还组织了反革命武装——“联庄会”（又名“伙会”），小耕堡村的地主富农也积极成立了“伙会”组织。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南义阁大地主刘瑞堂为中心，和周围各村的地主富农们一起，在“伙会”的基础上雇佣了一些亡命之徒，又组织了一股反动的地主武装，名叫“义勇壮丁队”，后来人们一般称

之为“壮丁队”。这些反动地主武装和伪县保安十三团以及伪四区区中队紧密勾结，在这一带对我革命干部和革命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并且到处残害劳动人民。“壮丁队”每天上午出动，任意欺压各村的老百姓，吃、喝、抢、打是他们的唯一本领。“壮丁队”有的还假冒我县支队之名到处勒索粮、布和鞋。各村的地主富农和伪保长也狐假虎威，任意勒索。

一九四六年五月间的一个上午，区委书记梁瑞带领我区小队六七人来村里了解“壮丁队”的活动情况。这一天，我县情报员王孝泉也来村里找我区小队送文件。他们派了富农伪保长白玉林家的饭，但刚要吃饭，“壮丁队”就进村了。原来富农伪保长白玉林趁做饭之机偷偷向“壮丁队”告了密。这时，我区小队和王孝泉等看到敌人很多，众寡不敌，就向马各庄桥撤去了。

为了打击这个地区的“壮丁队”的气焰，我十四分区（当时管精通县、三河、武清、蓟县、宝坻、香河、宁河七县）决定派县支队一部分武装来这村。当时小耕堡的四周围都是反革命敌人的盘踞点。在五月下旬的一个夜里，我县支队的二排长田德才带领县支队一部共计一百三十多人，穿过敌人的封锁空隙来到村里，区委书记梁瑞和任茂等也来了。他们到村上天已蒙蒙亮。这时村里老乡们刚起来，看到满坡武装的县支队，就亲切地向队伍问寒问暖，赶紧给队伍烧水做饭。县支队到村后，一面和村里地下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了解了“壮丁队”每天来村的活动情况，一面察看了

地形，把队伍分三部分布置在村东北、西北、西南三个街口中。队伍有的做隐蔽工事，有的到村边房顶上装作抹房的，在上面探视“壮丁队”的动静。一切部署停当后，估计富农伪保长白玉林一定会给“壮丁队”报信，准备将计就计，梁瑞、任茂等五六人又找到富农伪保长白玉林家去号饭。白玉林在做饭时，果然抓空子偷偷从村里溜出去，急急忙忙跑到牛堡屯告密。“壮丁队”得信后，立刻集合出动。他们把人分做两股，一股由“壮丁队”的一个叫杨瞎子的班长带领三十多人，出牛堡屯西口顺汽车道直奔这村西南口，准备挡住我向马张桥的去路。另一股四十多人由“壮丁队”的分队长关敬人（外号叫“老坐子”）带领，出南关顺大车道直奔这村东北口。他们以为我们的人数还和上一次一样，企图仍用“东惊西捉”的办法，想把我們一网打尽。万万没有想到我县支队来这样多的人，并要和他們进行决战。

“老坐子”带着东股的“壮丁队”抄近道，很快就到了这村的东北口。“老坐子”刚到村东北口边，就嗵嗵地打了一连珠盒子枪。紧接着“壮丁队”也跟着连声地无目的地放枪。正当这股“壮丁队”盲目向村里乱放枪时，我县支队突然同时响起两架轻机枪，嗵、嗵、嗵……像两条火蛇一样，在这股“壮丁队”群里开了花。这股“壮丁队”猛然遭到这样强烈的反击，一个个都像惊弓之鸟，吓得丢枪、扔弹，滚的滚，爬的爬，被打得四散溃逃，当场被击毙三个，“老坐子”也被打伤趴在地下不能动弹。当时“老坐子”的护兵、他的小舅子也顾不得救他，就仓惶地逃窜了。

在击溃村东北口这股“壮丁队”之后，村西那股“壮丁队”也和我在西南口的县支队接上了火。这时我东北口的县支队从北面包围过来，西股“壮丁队”见势不妙想逃窜，结果有十多个被我县支队团团围住，最后拱手向我县支队缴械投降。我县支队前后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把这两股“壮丁队”全部击溃了。曾横行一时的“壮丁队”，经过这次打击，基本处于土崩瓦解状态，不久就被改编合并到伪区中队了。

在这次战役中，我县支队击毙伪壮丁队分队长一名，“壮丁队”员三名，俘虏了十几名，缴获各种枪枝十多枝，子弹许多发，战果累累。县支队把队伍整理好后，没有停留，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迈着坚强的步伐，押着垂头丧气的俘虏，经马各庄桥，奔小海子去了。

当我县支队离开小耕堡不久，通县地区的伪保安十三团从永乐店开来一营人，共计五百人，把小耕堡村团团包围，同时在大耕堡架起了迫击炮，准备炮击小耕堡。但这时除了村外有几具伪“壮丁队”的死尸外，村里却已平静无事了。伪保安十三团枉费心机扑了一个空。最后只是向村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发泄了一场。当村里伪保长让这伙饿狼好吃好喝了一顿之后，他们才像丧家之犬闷闷地夹着尾巴走了。

四、冒艰险坚持斗争 姜、吕、赵壮烈就义

自我县支队击溃“壮丁队”以后，牛堡屯的国民党反动

势力和当地的地主反动武装更紧密勾结在一起。这年六月，“壮丁队”合并到伪区中队，反革命势力活动更加猖狂，他们对革命力量进行了疯狂的迫害。敌人妄图把小耕堡村的革命力量绞杀掉。但是这个村的革命力量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更坚强地挺立着，积极地开展了更细致、更深入的革命工作。

这时，以姜庆奎、吕进才为首和周围几个村的地下工作者，在区委领导下，成立了秘密情报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探听伪区中队的活动；了解藏有枪枝的线索；给县支队、区小队带路；传递革命信件；组织联系当地革命群众。他们为了活动方便，都以做小生意为名，有的卖杏卖桃，有的打磨，有的卖菜等，四下奔走。有的甚至深入到敌人的据点里了解情况，探听消息，掌握了敌情后，马上通过鸡毛信传递到我县根据地去。他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进行这项革命活动的。有一次夜里，姜庆奎、吕进才带领我区小队到东永和屯伪区主任杨栋林家起了一枝套皮枪，之后又到仓上富农李廷芳家起了一枝二把盒子。从这两次起枪之后，伪区中队和乡队就特别注意姜庆奎和吕进才两人，企图阴谋逮捕他俩。敌人的阴谋被我区委得知后，立刻用鸡毛信通知了姜庆奎，要他和吕进才马上离开当地。这年阴历七月十五，姜庆奎、吕进才等在牛堡屯中街槐树底下会面，确定在七月十六日（阴历）清早离村到天津。第二天清晨吕进才来到姜庆奎家，因为有些工作没有处理完，十六日没有动身。

不料，七月十七日（阴历）清早约四五点钟，伪区分队长

宋万和带领伪区队三十多人，全都以便衣打扮来到这村保公所。宋万和把伪区队布置在姜庆奎家附近，就带着几个特务，由伪公役姜荣奎带路直奔姜庆奎家。宋万和一脚把门踢开，对姜庆奎说：“走！到庙里（即保公所）有点事。”姜庆奎一看来势不好，但看到他们来的人很多，不得脱身，就跟着他们出来了。到了庙里，伪区队一拥而上，立即就把他倒臂捆起来。宋万和恶声恶气地审问他：“你家藏的枪，赶快交出来！”“我家没有枪。”姜庆奎镇静地回答说。宋万和审问了姜庆奎好一会，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最后无法，就把姜庆奎带走了。伪区中队在逮捕姜庆奎的同时，又派人到北仪闾去逮捕吕进才。吕进才这天吃过早饭就离开家来找姜庆奎，准备二人一起动身。他刚走到牛堡屯东口，就被伪区中队逮捕了。

姜庆奎、吕进才被捕后，被带到牛堡屯伪区中队部，敌人对他们施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毒刑。先对他们压杠子，后来又把他们的手指捆住吊起来用枪探子毒打，还往他们嘴里灌掺着小米和煤油的凉水。他们在敌人的酷刑下死去活来多少次，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没有供出村里地下人员任何情况。敌人最后就下了毒手。在七月二十三日（阴历）十二时，姜庆奎、吕进才两位战士就在牛堡屯西边小桥附近英勇就义了。

敌人杀害了姜庆奎，还想杀害姜庆奎的家属。他们四处搜捕姜庆奎的妈妈姜刘氏和他的妻子姜张氏。姜刘氏携带着一岁的小孙子姜永振，被迫躲在她女儿家。姜张氏带着十岁的长子姜永利先回娘家，后因敌人追得紧就到北平

給人当奶媽了，解放那年才回到了家。姜庆奎的五岁大女儿秀云和刚三岁的小女秀伶怕被敌人謀害，就送出去做了童养媳，直到解放才回到家里，母女重新团圆。

姜、呂被害之后，敌人来村更加頻繁，村里的地下工作者的革命活动也就更艰难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区里梁瑞和任茂两同志秘密来村找到村妇女主任姜赵氏，告訴她說：“咱們的大队就要过来了，咱們要把群众重新組織起来，利用时机，公开向地主展开斗争。”接着又找到村里的穷哥們，鼓励說：“大家振作起来，記住姜、呂二烈士受害的日子，这个仇一定要报！”

經梁瑞、任茂的鼓励，以姜赵氏为首的村里地下工作者，組織全村穷苦群众向地主富农們重新展开了斗争。这年春天，全村穷苦农民都沒吃的沒烧的，姜赵氏就領導他們强迫地主富农們拿出了粮食和柴禾。有一次姜赵氏等正在开会，准备要地主拿出更多的东西。突然伪乡队来了，她机智地領導群众及时散开，使伪乡队扑了一个空。他們就是这样在敌人来时隱蔽起来，敌人走后馬上繼續坚持开展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伪保长們表面上是两面派的人物，革命的事他們不得不应付，他們主要方面是靠向敌人的，是为地主統治阶级服务的。但由于我区地下武装經常到这村来活动，而广大穷苦农民又組織了起来，小耕堡村革命斗争的活动，始終沒有停止，村里的地下工作者，領導村里的革命群众把各种斗争繼續推向高潮。

这年四月的一天上午，在县委书记亲自领导下，牛堡屯

东部几个村的穷苦农民分了南仪閣大地主刘瑞堂的家产。小耕堡村的穷苦农民在姜赵氏的带领下冒着大风也去参加了。回来时个个兴致勃勃，满载而归，有的扛着农具，有的搬着家具。村里的穷苦农民们多年来受大地主刘瑞堂的压迫和剥削，这次才算出了口气。

从这以后，敌人就特别注意姜赵氏。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伪区中队长张立松和伪乡队长李连会，带领二十多个伪区乡队丁，突然来村，直扑姜赵氏家。姜赵氏因为没防备，被敌人逮捕了。敌人逮捕她后，先把她带到牛堡屯伪区中队部，后转到通县伪县府里。敌人审问姜赵氏好多次，她一直严口没说出任何有破绽的话来。

姜赵氏被捕后没有几天，区里梁瑞、任茂等十多个人又来村了。他们找到伪保长姜连耕、刘景春等，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把人给保回来，就当心你们几个的脑袋！”几个伪保长害怕了，连夜准备了钱，由刘景春等人到伪县府去保姜赵氏，最后才把姜赵氏保了出来。

姜赵氏被释放回来，革命气质丝毫没损。相反，在被捕的日子里把她锻炼得更坚强了，她更了解到应该恨哪些人，爱哪些人。她找到伪保长姜连耕等痛骂了一顿，打了姜连耕一棍子。从此，她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伪保长和地主们更怕她了。他们开始积极筹划，阴谋陷害她。

同年阴历八月初六的中午，正下着小雨，伪区分队长季涵带领七八个穿便衣打扮的伪区特务，来到村保公所，和伪保长们一起策划逮捕姜赵氏的阴谋。由伪保长刘景春带领

季涵等来到姜赵氏家，他们伪造了一封假信，说区委通知她马上到大耕堡去开会，姜赵氏没有仔细查看这些来人，就跟他们出来了。出了小耕堡村东南口向大耕堡走了没多远，敌人带她拐进棒子地，这时她才发觉上当，但已经晚了。几个特务强迫着她走，把她先带到牛堡屯伪区中队长张立松家，严刑审讯了她一夜，第二天又把她带到柳营伪保长刘俊亭家，五天后又把她送回牛堡屯。在一天夜里，敌人把她

带到牛堡屯后街西北口一座小庙附近，施行了最后的卑鄙手段，把她活埋了。

姜赵氏在被捕后，敌人虽对她施尽了严刑拷打，一直到杀害她，她始终表现得很坚强。她虽然牺牲了，但她那



种坚贞不屈、大公无私、热心为穷苦大众办事、不顾个人危险、坚持革命斗争的精神，永远留在村里穷苦人们的心里，一直到今天，村里人谈论起她来，无不深深表示敬佩和怀念。

姜赵氏被害之后，敌人天天到村里来，进行各种恐怖活动。但是这片乌云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敌人已处于寿终命末之日了。

五、小耕堡解放见晴天 穷苦人当家做主人

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我县支队在全国解放战争的新形势下，对通县的反革命敌人展开了主动攻势。在通县东南部地区，先打了采育、于府，接着又打了反革命的据点永乐店，之后，又用了五小时的时间智取了通州。在这些战役中，县支队获得了大量的军需战利品，装备了自己。不久，我县支队为了巩固东部游击区，暂时放弃了这一地区，回师河东，和分区部队一起，打下了香河，巩固和扩大了那里的根据地。这时盘踞在香河的“还乡团”，因为受我分区部队和县支队的打击，在香河已无法立身，就溃退到通州南部地区来，先占南仪阁，后到牛堡屯，小耕堡村也遭受了他们的残害。他们和当地的反革命势力一起，对这个地区实行了凶暴的统治，妄图作垂死的挣扎。他们不仅沿用法西斯的保甲制，而且还到处抓兵、征收木料等，残害民生的事层出不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伪区主任杨栋林（外号叫杨三锤子）曾带领伪区队到各村“征兵”，强迫各村十八

至三十岁的青年都到南仪閣集合，用抽签形式抓兵。小耕堡村有三个青年就是这样被抓去的。弄得几家人家，夫离子散。在这年年底，伪保安十三团，为了孤守通州，还到各村强征木料，小耕堡也被搜刮了三大車。

在敌人进行这一系列垂死掙扎活动的时候，人民解放軍已打下天津，包围了北平，解放了通州地区。

一九四九年一月（阴历十一月十三日）清晨，人民解放軍来到村上，劳苦大众世世代代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小耕堡人民获得了解放。真是“巨雷一响烏云散，小耕堡从此見晴天”。

解放了的小耕堡人民，第一件大事就是掌握刀把子，当家做主人。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村里的穷人代表到六郎庄开会，在会上区长作了激动人心的报告，他說：“从今以后，穷人要当家做主了，穷人要彻底翻身了。”并让各村穷苦农民組織起来，把村里的刀把子拿过来，把村里的各种事情管起来。

会后，小耕堡的穷人代表回到村上，馬上把村里的穷苦人召集在一起开会，研究穷人組織起来当家做主的事。在九月初正式成立了农民协会，选出路廷桂、刘万荣、荀連成等七人为农民协会委員，还建立了民兵組織。农民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監督旧保长組織全村生产、民政和支前等工作。这时旧保长还支撑村里的各項工作，但他們进行各种工作时，必須征得农民协会的同意。农民协会实际起着代理新的村政权的作用。

在农民协会的組織下，全村人民积极投入了支前工作，他們在支援北平解放中，拿出了許多木料和粮食，同时还組成了九十六人的担架队开到区上，等候备用。在整个支前工作中，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小耕堡人民，由于經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鍛炼和考驗，有着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

六、算細帳地富原形露 鬧翻身穷人喜洋洋

解放了的小耕堡人民，第二件大事是剷除几千年来压在穷苦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鎖，彻底大翻身。解放前，占全村戶数不到百分之十二的地主富农，就占有全村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九；而占戶数百分之五十二的貧农，只占全村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六。村里的地主家每人平均占有十五亩地，而貧农每人平均才一亩二分地。地主富农所占的土地多是良田沃土；貧农所占土地却是貧土瘦地。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就是解放前村里地主富农对穷苦农民进行封建剝削的基础，也是广大貧苦农民长期受苦受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改变这种封建的土地和财产占有制，彻底摆脱封建剝削，是广大貧苦农民多年来的願望。

一九四九年秋天，村里的干部和貧农代表先后参加了县、区土地改革工作会议，回来后，立即投入准备工作。这时，县里土改大队派来了土改工作组，帮助村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十一月初的一天下午，在村里小学校召开了全村群

众大会，广大的貧苦农民听说要土改，要斗地主分田地，个个滿心欢喜，不少人很早就来到了会场。这天到会的有三百多人。在会上，土改工作组的同志向到会的群众说明了进行土改的意义，宣传了党关于土改的方针和政策，以及如何划阶级、定成分和组织农会等。会场上群情非常激昂。正式成立了领导全村貧苦农民闹翻身的农会。接着一个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村展开了。

十一月上旬，农会干部和土改工作组连日召开会议，研究分析村里各阶层情况，进行划阶级定成分工作。经过一场激烈的算帐说理斗争和通过“三榜定案”，确定了村里的三户地主和七户富农。

在斗地主分田地之前，农会领导全村貧下中农群众首先惩治了村里的一些不法地主和反动富农。村里的地主富农们，在土改一开始，就采取各种花招来对抗土改，有的用请吃请喝和小恩小惠拉拢土改干部和貧下中农群众，有的埋藏疏散东西，有的甚至公开刨树。如地主姜臣奎就刨了三棵树，富农姜公奎也刨了三棵树。在地主富农的成分定下来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狂了，昼夜不停地在计谋破坏土改。

为了打击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更好地发动群众向地主和富农展开斗争，农会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在会上处罚了地主姜臣奎和富农姜公奎，指出他们这种举动是破坏和抗拒土改的行为，公安部门并把他们两人拘捕起来。经过处罚地主姜臣奎和富农姜公奎，村里的地主和富农们表面上才老实了一些。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面前，全村的貧下中农

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地主和富农的反动本质，并增强了对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在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征收富农的土地那天，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会上农会主任宣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征收富农的土地的命令，在这庄严的时刻，会场上广大贫下中农群众欢声雷动，手舞足蹈。

没收了地主土地、财产和征收了富农的土地之后，农会马上召集贫农代表开会研究分配方案。会议连续进行了三昼夜。这期间他们全面地计算了地主富农的财产，研究了如何把这些财产合理地分配给贫下中农群众。最后确定贫雇农分给土地、牲畜、车、农具；下中农补土地和少部分农具。广大贫农、下中农过去亲手创造的财富，今天又回到了自己的手里，一个个都笑开了颜。多少年来，贫雇农们终年为地主富农们做牛做马，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回到自己寒窑似的家里。今天分到了牲口和农具，增加了发展生产的物质条件。他们怎能够不激动？不由衷地打心眼里高兴呢？分完生产工具之后，接着就分土地和房屋。在分土地以前，还进行了一场没收旧地契的斗争。旧地契是过去地主富农维持他们封建地权用以剥削穷苦农民的最主要的法律依据。不毁坏这个地权依据，穷苦农民怎能放心？因此农会根据广大穷苦农民的要求，迫令地主富农把旧契交了出来。但地主富农们为了实现“变天”的美梦，找了种种借口企图拒交。贫农代表向富农姜公奎要旧地契时，姜公奎说：“已经埋了，不好挖。”贫农代表坚决要他挖出来，他最后看不交出来不

行，才从屋里找出来。又如富农白玉林，贫农代表向他要旧地契时，他也說埋了，贫农代表一定要他挖，他說：“早已糟了。”贫农代表說：“把糟的渣也得找出来！”并且一夜連找他三次，最后他才被迫从地下挖出来。地主富农們就是这样把旧地契当作他們的命根子来保存的。他們幻想有朝一日变天后，妄图以此为据进行倒算。但这只能是他們的梦想。在广大农民的坚决斗争下，这个梦想终于又一次破灭了。

在正式分地分房那天，又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宣布了每户贫下中农应分到的土地和房屋。这是多少年来穷苦农民所梦想的事，现在终于实现了。贫农王进义家三代給地主扛活，終年过着飢寒交迫耐飯露宿的日子，这次他家分到了十几亩地和五間砖房，会上王进义激动得說不出話来。在这个大会上还把收来的旧地契点燃起来。贫下中农們看着烧起的火光，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笑容。这时在場的地主富农們一个个哭丧着脸，呆呆地望着越烧越旺的烈火。富农刘万貴自言自語地說：“完了，这下可沒有根据了。”地主白玉昆湊到富农刘万貴身边說：“咱們黑夜白天都是为了这个，这回可沒有把柄了。”是的，地主和富农剝削穷苦农民的老根和“把柄”都拔掉和烧光了，穷苦农民彻底翻身了。

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村里七十一戶贫下中农分到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五百七十亩。二十戶贫下中农分到房屋九十一間。小耕堡村广大翻身农民在取得土地改革运动的輝煌的胜利后，立即投入了組織互助合作和发展农业生产

的高潮中。

七、建党团树立领导核心 夺政权敌人阴谋破产

土改后期，区委直接领导了小耕堡村建立党团组织组织和巩固村政权等一系列工作。

一九五〇年初，区委着手领导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区委对土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加强了培养和教育。二月五日正式吸收了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苟連成、王启俊……等九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立了临时支委会。到五月，支部进行了正式选举。支部一成立，立即领导起全村的各项工作，以党支部为核心组成了村里的坚强领导优势，在以后各项政治运动中，村党支部都起了战斗堡垒作用。

与建党同时，在团区委的领导下还建立了村里的团组织，成立了团支部。团支部作为党支部的有力助手，成为村里土改时期和以后各项工作中的一支坚强的生力军。

党团组织建立后，村里的领导核心加强了。但这时村政权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旧的保长名义上还支撑着村政权，而特别严重的是地主富农和旧保长们妄图继续把持村政权作威作福。另外，在土改刚结束不久，村里的地主富农有的还在蠢蠢欲动，企图反攻倒算。贫农刘万荣分到了富农刘万贵的部分菜地，而富农刘万贵硬要在刘万荣的土地上种菜，并要把地要回去；同时把贫农苟福林分的他的房子泥上

泥，妄图把房子也要回去，甚至公然跑到分他骡子的贫农姜洪奎家打架。眼看经过土改，贫下中农刚刚翻身得到的果实又要被地主富农倒算回去，贫下中农的人身财产没有得到彻底保障。如何巩固村里无产阶级政权，保证每个贫下中农当家做主的权利，已成为当时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区里派了区公安助理郑连等来村帮助整顿村政权的工作。

在这年四月份的一天上午，召开了全村选举新政权大会。会上郑连说明了土改结束后，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必须要正式成立村政权，选出真正为全村广大群众办事的人，担起村里的领导工作。会后，郑连等一面和村党支部研究村政权的候选人问题，一面深入群众中听取群众的意见。

这时以地主姜永富为首，和村里的地主富农以及过去的伪保长，还有一部分受他们欺骗的落后群众，趁选举村政权之机，策谋打击村里的党团员和土改中的骨干分子，妄图继续把持村政权，倒算土改的胜利果实。地主富农和伪保长在幕后出谋划策，派出姜连有（伪保长）、姜连耕（伪保长）、王进全（富农）、姜荣奎（伪村公役）等人公开活动，操纵选举。他们分头到各户去笼络群众。选举的结果，大部分委员选的都是他们那伙人和一些不能胜任村里领导工作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村党支部又召集了全村群众大会。在会上郑连揭露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阴谋，会场却被这伙人扰散了。坏人扰乱了会场又连夜到县政府去

告状。县的干部問了他們的情由后，答复他們去村調查，帮助解决，让他們先回来。

这伙人回来之后，就在大街上嚷嚷說：“这回可告下来了，不久县里来干部处理他們（指郑澗和村党支部书记）。”等了几天县里沒来人，地主姜永富又一連两次写“呈子”上告，并且又搞起了“按手印”的鬼把戏，愚弄一些人签字划押，誣告村党支部“贪污公粮”。他們为了把捏造变为“事实”，就在征公粮用的秤上打算盘。有一天，伪保长姜連有趁財粮委員刘朝斌不注意，把征公粮用的秤从他家偷出来，用麻袋包裹着由富农刘景龙赶了大車送到牛堡屯，找修秤的在秤的刀部加了一个銅片，在上边倒了点盐湯，过了一夜就上锈了。結果每百斤大出了五斤。秤改好后，伪保长姜連有又偷偷把秤放回刘朝斌家。他們认为計謀成功了，于是赶紧假冒全村八十一戶名义又写了“呈子”，第四次到县里“上告”。

在他們这伙策划这一系列阴謀的同时，村党支部和县区委早就細心地观察他們的动静，了解他們的内幕詳情了。在他們鬧事的第二天，区委就找了村党支部一起研究和分析了他們的活動情况，并布置了党团积极分子注意他們的活動。县区委在这个期間着重深入下层进一步了解他們的主謀和主要分子妄图夺取村政权的反动阴謀。在他們第四次“上告”后，决定揭破他們的阴謀，打击他們的主謀分子。以县公安局长为首率領区委負責干部等十四五人来到村上。敌人一見势头不妙，几个主謀分子在县区委派人来

的当天就偷偷地逃往北京等地。

第二天上午，县公安局长亲自主持对敌人进行了审讯。这天下午县公安局长召集了村党团员和村干部联席会议，征求了大家对处理这伙闹事人的意见。第三天，又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参加这次会的人很多，县公安局长在会上首先揭露了这伙人闹事的阴谋，指出这伙人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我们的村政权。最后他宣布了处理这伙闹事的主要分子的决定：对于抵赖并无悔改之意的姜士福、姜荣奎等逮捕法办，逃跑的主谋分子回来后马上法办；对于表示悔过的人，一律释放，在村里老老实实参加劳动。

通过这次事件，全村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认清了地主富农的反动本质，从而提高了阶级警惕性。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这次事件过了不久，村里在这年六月重新改选了村政权，同时建立了村里的民兵组织——武装部，还成立了妇联会。

从此，小耕堡的村政权巩固地建立起来了，贫下中农基本骨干成为村政权中的主要领导人，村里的刀把子巩固地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

八、卫祖国“抗美援朝”

清暗敌镇压反革命

一九五〇年，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时霸占着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美帝国主义这种

狂暴行为激起了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我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支援朝鲜人民，一面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美国侵略者，一面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刚经过土改翻了身的小耕堡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马上投入了这一伟大的运动中。

一九五〇年秋后，县区都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和支会，接着村里也成立了村抗美援朝委员会支会。“村支会”一成立，立即组织了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地宣传了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对全村人民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同时揭发了日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真相。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全村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一次群众大会后，贫农刘君清说：“我们好容易在党的领导下闹土改翻了身，现在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又想夺取我们的胜利果实，这可不能答应，不能让蒋介石再重新回来，要我的儿子去当志愿军，把国保住，我的家才能更牢靠。”贫农徐宽也说：“别看我只有这么个抱来的儿子，为了保家卫国，我也得让他去参加志愿军。”白陈氏也说：“我就一个儿子，为了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也让他去打美国鬼子去！”村里的青年们更是义愤填膺，一个个向党支部提出申请当志愿军的要求。

这年十二月的一天上午，召开了青年报名参加志愿军的全村群众大会，全村男女老少有三百多人参加。会议开

得十分热烈，青年徐继宗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接着青年刘广环、白金来、姜学奎也报了名，还不够年龄仅十七岁的姜敬奎也报名参加志愿军。从来不爱说话的刘芝，眼看着大家都先报了名，着急地说：“我也打美国鬼子去！”这次会上共有七位青年报了名。后经检查只批准了姜学奎和刘芝两人。他们俩听到批准的消息后，激动得都睡不着觉。姜学奎对他的老师说：“我这次上朝鲜不胜利不见你，当我胜利回来时才到你家看你去！”刘芝对他妈妈说：“你们在家过踏实日子吧，我到朝鲜打美国鬼子去，一直把它打趴下，把咱们的胜利果实保卫好。”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的上午，全村举行了四百多人的欢送新军大会。姜学奎、刘芝两人披红戴花骑着大马，带着激动自豪的笑容，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声中和锣鼓喧天的欢送里告别了乡亲们。他们在县里做了短暂的整顿后，就直接开到了抗美援朝的最前线。接着在一九五一年底和一九五二年底，村里还有几位青年先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了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

在这个期间，全村人民还以实际行动支援了抗美援朝，掀起了一个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村里的人们一致表示：“前方要什么，我们后方给什么。”村里的党团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群众积极带头进行了捐献，全村共捐献了七百斤棉花，三百三十元钱。在村里还进行了“拥军优属”和制定爱国公约等活动。在这次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中，全村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大家的思想

觉悟都得到了提高，从而推动了当时的生产高潮，“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已成为人们的行动号召。

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在村里还进行了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九五一年春天，县区派干部来到村里和党支部一起，先后召开了党支部会、党团干部会和全村群众大会。在各种会上反复宣传了为什么要镇压反革命，并且说明了政府对反革命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让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分子漏网。同时在村里成立了一个对敌调查组，调查杀害村里地下革命工作人员姜庆奎、吕进才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情况。这时，曾参加谋害姜庆奎、吕进才的反动富农、伪保长白玉林、刘景春和伪保长姜连耕等也加紧了活动，他们经常聚会商谈对策，他们之间一方面订立了“攻守同盟”，同时妄图阻拦知道他们的罪恶的人来检举，甚至对革命烈士家属进行恐吓。伪保长姜连耕偷偷找到姜庆奎的妻子姜张氏说：“庆奎的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说，人已死了，说也不管事。你要不说，耕、拾、拉、打、轧全由我管，八路军站不长，蒋委员长早晚要过来的！”他们虽然进行了这种卑鄙活动，企图蒙混过关，但纸是包不住火的，他们的罪恶内幕终于被揭穿了。揭穿他们罪恶内幕的是本村的小学教员杨永修。杨永修过去曾帮他们写过一封密告村地下革命工作者姜庆奎、吕进才的信。经过政府的反复教育后，杨永修终于将反革命分子杀害姜、吕的罪行揭露出来。

反革命分子策謀杀害村地下革命工作者的罪恶内幕揭破后，县区领导经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核对罪证确凿后，逮捕了反动富农伪保长白玉林和刘景春。并在五月四日召集群众大会。大会上，区武装部的干部当众宣布：就是他们謀害村地下革命工作者姜庆奎和吕进才的。同时宣布了政府逮捕他们的命令。到会的群众义愤填膺，要求政府严惩这两个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

五月底的一天上午，在牛堡屯召开了全区一千人控訴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在这个大会上主要控訴了六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其中有小耕堡村的反动富农伪保长白玉林。小耕堡村有很多群众都赶来参加了这个会。革命烈士姜庆奎的母亲姜刘氏和姜庆奎的女儿姜秀伶在大会上控訴了反动富农伪保长白玉林。冤大仇深的受害者一个个都在大会上控訴了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要求政府严惩他们。

控訴大会最后由县人民法院院长对反革命分子做了宣判，这村的反动富农伪保长白玉林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反动富农伪保长刘景春判为有期徒刑五年，伪保长姜連耕还没逮捕，他就投井自杀了）。村里的群众听到枪决白玉林的枪声，莫不拍手称快。有的說：“这是恶貫滿盈。”有的說：“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的恩人，才能为人民报仇。”

通过这次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严重地打击了村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巩固了村里的革命秩序，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全村群众在这一場剧烈斗争中又一次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分清了敌我，提高了

革命警惕性。

这以后，小耕堡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合作化，成立了人民公社，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而且在生产斗争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九六三年，小耕堡村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广大社员进行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在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健全了各项管理工作制度，健全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健全了大队和生产队的核心。经过这次运动，广大的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广大社员更加认清了资本主义道路是朽木搭起的独木桥，社会主义道路是共同富裕的阳关大道，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了进一步提高。目前小耕堡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誓将光荣的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不断地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把革命得来的江山创建得更美好，更壮丽！

(小耕堡村史编写组编，高特夫整理。 毓继明 图)

苦难的“神駒”換新天

村名演变传神話

斗争历史开首篇

提起神駒的村名来有很多奇异的传说。在这些传说里面，我們可以看到，淳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我們还可以看到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連村名都要篡改的贪婪嘴脸。奇异的传说中含有深刻的阶级内容。

据村里的年老人說，神駒村建立于明朝永乐年間，原名永乐里，受潞河郡（今通县）管轄，当时有孙、宋、刘、周四大姓由山东迁居到这里。清初，山东德州有一罗姓官僚，受宠清廷，来到这里跑馬占圈，划地为疆，成为本村五大姓的头戶。

七八十年以前，这里叫做“神树”（見清光緒年間續修的《通州志》），現在附近村民还都叫本村为“神树”。传说在村北原来有一棵千年大叶楊，树高近十丈，树影能倒映在数十里以外的清水塘里。树干直径五六尺，枝叶繁茂，每到夏季，微风吹过，颼颼作声，好似奏起一支美妙的音乐。村里

的农民們下地归来,又热又渴,只要到大树下一坐,就遍体清凉,滿口生津,疲劳頓消。若是折一根树枝,点上火,那就香气扑鼻,远近几里地都能聞到。又传说大树底下有一只青蛙,只要青蛙一叫,三天之内准有大雨,农民們可以根据蛙叫安排农活。因此,全村都把这棵树看成幸福之树,非常爱护它,称它为“神树”。后来,本村有个地主叫“罗鄧头”的,霸占了这棵“神树”,砍倒做了棺材,村名也就改成“神駒”了。

为什么叫“神駒”呢?传说村后有一个土坨子,叫做“窰疙瘩”,里面住着一匹金馬駒,每天夜里子时出来,馬蹄得得由西往东,全村都能听到。那时,穷人們每逢婚丧大事,沒有錢筹办一切,只要到“窰疙瘩”前面的真王庙里,貼上一个字条,要借什么,第二天东西就放在那里了。只是有个条件,用完后一定要把原物归还。可恨的是有一个地主見財起歹意,借了好些东西,第二天一件也沒送回。从此以后,金馬駒就不再出来了,再貼条也借不着东西了。但神駒的村名一直沿用到現在。

但是,自从罗姓人迁来本村以后,罗姓中的地主分子依靠清廷势力,在本村作威作福。他們为了宣揚自己的淫威,連村名也要加以曲解,据为己有。在罗姓地主重修的家譜上对“神駒”的来历是这样写的:“我罗氏由德州南关迁移至此,帶黃馬一匹,其脚力甚快,日行五百里,故以此馬起名神駒村。”看,地主階級竟是这般貪婪无耻!

这就是有关神駒村名的一些故事。

含怨忍苦度长夜

摘星挂月换新天

神駒村是通县于家务人民公社所属八个生产大队中的一个，离北京东南約六十华里。四周无山无水，一脉平川。村西和西南紧邻大兴县，东北十二里是公社所在地于家务。本村东与栢福，东南与前、后伏，南与大黑堡，北与大松堡等村交界。

全村共有土地四千二百九十八亩。村北是黑土地带，土质較好，但地势低洼。过去，每年夏季，北边凉水河泛滥，十年九涝。村东、村南都是沙质黄土，东南有一片上百亩的大沙荒，粗砂乱石，寸草不生，但可作建筑材料。

本村生产以玉米、高粱为主，也种有紅薯、小麦、大麦、黍子和各种豆类。經濟作物以芝麻、棉花为大宗，間或零星种些烟、麻、白菜等，供农家自用。耕畜以牛、驴为主，也有騾馬。

全村居民一百七十九戶，七百八十九人，絕大部分务农，很少經商或从事手工业。人民淳朴誠实，吃苦耐劳。

解放前，本村有五十三戶貧雇农，十八戶下中农，四十五戶中农，八戶富裕中农，十戶地主、富农。貧雇农占全村戶数的百分之五十三，地主、富农占全村戶数的百分之七点五。但是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他們共占有土地二千五百多亩，占全村土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二，而貧下中农仅有土地五百八十三亩半，占全村土地的百分之十三

点六。多数农民都以扛活为生。

解放前，这里水涝成患。村子北边几十里路以外有一条凉水河，本来是北运河的一个支流。民国元年时，因凉水河与鲇鱼沟同时为患，就把它們通往运河的河口堵閉了。此后年复一年，以致河底逐渐淤积，河身日窄。每年秋汛，河水漫岸南下，几十里內的村庄都成泽国。腐敗的国民党政府不去疏通河道，反以治河修堤为名，强征暴斂，以饱私囊。凉水河年年依然泛滥，神駒村也就年年受害。

村中有一条横貫南北的干涸的小河，叫做穿心水。穿心水平时毫无用处，而在雨季或凉水河发水时，它就泛滥起来，使全村街道都泡在水里。

但是这条穿心水却是本村划分貧富的界綫。那些有錢的地主、富农絕大部分都住在穿心水东，叫做东街；而穷人則大多数住在穿心水西的西街。那年月里，每当清晨，东方未晓，一群群的貧雇农扛着鋤头，匆匆地从西头走向东头，給地主扛活去。

几百年来，神駒的老百姓在封建势力、軍閥、地主、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寇、汉奸的压迫下，不时遭到他們的地方武装組織“联庄会”、“壮丁队”、“警备队”等的洗劫，再加上土匪蜂起，烧杀搶掠，朝不保夕。广大的农民群众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到头来仍然是含辛茹苦，吃不飽，穿不暖。因此，本村的老百姓迫切要求解放，要求过美好的生活。远在几十年前就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农民斗争在这里发生。神駒的人民是有着优良的斗争传统的。

解放后,在党领导下,神駒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組織起来,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一直到人民公社,走集体化的道路,生活有了可靠的保障,尤其是公社化以后,新开的渠道纵横田間,阡陌相連,綠树繞村。一九五九年挖了风港河,消灭了十年九涝的現象。現在全村有两眼机井,灌溉面积达四百多亩,拖拉机耕地达一千八百多亩。并且拉上了电綫,安上了电磨,不久全村将普遍安上电灯。村里設有初級小学、診療所、供銷社。另外还有四十戶有了各种收音机,三十戶有了自行車,每戶平均都有两三只羊,一两头猪。社員們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忆苦思甜甜更甜,底下,讓我們看一看神駒村的人民群众是怎样历尽苦难、英勇战斗过来的。

夺粮斗争激群憤 大獄鑄成血泪仇

早在五十年前即一九一五年,神駒一带天时不济,五谷不收,加上兵荒馬乱,征战連年,軍閥、地主层层盘剝,穷人骨瘦如柴,輾轉沟壑,真是倒臥遍地,哭声震天。但是大地主刘四家里却滿仓的粮食,堆积成山。貧雇农 餓得实在沒法,大伙在一起商議,决定向地主刘四借粮。当时推出外号叫紅张二的貧农和大个刘(刘得才)、陈英杰、刘希雨、王侃、李貴生等代表穷哥們去借粮。地主哪肯借粮給穷人,紅张二他們到地主刘四家,刚一开口,就被刘四一口回絕了。

借粮不成,大伙回家,鍋里是空的,灶下是凉的,老的躺

在炕上哼哼，小的站在地上哭号。大伙看着不成，就又商量把每家仅有的衣物当卖掉，换几块洋钱向地主买粮吃。大伙想，借粮不成，拿钱去买总可以吧！于是各家当的当，卖的卖，换了几块洋钱，由红张二带头，手托着洋钱，直奔地主刘四家里。没想到狠心的刘四，怕卖开了头，这帮穷光蛋知道他有粮，以后更不好办，又一口回绝了，并说：“你们缺粮，我还缺粮呢，哪有粮食卖给你们！”袖子一甩，把穷人们推到门外。事后，刘四想：“放着粮食不稳当，别让他们给抢了。”第二天清早，就悄悄地拉着好几大车粮食到采育镇上去卖了。

这时，穷人家里没吃的，没喝的，地主既不肯借粮，也不肯卖粮。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看着地主拉着粮食到采育镇上去卖，实在逼得穷人走投无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红张二一咬牙说：“没法了，逼上梁山，上地主家吃去，反正待着也是一死，不如去吃地主，出了事，我顶着，拼着这条命不要了。”

于是由红张二这一伙人带头，穷人们浩浩荡荡拥进了地主刘四家里。妇女老小坐在他家炕上，年轻力壮的抱柴的抱柴，烧火的烧火，弄粮食的弄粮食，准备在地主家里熬粥吃。锅里的水滚开了，玉米渣儿下了锅，粮食的香味飘满了地主的宅院。

但是，地主是不会甘心让穷人吃他们家的粮的，他们也在积极谋划采取对策。刘四的儿子，十九岁的少掌柜刘宝惠快马加鞭，跑到了通州府，控告贫雇农“造反”，抢粮食。刘四的

媽，毒辣的地主婆——有名的母老虎，看着粥快熟了，就惡毒地撮起一簸箕沙土、又舀起一瓢豬食，冷不防倒進了鍋里。劉四也提起了水桶，往炕上坐的老弱婦女頭上潑去，粥沒有喝一口，倒



被淋得渾身濕透。農民們正要動手，地主兒子劉寶惠從縣衙門里帶來了一幫巡警，一進村就到處逮人，抓帶頭的。紅張二、大個劉、李貴生、陳英杰、劉希雨等六人挺身而出，說：“你們不要欺負鄉民，好漢做事好漢當，別誣賴別人，我們就是帶頭的。”巡警托着槍，連打帶罵，把六人押上了通州。

村里留下了一個巡警頭，外號叫蘿卜陳，抓到一伙婦女來過堂。蘿卜陳搖晃着那圓禿禿的腦袋，啪啪地拍着驚堂

木，审訊妇女們：为什么到地主家搶粮？有一个高七老奶奶說：“我們不是搶，是沒飯吃，借一点粮，等收成好了就还。”蘿卜陈两眼一瞪，惊堂木一拍，大吼一声：“借粮！我借你的脑袋成不成！”接着，他便跑到貧雇农家大事搜查，摔罐倒罐，連一丁点麦麸糠皮也被糟踏个精光。

在通州，刘四的儿子刘宝惠上下活动，一定要把带头的六个人設法处死，斬草除根。官僚、地主本来就是狼狽为奸的，对紅张二等不断的严刑审訊，当堂就把紅张二給活活地打死了；另外五个人关在獄里不給吃，不給喝，不几天又餓死了两个人；剩下三个人被放了回来，受尽百般折磨，李貴生走在半道就死了；还有二人回家后，因在獄中受尽折磨，多日未进飲食，一吃进点东西，胃腸受不了也死了。紅张二的儿子为了替父报仇，經常到刘四堂前屋后轉悠，但由于地主門禁森严，不得如願，几年后也抱恨死去。

狠毒的地主达到了他們的目的。这次自发的农民夺粮斗争失敗了。

斗争虽然失敗了，但是，在本村农民的心里却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爆发出革命的火花。他們悼念着这些死去的正直的穷人，他們痛恨杀人不眨眼的官僚、地主。至今村里还流传着当时的一首歌：

民国四年天不收，
大伙一心要喝刘四的粥。
刘四的粥沒喝上，
男的逃走了，罗家場里过了一个单片（指仅有妇女）堂。

大伙乡亲都記牢，
血債要用血來償。

紅張二的坟墓至今还在通县，父老們时常带着悼念的心情，为儿孙們讲述着他的英勇斗争事迹。

罗、刘凶残杀无辜 父子含冤近十年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入华北，反动統治阶级借此机会增租增稅，变本加厉地剝削老百姓。当地伪軍、汉奸、国民党、土匪流氓、地主武装組織串通一气，到处搶掠残害人民。老百姓逃荒、逃兵，日夜不安，真是朝不保夕，死人无数。

当时村里的伪保长是臧福善与刘希杰。刘希杰的堂弟——地主刘希敬与大地主罗云鵬等一起組織了“联庄会”，汇成了一股反动势力，騎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們保护自己，欺压乡民。終日为非作歹，耀武揚威，称霸一方。

且說村里有个雇农，名叫田士凤，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田福，一个叫田祿。父子三人，沒有一分土地，全靠扛活为生。

有一年田士凤在地主罗云鵬家里当长工。罗云鵬自己心怀賊心，却怀疑田士凤偷他家东西，但苦于拿不到把柄，对他恨之入骨。

那年六月，有一伙外来人要搶大地主罗云鵬，他們一进院却被罗云鵬发觉，持枪守住西院，双方对打起来。这伙人

見羅家已有戒備，打不進去，氣憤之下，放火燒房，熊熊的烈火頓時染紅了村西半边天，他們放火之後，就出村而去。

這一次地主羅雲鵬損失很大，他的母親小腹中了槍彈，不治身死。羅雲鵬痛恨切齒，一定要報這殺母之仇，却找窮人消恨，硬誣田士鳳跟這伙人是同謀；認為他家的院門是田士鳳給他們開的。但苦於沒有證據，只好把這一股仇恨暫時記在心裡，等待機會發作。

這時，逃跑在外的老百姓陸續回村。田士鳳父子跑在前面，先回村，沿途揀了些那伙人扔下的東西。羅玉恆（是後來的國民黨區分部委員羅雲祥的父親）見財眼熱，企圖霸占，不成後，一氣之下，就跑到本村“聯莊會”頭子劉希敬那裏，誣告田士鳳父子砸明火，“私通土匪”，是這伙武裝的坐探。劉希敬當時找了羅雲鵬和偽保長臧福善一起密商。羅雲鵬早就想剷除田士鳳，以泄私憤。三人就又找了大地主劉寶惠家護院的二瓦匠孫二，到田士鳳家裏搜查，找出他們揀來的東西，就把田士鳳和田祿綁了起來。田福這時已聞風逃跑，“聯莊會”派人追趕到栢福村西邊，抓了回來。

凶手劉希敬、羅雲鵬、二瓦匠孫二把田士鳳父子三人拉到村西口，不分青紅皂白就用亂槍把他們父子打死了。

田家父子死了以後，村里就再沒有田姓子弟了。但是在神駒村的歷史上又為地主統治階級記上了一筆血債。

增資減息挫地富 革命紅旗驅神駒

共产党游击队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已經在通州地区开始活动了。神駒村里村外,时常有游击队来,夜里来,天亮走,活动十分頻繁。不久,貧雇农逐漸与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很多青年农民給八路军跑敌情(送情报)。一九四四年本村貧农馬魁元、王保祺先后参加了八路军。貧雇农开始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前途,从此跟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逐漸由自发的斗争发展成自觉的有领导的革命运动。

且說一九四四年,凉水河决口,全村被水淹,顆粒无收。地主刘希敬、刘振鐸、刘宝賢、罗云鵬、罗朝荣、罗朝勋、王玉清和富农罗玉桐、惠瑞林等在地主罗朝荣家,合謀在荒年也不能减少自己的收入。于是决定降低雇工的工資,把好活每年掙八石棒子、随活掙五六石棒子的工資数,一律降为三小石棒子。那时正当秋后,貧雇农的工資一下子降为三石,家里沒吃沒喝,再找活也是一年三石粮,怎么养活一家老小呢?于是凡是有点办法的都紛紛离乡背井,到外地找活去了,但是家累大的哪里离得开?只得留在村里,忍受着惨重的剝削。

到了一九四五年,麦收的时候,八路军游击队从永乐店西下,到达西堡(那时神駒属西堡乡管轄),党派了梁瑞、苏民等同志到这一带开展工作,地方工作人員任茂等同志直接领导神駒村的工作。

本村貧雇农实在不堪地主的压榨剝削，听说附近各村共产党正在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貧农张寿安、刘玉江首先发起，召集了王怀仁、韓連才、周存孝、宋洪来、王廷元等数人开会。大家推出张寿安、王廷元为代表到东堡去找共产党请示办法。他们在东堡，找到我党情报站站长严兆祥，取得了指示。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增加工钱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七月中旬，麦秋过后，开展增资运动的喜讯传遍了全村每一个扛活的农民，在村北窖疙瘩后面召开了貧雇农大会。那天正是大雨过后，一片汪洋，大家趟水到会，情绪十分激昂。张寿安传达了党的指示，会上一致决定：公开向地主提出增资要求，由每年三石粮增加到四石五斗，如果地主不同意，就全体罢工。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本村的伪保长是破落地主罗云舫。罗云舫当时在外表上伪装积极，给八路军送过粮，送过军鞋，骨子里却十分反动，曾和日伪警备队警长馬宝山結为磕头弟兄，和中队长賈宝昆是生死之交，暗地里为他们效劳。

貧雇农开会后的第二天，消息走漏，本村大地主罗云鹏、刘宝惠立刻把罗云舫叫到采育一家饭馆里去吃饭密議。他们对罗云舫說：“穷小子现在要鬧增资，这簡直是胡来！反增资这事就交给你了，你是保长，你去专署告他们，成功后自有你的好处！”

回村后，地主們差工役罗朝俊給罗云舫送去了一些棒

子和麦子。罗云舫感激之余，立刻打发罗朝俊去把张寿安、刘玉江二人叫到村公所。准备撕破假面具，为地主阶级效劳。

张寿安、刘玉江两人来到村公所，一看罗云舫、副保长刘文治两人站在炕上，气势汹汹，心里早已明白他们不怀好意。罗云舫一见他俩进来，就用手一指说：“我找你们不为别的，听说你们扛活的要闹增加工钱。张寿安，我告诉你，你们别去找地主要，你们敢要，就冲着我罗云舫要，你们要能要得出去，我姓你的姓，不姓罗。你们要打官司，咱们手拉手走。”张寿安听了，气愤地说：“我要是要不出来，我不姓张。”气得罗云舫破口大骂，刘玉江一急，准备掀起一块炕砖砸过去，可是叫张寿安给拉走了。此后，罗云舫曾多次公开谩骂贫雇农，抗拒增资运动。

当天晚上，张寿安、刘玉江跑到东堡，找工作人员汇报情况。第三天的晚上，任茂等同志来到神驹，召集全村地主、富农开会，宣布了共产党的政策，对他们训了话，并提出：

一、增资一定要实现，每个长工增资五斗；

二、秋后要进行减租减息（二五减租）；

三、明年雇长工，不许挑肥拣瘦，一概由增资小组长派活。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群众的斗争，在广大贫雇农的压力下，地主富农不得不一一答应，几天以后长工们就拿到了增加的工钱。这是神驹村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地主斗争获得的第一次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贫雇农对地主阶

級进行斗争的信心，大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使广大农民深深地体会到要取得解放，一定要紧紧地跟着共产党走。

在农民斗争的基础上，神驹村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并在党的领导下，选举了村政权。把罗云舫、刘文治赶下台去。

秋后，开始实行了二五减租。

刘罗两霸狗咬狗

贫苦农民倍遭殃

且说本村孙、宋、刘、周、罗五姓地主中，近百年来只剩下刘、罗两姓地主把持着全村大权。刘姓又分南刘、北刘两支。两刘一罗地主在解放前霸占着全村土地四分之三，约三十余顷。他们为了鱼肉人民，纠合起来狼狈为奸共同欺压贫雇农；但他们互相间又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争权夺势，使广大劳苦农民倍受灾难。

罗姓地主，利用宗族关系欺压和压榨同姓的贫雇农，甚至连贫雇农家死了人，都不能埋在罗姓的坟地上；已经埋了的，也被地主把尸骨挖出。一九三九年，发起什么重续“家谱”，整顿“清明会”，借机兼并土地三四十亩作为“祭田”，加强家族统治和剥削。

刘姓地主，依仗了伪保长、伪乡长的权势，肆意欺压群众，并和罗姓地主明争暗斗。真是奸对奸，狗咬狗。

罗姓地主中的罗云舫，吃喝嫖赌抽大烟，阴险毒辣，满

肚子坏水。十九岁就加入地方流氓組織“穷八帮”（青帮的一支），結交流氓头子，出入衙門。他为打下刘家势力，在一九四〇年日伪警备队流窜本村时，勾結汉奸，胡作非为，欺压群众，并借日伪势力把伪保长刘希敬（地主）赶下了台。

一九四二年，本村开始有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当时貧农馬魁元、王保祺等人与八路军取得联系，为他們跑敌情（并于一九四四年参加了八路军）。伪保长勾結刘希敬，抗拒游击队“按村借柴、按戶借米、按鎮借錢”的办法，少报戶口、田亩，削減給游击队的柴米，飽填私囊。罗云舫当时一面繼續与汉奸鬼混，一面伪装进步和八路军联系，說出刘希敬等人隱瞞戶口的事情，騙取信任，一九四四年当上了保长。罗上台后，对八路军阳奉阴违，骨子里一心为地主阶级效忠，在一九四五年的增资运动中，原形毕露，后在群众斗争中被轰下了台。

刘希敬被罗打下去后，怀恨在心，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解放军轉向东北、国民党杂牌軍三大队到达时，便依靠国民党的力量当了西堡乡的伪乡长，控制了神駒村，他就派人把罗云舫等人綁来，說他們“私通八路”，吊打了一頓。罗云舫托人說情，被放出来，向刘认輸，并花了八石粮食，請刘希敬等人到采育大酒大肉吃了一頓。

罗云舫表面服輸，暗地里在議計密謀，多方活动。一九四七年春，通过西田阳他的亲戚（反革命分子，十区伪农会負責人），积极筹备伪农会，在村內外发展組織，扩大势力。又在村里重整旗鼓，耀武揚威起来。刘希敬在一九四八年

也到处奔走，活动上一个伪“乡民代表”，准备当一名伪国大代表，招兵买马，扩张势力范围。罗、刘地主勾心斗角，加倍欺压农民，但美梦未圆，解放大军浩荡而来，这些牛鬼蛇神就鸡飞狗跳，跑的跑，藏的藏了。

全村高歌颂解放 人民翻身做主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正当地主刘希敬刚当上伪“乡民代表”两个多月，幻想着一步步往上爬、将来当个伪国大代表、能够有财有势的时候；正当罗云舫组织的伪农会成立刚二十多天，企图通过另一条道路升官发财的时候，晴天一声霹雳，解放大军风驰电掣般地来到了神驹村。林彪、罗荣桓两位将军也来到神驹，至今神驹的人民一谈到这一点莫不眉飞色舞，引为莫大的光荣。从此，神驹人民拨开乌云见太阳，苦日子熬出了头。

解放军一到，首先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的子弟兵为老乡扫院子、挑水，敬老爱幼，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几十年来，灾难深重，一直生活在兵慌马乱中的神驹人民，看到了这样的军队，哪能不深受感动？因此，很快就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他们给解放军送水、做饭，参加担架队。当时驻这村的部队主要是汽车队，很多人冒着严寒，不避艰险，给汽车队带路，与解放大军一起奔赴前线。

一九四九年一月，神驹村正式成立了人民政权，设有村长和生产、民政、财粮、会计、文教、卫生等委员。十月建立

了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进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本村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了富农的土地。贫雇农共分得土地一千九百一十亩，房子五十七间半，牲口十头，大车五辆以及农具若干件。“土地还家”这是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他们对党发出了由衷的感激。

从此，解放了的神驹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开展了各项运动，积极进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他们由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到一九五八年组织了人民公社。从此神驹村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过去，神驹村的人民曾以自己美好的愿望、丰富的想像力，创造了许多奇异美丽的传说，今天，解放了的神驹人民，对“神驹”的村名又赋予了更新的含义；神驹，它象征着祖国的一匹千里骏马，雄姿英发，正迈开飞快的步伐向着美好的未来奔驰！

（神驹村村史编写组编，冯嘉芳、杨耐思记。毓继明图）

一坊血債官司

大興縣長子營人民公社社員 劉寶善

(一)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個日子。

那天一清早，我們全家都在焦急不安地等着爸爸回來。昨晚上，村上那個惡霸地主郭瞎子突然把我爸叫了去，要我爸在夜里去看場，爸爸是個實心眼兒，沒有多想就去了。可過了整整一宿，還不見回來！

快吃早飯了，爸爸還不回來。家里人等得發慌，一個個心驚肉跳，媽就讓我去找爸爸。我雖然還只有六歲，但已開始懂事，就匆匆地出門找去了。剛走出門口，就聽人說，爸爸在看場的窩棚里，被人活活地殺死了。

這真是晴天霹靂！媽一聽，像突然掉了魂一樣，臉色煞白，兩隻手哆嗦着，身子一下子癱倒在地。鄰居把我媽摟扶到窩棚邊，她一看爸爸那血肉模糊的身體，一下就昏倒在地。有瘋病的爺爺、大伯，經這一吓，也突然清醒過來。大伯氣得口里直冒白沫，呼天搶地地哭喊着：“兄弟啊，你死得

惨啊！你告诉我，是谁下的毒手，我要给你报仇！” 瞎子大娘们也擦着眼泪说：“是哪个断子绝孙的向这么个老好人下毒手！叫他不得好死！”

这时，那个郭瞎子和地主村长胡士杰也摇摇摆摆地朝这边来了。他们一来，村里人都悄悄地走开了。

郭瞎子歪着脖子，那只独眼使劲地转着，假意劝我妈妈说：“别哭了，这也是命里注定的。生前没修好德，如今落得这个惨景！人既死了，就不要再让他暴尸露丑了，赶快入殓下葬吧！”说完，也不由人分说，就要叫人抬尸入殓。我大伯死抱着尸体不放，哭着说：“我兄弟死得不明不白，我要报官验尸，你们不许动！”郭瞎子露出一脸凶相，指挥乡警说：“把这疯子拉开！”我大伯猛地从地上爬起来，直向去区公所的路上跑去。郭瞎子一看，赶紧叫几个乡警，追上我大伯，打的打，拖的拖，把他关进一间小屋，看管起来。那天夜里，我大伯又偷着跑出去一次，却又被郭瞎子的人抓了回来。

按我们家乡的老风俗，死人要过“接三”才能出殓。但是，第二天，郭瞎子和村长胡士杰就要把我父亲下葬。我妈妈趴在棺材上哭得死去活来，大伯抱着棺材，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兄弟死得冤哪，不能就这样含冤入土啊！……”我和姐姐弟弟们也抱着大人的腿哭着，全家乱成一团。郭瞎子和乡警推开我和妈妈和大伯，叫人抬起棺材就走。棺木刚入坑，我大伯怀里抱着四块青砖赶到了墓地。他推开旁人，把青砖压在棺盖上，然后跪在灵前哭着说：“好兄弟呀，我一定给你报仇！有朝一日，你的仇报了，再拿掉青砖，让你翻个身，重

見天日！”

就这样，我爸爸不明不白地死了，又被郭瞎子催着匆匆忙忙地埋了。究竟是誰把爸爸杀了？究竟为什么要杀死我爸爸？我当时还小，还不懂得。但那天爸爸死的情景，我一直記在心里。

(二)

父亲一死，留下大小五口人，媽媽，我，十一岁的姐姐，还有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两个弟弟。媽媽把悲痛和仇恨埋在心里，带着我們姐弟儿人苦熬日子。全家沒明沒夜，累坏了筋骨也塞不飽肚子，两个弟弟都先后因餓冻死了。沒有办法，我就去給富农陈志清家扛小活，还是混不下去。后来，我十二岁那年，又只好离开家到天津去当学徒。临走的前一天，媽媽哭了一整夜。她看到刘家只剩下我这一条根儿，实在舍不得放我走。該起身了，媽攬着我的头哽咽着說：“孩子，去吧，到外面闖闖，长点見識，学点本領，回来好……”我实在憋不住了，可又不敢哭出来，怕惹媽媽伤心，就什么也沒說，掙开了媽媽，一直走了出去。……

到了天津，一跨进工厂的大門，我就后悔起来。唉！这哪里是工厂，簡直是活地獄。好多小伙伴，个个面黄肌瘦。监工像个瘟神，拿着三尺长的粗木棍来回游蕩，看誰不順眼，当头就是一棒。在厂里干了一个月，就把我折磨病了。我被送到了“病号間”，那里屎尿滿地，臭气冲天。一天只給兩頓飯吃，一頓一碗稀粥。我的病越来越重，老板看着从我

身上榨不出油水来，就把我赶了出去。回到家里，躺了半个月，病慢慢好了，就再去扛活。

父亲是谁害死的，妈妈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我年岁渐渐大了，风言风语地听说父亲是叫郭瞎子杀死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却弄不明白。去问乡亲，谁也不敢说。问我妈吧，怕提起这事惹她难过。郭瞎子家就在我家邻近。一天，他和他叔叔不知为什么吵起架来，越吵越凶，后来他叔叔就破口大骂道：“妈的，你怎么富的？我还不知道，你不就是害死了那个姓刘的，霸占了人家的产业才富的！”这回我再也忍不住了，就回去问我妈：“父亲是叫郭瞎子杀死的不是？”妈一听，突然间，浑身颤抖，眼发直，腿发软，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我吓得赶快抱住了她。过了半晌，妈才流着眼泪慢慢地把事情的原委给我诉说了一遍。

原来我爸爸就是被这个恶霸郭瞎子害死的。

爸爸被叫去看场的那天晚上，正是个月黑天，伸手不见五指。爸爸在窝棚里，郭瞎子也来了，而且对爸爸显得特别亲热、和气，跟我爸爸拉这个，扯那个，还非得叫我爸爸唱戏凑热闹。爸爸本来在白天劳累了一整天，晚上又被这样折腾了半夜，实在咽极了，一倒下去就呼呼地睡着了。正在我爸熟睡的时候，郭瞎子就悄悄拔出早就准备好了的尖刀，狠狠地向我爸爸的头上扎去……。

我爸就这样死了。郭瞎子以为自己做事机密，神不知，鬼不觉。谁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郭瞎子杀死我爸的时候，叫另一个看场的乡邻看在眼里，人家明里不敢直说，可暗里

就慢慢传开了。终于也传到了我妈妈的耳里。我妈妈又哭得死去活来，但天下是人家郭瞎子的，谁敢伸冤。妈妈就这样含冤忍辱地生活了这几年。一提起这些，妈妈就伤痛地止不住流泪，她愤恨地说：“这些年妈妈带着你们可真不容易啊！郭瞎子总想逼走我，可我就是不走，再艰难也要把你拉扯大，好给你父亲报仇！”我听了妈妈的话，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去和郭瞎子拼了。妈妈又拉着我说：“孩子，你年岁还小，现在还不到报仇的时候。郭瞎子可是啥事都干得出来的，到外面你千万不要讲这事，免得他再对你下毒手。你要长点心眼，不要莽撞，过几年，你长大了，再同他算帐！”

(三)

恶霸地主郭瞎子为啥下毒手害死我爸爸？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原来是为了吞没爸爸和伯伯的田地、家产。

本来，我们老家不是在这大兴津营村。早辈子老家在河北景州，到清朝咸丰年间，景州闹饥荒，才逃到这里来。经过几代人的扛活打短、省吃俭用、流血流汗劳动了几辈，到我爷爷这一代，才好不容易置了些田地。可这就引起了村上恶霸郭永海的眼红，一心想霸占这些田地。

我爷爷、奶奶和大伯，不幸都得了疯病，到一九一五年，我的二爷爷又死了，只留下我二奶奶和一个闺女。这时候支撑门户的，就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郭永海看看我家老的老，少的少，死的死，疯的疯，以为时机已到，就更加处心积虑地想吞占我家。他先从我二爷爷处下手，然后再来

动我爸的十五亩地的脑筋。提起这个郭永海，真叫人恨得咬牙切齿。他是村里有名的一霸，又是村公所里的一个什么头儿，和地主村长胡士杰有勾结。胡士杰叫乡亲们出钱给郭永海哥三个每人买了一枝枪，名义上是叫他们巡夜护村，实际上是给自己当打手。郭永海整天提着盒子枪在街上乱窜，到了谁家，谁就得倒霉，谁得罪了他，就对谁下毒手，真是图财害命，烧杀奸淫，无恶不做。他是个独眼龙，一使坏心眼，就歪着脖子使劲挤那只瞎眼，挤得嘴都歪起来，乡亲们背地里都叫他“郭瞎子”。邻村有个老实巴焦的人，见了面不会奉承他，他怀恨在心，就放火烧了人家的秫秸。他想霸占一个贫农的丫头，就叫人把那个贫农叫到他家里，黑丧着脸说：“我给你说明了，从今儿个起，你丫头就跟我过了，你有啥说没有？”在那个时候，贫农敢说什么呢！他还在村南开了一个黑店，经常搶劫过路行人的钱财。他看到过路人带的财物多，就随便找个词儿，不是枪崩，就是活埋，好把人家的财物弄到他手里。有一天，一个过路人穿着皮袄，带了不少东西，他就说人家是土匪，到夜里枪崩了那个人，东西全归他自己，连衣服都给人家扒了。

我二爷爷一死，郭瞎子就下手吞占。那年，我二奶奶的闺女正要出嫁，为买嫁妆借了郭瞎子家几块钱，没想到，这几块钱就成了郭瞎子要我们命的索子。郭瞎子用利上加利的驴打滚的高利贷，连骗带逼地硬要我二奶奶典给他十八亩地。字据上明明写的是典十八亩地，郭瞎子又连拐带骗，末了却让他占去了整整三十亩地。地主村长胡士杰也出来

帮郭瞎子的忙，因为二奶奶的房正紧邻着胡士杰，他也正想吞占我二奶奶的房子，想等她一卖地好去“买”她的房，所以两个人合起来打鬼主意。

一不做，二不休，郭瞎子夺了我二奶奶家田，就还想杀了我爸爸，再逼我媽改嫁，这样，就不怕我爸报仇，还可以霸占我家的田产业。

吞了我二奶奶田地的第二年，郭家在那三十亩地上收了二十多袋芝麻，真是得意洋洋。可我家少了三十亩地，日子实在没法过，我爸气得跺脚说：“甭叫他美！秋后我就是卖了孩子也要贖回那三十亩地！”这话叫郭瞎子听见了，心里着实不安心，他把盒子枪啪的往桌上一摔，说：“哼！说的倒容易，要贖地，先摸摸你脖子上长了几个脑袋，生了几条筋！”郭瞎子起了杀人的歹心，我爸是老实人，没想到他真会下毒手。爸爸就这样被郭瞎子害死了。

(四)

一九三五年，我二十五岁。心里埋了二十年的仇和恨，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报仇雪恨。

这年我二奶奶死了，郭瞎子又生了歹心。他硬强迫我把二奶奶的养子赶走。我看透了郭瞎子的黑心，他是想叫我赶走了二奶奶养子，绝了后，然后再霸占我二奶奶的全部家产。我坚决不答应，同他吵了起来。他那个凶样子把我媽气坏了，就说：“郭瞎子，你害死了他爸爸，还想再害死他！”这一来，郭瞎子恼羞成怒，歪着脖子，挤着那只瞎眼，一

蹶老高地說：“我就是要害，我全要害！”旧恨新仇，实在无法再忍，埋在心里二十年的怒火暴发了。我拍着桌子說：“郭瞎子，你的心腸也太狠毒了，你杀死了我父亲，霸占了我二奶奶的地，还不死心，还想把我二奶奶这个門儿給灭了。告訴你，我刘宝善可不是好欺負的……”我痛痛快快罵了他一頓，把他为非作歹、图財害命、杀死我父亲的事情全都揭了出来。

仇恨的閘門一經打开，就再也沒法关闭，我到区公所告下了郭瞎子。这时胡少敬已接替他爸爸胡士杰当了村长，他和区上一說，就把这个案子給压下了。你压下了案子，可压不下我这股恨气，我要另找說理的地方。一咬牙，我把仅有的十五亩地卖了十亩，又到北平市地方法院告了状。

郭瞎子見我真的鬧了起来，做賊心虛，就和胡少敬商量，想让我贖回那十八亩地，好叫我不声不响，就此作罢。他連騙带吓地对我說：“贖回地，不准再提你爸爸的事，要不，就把你送官治罪！”好毒辣的手段！杀了人，还想堵住人家的嘴！呸，沒那么便宜的事，你的算盘打錯了！我决心把官司打到底。

状子递上去十几天，还没有半点消息。我又去催了几次，法院才过了堂。法官先向我們扫了一眼，然后慢吞吞地問道：“被告郭永海，刘宝善的爸爸是你杀死的嗎？”郭瞎子馬上向前走了一步，躬着腰，滿面带笑，恭恭敬敬地說：“嘿，法官先生，这事从哪里說起呢？他沒根沒据，张口咬人，我怎么会杀死他爸爸！”法官又叫我說。我就把事情源源

本本說了个一清二楚。最后，我对郭瞎子說：“你杀死我父亲的事，村里誰不知道！你們叔侄吵架都抖了出来，这还能賴掉！我問你，要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不准报官驗尸，不过接三，就强迫把尸体下葬入土？”郭瞎子干咳了几声，支支吾吾地說：“那，那都是村长胡士杰的主意。”法官要传胡士杰，郭瞎子急忙湊上去說：“胡士杰死了。”这家伙竟敢青天白日在大堂上說瞎話，气得我大声說：“你胡說，胡士杰沒死。”可是沒有等我說完，法官就搖响了鈴鐺，打断了我的話，宣布“案情不明，尙待調查”。夾着皮包走了。我狠狠地跺了跺脚，离开了法庭。心里說，你們想怎么調查就怎么調查，反正你不能把真的調查成假的。

回到村里，我直奔胡士杰家。見面就問他：“你知道不知道我父亲是叫人杀死的？你当了几十年村长，不知道被杀死的人要报官驗尸！为什么沒驗尸你就叫郭瞎子把人埋了？”胡士杰說不出理，只得推說那是郭瞎子的主意。我說：“你們不要推來推去，这笔帳非算清不可！”

郭瞎子怕有人給我作証，就放出話說：“各人的事各人擋，誰敢出來管閑事，哼！我叫他瞧好看的。”他又向法院的上上下下使了許多錢，胡少敬还幫助他請了个律師。我想，你有錢买律師，我去用理說律師。一天，我找到了郭瞎子的律師，对他說：“先生，您是幫人打官司的，您的心眼儿一定公正，应当給有仇的人报仇，有冤的人伸冤，我含冤二十年了，請您給我說句公道話吧。”律師对我眨了眨眼，慢条斯理地說：“我是郭永海請的律師，花了他的錢怎么能替你說話

呢？”尽管律师这样说，可我仍然没有泄气，总想着有理讲倒人，你们再有錢也不能把这“理”买去吧！以后，又过了几次单堂，問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打官司要花钱，几口人要吃饭，十亩地的地价花完了，官司仍然没个结果，真急死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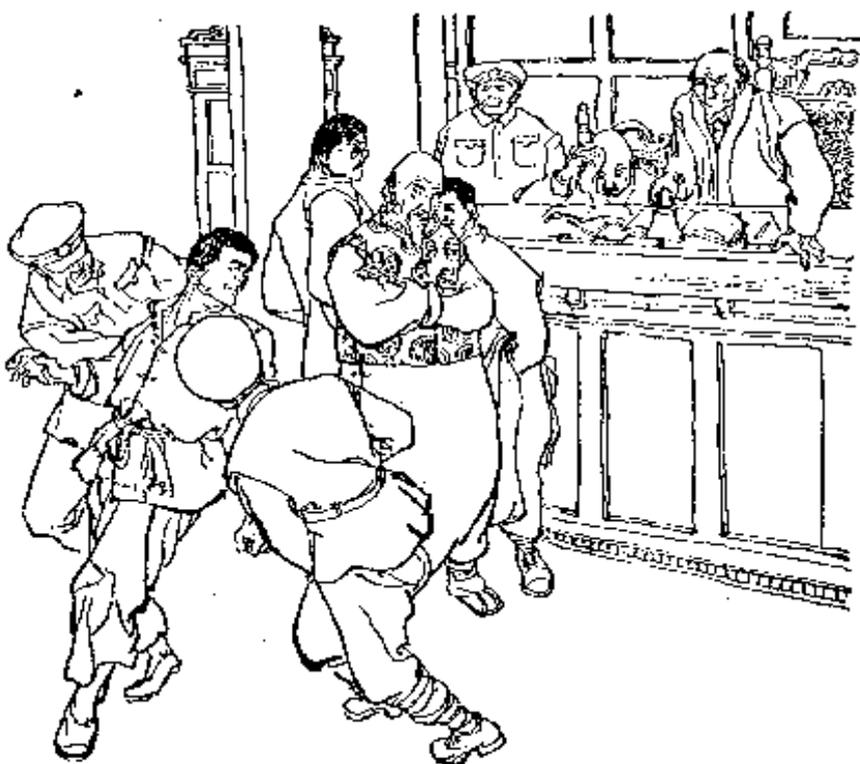
又等了一个多月，才接到法院的通知，叫我第二天去听判决。那天夜里，我翻过来，滚过去，就是睡不着。是黑是白，就看明天了！一想到郭瞎子、胡少敬有錢有势和那律师的话，我的心就凉了。我心想，难道我父亲的仇就报不了？这十亩地就白贴进去了？又一想，不会吧！常言说“人命关天”，别的事情能胡来，这人命官司总不能胡来吧！再说，又是北平市的法院，不会那么不讲理。这样一想，我又相信官司会打赢。

天麻麻亮，我再也躺不住了，爬起来就向法院走去。法院的大门还没有开，我就在门外等着。后来大门虽然开了，但过堂的时间还不到。这天，时间过得好像特别慢。我坐得不耐烦，就起来走一会，走得不耐烦，又坐下来，立坐都不是滋味。直到快过堂了，郭瞎子、胡少敬同他们的律师，才晃晃悠悠地进来了，脸上的神气得意洋洋，一点都不带打官司的样子。我心想，看样子糟了。

过堂时，法官的问话和郭瞎子答的同上次差不多。然后，胡少敬和那个律师又替郭瞎子狡辩了一通。我正要说话，法官就站了起来，宣布判决。我一听听到“郭家无罪”，脑袋就嗡嗡直响，眼前金星四起，一切东西都转了起来，想要说话，可就是说不出来。迷迷糊糊地我被人搀出了法院。

就这样算完了嗎？二十年的冤枉就这样石沉大海？不，不能！不出这口气，我死了也合不上眼。听说北平还有个高等法院，我想也许那里好一点，就又求人写了一张状子递到北平市高等法院。状子递上去，一连两个月没有一点音信。

这期间只见郭、胡两家的人，不断往城里跑，也不知他们搞的什么鬼。好不容易盼到了过堂，没有问多久，就宣布判决，说的同地方法



院一样。这一回，可把我给气炸了，不由得高声问道：“你们调查了没有？官司就能这样问？这叫什么法院？……”话还没讲完，法官赶忙叫人强把我架了出来。

出了法院大门，我就放声痛哭了一场。打了一年官司，二十年的仇没有报，反而越结越深了，不只是郭瞎子，又添上了地主村长胡少敬。我慢慢明白，原来这世道儿就是不讲理，村长、区公所、北平市地方法院，直到高等法院，全是一路货。他们和有錢人站在一边，专给有錢人办事，专会收拾

穷人。他們認的不是理，而是那個能使鬼推磨的“錢”！

沒有講理的地方就不報仇了嗎？不！我不甘心！我總想找個別的法子。想來想去，什麼法子也想不出來。最後就想先忍住這口氣，好好孝順老母親，照看小孩子，把母親送了終，孩子長大了，叫他們到遠處找自己的活路。然後，我就和仇人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血拼一場！

(五)

官司輸了，還措了一身的債，怎麼過日子呢？去扛活吧，工錢還不夠還利息。租地種吧，必須先交出一年的租。沒有辦法，後來只有把最後的五畝地也典了出去，才租種了一家富農的二十五畝地。我想只要咱肯下力好好種它幾年，也許能有活路。誰知禍不单行，那一年偏偏又碰上大水災，平地漲水半人深，庄稼全叫淹死了，一顆糧食也沒有收。借錢吧，沒有東西抵押，誰也不肯借。眼看一家大小就要餓死，身後還跟着要債的催命鬼。我越想道兒越窄，又急又氣，一下子就病倒了。

仗着身子骨結實，家里人又不斷給我說寬心話，病慢慢好起來了。我就把母親和媳婦叫過來一起商量條活路。商量了半天，都想不出法子。留在家里是等死，我和媳婦出去找活路吧，又不能把小孩留給母親。活路沒有找到，我的氣又上來了。我大聲喊着說：“大人都保不住，還要孩子做什麼？”母親一看我急了，就哭着說：“你和媳婦出去找活路吧，孩子留給我，你們別管。”母親這麼一說，全家都止不住大哭

起来。最后商量好，我和媳妇、十二岁的大孩子到北京找活做，母亲和我的闺女、二小子留在家里。一个和我一起扛活的穷兄弟，听说我们要去北京，给我送来了一块钱。他拉着我的手说：“托人找事也要花钱，把这个拿去吧。”

那年头，一分别也许再也见不着面了。家里剩了一老两小，日子可怎么过？大家心里都感到很难过，越是要分别就越不愿意提起分别的事，直到要走的那天，家里还好像没有一点事儿一样。可是孩子不像大人，临走时，三个孩子，留下的舍不得离开妈妈，要走的舍不得离开奶奶，都抱着大人的腿哭起来。孩子妈忍着眼泪哽咽着说：“孩子，好好跟奶奶在家，妈挣钱去，挣了钱给你们买……买好吃的……”孩子哭着说：“我要妈，不要好吃的。”全家老小抱在一起，又是一场痛哭。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到了北京。这时候，北京已经叫日本鬼子占了，秩序很乱，找事儿很不容易。我把媳妇领到佣工介绍所给人家说好话，送礼物，才给媳妇找到了事儿，她去给人家当老妈子。又托人送大儿子去皮鞋庄学徒，我去洋车厂拉洋车。就这样，一家六口，分散到四个地方。

那时候，拉洋车也不是人干的活。穷人多，富人少，拉车的多，坐车的少，一天挣的钱除了交车租、店费就剩不了几个。碰到风雪天更难过，不出车吧，一天的伙食没有着落，出车吧，往往挣的不够交车租。拉不上座儿很发愁，一拉上座儿可就得没命地飞跑。有钱人坐在车上呼三吆四地直喊“快跑！”有的就用文明棍敲你的脊梁。最可恨的是日本鬼

子，他們簡直不把車夫當人看待，常常故意作弄人，越是看到你快累死了，越嚷“快快的！”“快快的！”等車夫一個筋斗栽到地上，再也起不來了，他却樂呵呵地下車就走。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我不知看到了多少回！我不願意拉日本鬼子，總是躲着他們，可有時叫他們喊住了，也沒有辦法。有一回，我拉了個日本鬼子，到了地方，一說要錢，他瞪着狗眼，劈里叭啦地打了我幾個耳光，打得我朝后退了几步，他却揚長而去。我常想，有錢人是人，窮人也是人，為啥拉着他們還得受他們的氣？

已經是陰曆快十一月了，有錢人都穿起了皮袍，有的洋車夫卻只能到店里要幾張破報紙，撕成條條，從腳脖一層一層地纏到大腿根，再披上兩條破麻袋，來抵擋那刺骨的西北風。晚上，就到飯鋪里討些熱水，裝在煮飯的沙鍋里，摟在懷里，暖暖心窩。賣烙餅的小販，在街上砌有磚爐子，夜里火滅了，爐膛里可還有點熱氣。交不起店費的洋車夫，就縮着身子鑽到爐膛里熬過漫長的冬夜。

我的病本來就沒有好利落，現在吃不飽，又勞累，加上看不慣這世道，受不了有錢人的氣，拉了一個多月洋車，又病倒了。正在這時，聽說我大伯叫日本鬼子打死了。又惦念家里的老小，怕惡霸地主再對他們下毒手，我就決心回家去。

北京離我家只有七八十里路，平素回家不算什麼，六七個鐘頭就到家了。這回因為有病，渾身酸疼，一根根骨頭好像全酥了，動一下，就像針扎一樣。腳上也像套上了千斤鐵鏈，抬一抬腿都很艱難。我找了根棍子拄着，咬緊牙關，一

会一歇，慢慢地往前挪。天黑了，还有二十多里路。这时，我的脑袋简直成了空的，嗡嗡直响，心里噁心得要命，老想吐，可又吐不出来，眼一黑，就昏倒了……。

当我心里明白过来时，全身都冻僵了。胳膊腿都不听使唤，费了好大劲，刚站起来，就摔倒了。歇一会，再站起来，还没站稳，又摔倒了。摔了几回，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棍子也不知摔到哪儿去了，我哆嗦着把手伸出去，在硬梆梆的地上摸了好久，也没有摸着。抬头望天，一个星星也没有，向前一看，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那西北风尖声呼叫着刮过去，刮得我的脸像刀割一样疼。我躺在地上，又想到二十多年的冤仇，想到三次告状的前前后后，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流。看来，我刘宝善今天非死在这路上不可了！迷迷糊糊，忽然我好像看到爸爸那血肉模糊的尸体，看到了郭瞎子那副杀人的凶相。不，我不能死，我不信天下老是有钱人的，我不信穷人就沒有出头的日子，我要看看这世道到底变不变！不能走，我就爬！我挣扎着坐起来，把手放到嘴上呵气，手能稍微活动了一些，我就脱下脚上的两只破靴头，套在两只手上，用两只手和两个膝盖，撑着身子朝前爬。我不敢回家，怕妈妈看到我这个样子伤心，就向我姐姐家爬去。爬到我姐姐家门口时，已经半夜了。我不能叫姐姐看到我是爬回来的。又休息了一会，慢慢把破靴头穿在脚上，使劲扶着门框，颤颤抖抖地站起来，找了块砖头，使劲地砸门。门开了，把姐姐吓了一跳，我想喊一声“姐姐”，但喉咙好像叫什么塞住了。等姐姐认出是我时，什么都明

白了，啥也沒有問，就一邊擦淚，一邊同姐夫把我架進屋去。

我惦記着媽媽和孩子，第二天，一定要回家。姐夫看留不住，就借了個毛驢，把我馱到家里。可憐的孩子，看見我回來了，還真以為我掙了不少錢，直向我要好吃的，我媽趕快瞪了他們一眼，孩子才不說話了。

這是我們家最艱難的時候，我病在家里，媳婦一月才掙一塊錢，哪里能顧住五口人。家里可真是米光面淨揭不開鍋了。難道說就都沒有個日子過得去的親戚？有，我舅家就是個地主，既是至親，又有的是錢。可是，有錢人只認錢，不認親，雖說我表哥是我媽抱大的，可是，我父親死后二十多年來，他們從來沒有跨過我們家的門檻。窮死我都不巴結有錢人，你不來，我也不往，這門親就斷了。真正幫了我的忙的倒是窮親戚和窮哥兒們。我姐夫是個常年扛活的，不斷來我們家，來時沒多有少，沒好有壞，總要給我們拿點東西。我扛活時的窮哥兒們也常來看我。他們沒有東西拿，就來和我說說話，寬寬我的心。

年關到了，有錢人殺豬宰羊，磨面蒸糕，喜氣洋洋。可我們家盛米面的傢伙照舊是光噹光噹响。大年 初一，孩子們纏着奶奶要吃餃子，哪來的白面啊！媽用紅高粱面摻榆皮面和在一起，湊合着包了一頓餃子，還哄着孩子們說：“紅餃子好，紅餃子吉利。”孩子們餓了幾天，哪管紅面白面，高粱面餃子吃得也滿香，還一邊吃一邊說着：“紅餃子吉利，紅餃子吉利。”我和媽媽可背着孩子，擦起了眼淚。

媽媽苦心照料了二十多天，我的病才慢慢好了，病稍

好，我就又去扛活。又过了两年，大儿子受不了掌柜的打罵，跑了回来，媳妇干活的那家不用人了，她也回到家里。我們一边想法糊口，一边还要提防着恶霸地主。我知道，打官司之后，他們更恨我了。扛长活，活主固定，他們容易摸我的底，我就給人打短，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叫你找不着我。每天天黑以前我就赶到家里，防备他們路上暗算。怀里还經常揣着把刀子，恶霸地主敢收拾我，我就得先在他头上穿个窟窿。我把窗子用砖堵起来，只在上边留几道縫儿。天一黑，就把大門上得結结实实。我还借了一把义和团用的三尺长的大刀，把它磨得雪亮，放在床头。

这个社会就这样把我害得无处藏身，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正当这些恶霸、地主、官僚、老板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时，我听说什么地方出了共产党、八路军，专门斗地主，帮穷人，我心里突然一亮，盼望着共产党、八路军赶快来搭救咱穷人，来变变世道！

(六)

沒等着我报仇雪恨，郭瞎子就死了。村里人都拍手称快，可我們穷人仍旧翻不了身，仍旧是吃不饱、受欺侮，世道沒有变。人家胡少敬还是当村长，还是有錢人当着家，什么事他們說了算。我家里还是那么餓一頓飢一頓，仍过着苦日子。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救星共产党。那是一九四四年，正是抗日胜利前夕，我們村里来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队。他们在晚上出来活动，给我们穷人讲打倒日本鬼子、穷人闹翻身的道理。他们还把我们村里一个当汉奸、作恶多端的地主拉出去枪毙了。在这当儿，地主、恶霸也不敢那么凶了，有的还溜走了。共产党说的、做的，全合我的心意儿，我一心向着它。我认定了他们是给咱穷人办事的，我就把我的冤仇全告诉了他们，他们说一定要为我们穷人报仇。他们又告诉我，压在我们穷人头上的不只是一个、两个，而是整个旧制度、旧世道，受苦受难的也不只是几个穷人，而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这算让我开了窍了，我忙着为他们做这做那，挖地道、送情况，我活着也算有个奔头了。

眼看抗战一胜利，世道要大变，不料蒋介石这反动头子又集中兵力打共产党、八路军。在我村里的共产党工作队就转移到东北去了。这以后，胡少敬这班人又凶了起来，照样欺压穷人，骑在人民头上。但不管怎样，可我也有了指望，心里想，看你还能凶几天！共产党回来再和你们算总帐！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我正在屋里吃饭，突然听到几声枪响，我赶忙放下碗，去拿我的大刀。正在这时，又听见大门口有人喊：“大爷！大爷！”我一听喊大爷，心里一愣。回头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粗布军装的人，他微笑着亲切地对我说：“大爷！不要怕，我是解放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专打地主恶霸。”“解放军？专打地主恶霸？”我念叨着这几个字，心里一热，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到底又把共产党的军队盼来了。

北京解放后，村里来了工作队，建立了人民政权，成立

了农会。乡亲们选我当农会主任。这一回可真是咱穷人当家了。工作队帮助我们搞土改，闹翻身，分了胡少敬和别的地主的土地。我领着大伙，冲到胡少敬家，叫他交出了地契和埋藏的东西。还把胡少敬管制起来，只准他老老实实，不准他乱说乱动。我经常到区里、县里开会，和区长、县长一起念叨国家大事。以前的衙门是地主恶霸的靠山，现在的人民政权成了为咱穷人办事的机关。

党还不断开导和教育我们穷哥们，使我逐渐提高了觉悟，认识到我的仇人不只是郭瞎子、胡少敬和那些不讲理的法院，而是整个地主阶级。郭瞎子、胡少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势力，敢那么欺负我？就是因为他们有整个地主阶级和他们的法院、军队、国民党政权作靠山。在旧社会，受苦的也不只是我刘宝善一个，广大贫下中农的命运都是一样。以前我想靠个人血拼一场，那不管用，必须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闹革命，打倒所有的阶级敌人，才能彻底翻身。

明白了这些道理后，我就更积极了。毛主席号召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坚决拥护。一九五一年，我就和几户贫农组织了河津营的头一个互助组。一九五三年，我又组织了第一个合作社，当时只有十八户，第二年就变成五十户。我们的社办得好，还受到区里的表扬。一九五五年快秋收时，少数上中农鼓动大家闹退社，新入社的几十户，受了欺骗，都退了出来。拉牲口，要大车，乱成一团。上级党对我说一定要保住合作社，我就坚决和领头闹退社的上中农作斗争，又去

說服受騙的貧下中農社員。經過這場鬥爭，要退社的人都回來了。秋收後，社里又是大豐收，沒有入社的人都爭着要入社，連外村的人都來申請入我們的社，社員一下子增加到八十戶！後來，組織高級社、聯村社、人民公社，哪一次我都站在前頭，還一直當幹部，為大伙辦事。越走我越覺得咱毛主席指的道兒對。現在我們貧下中農不只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也翻了身。我們村修了大水渠，引河水澆地，架起了高壓電纜，裝了水泵，抽水灌田。還安了電磨，有了電燈，牲口、農具也都齊全。集體經濟年年發展，社員生活步步提高。這兩年更好了，糧食增產，一年平均每戶還能分到百十元錢。我的大閨女、二閨女都已出嫁了，兩個兒子，都早已結了婚，現在都已有了孩子，還有一個小閨女，加上我媽和我們老夫妻倆，一家人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的勞動，有的念書。我媽七十七歲了，她常說：“這世道太好了，可惜我的眼瞎了，不能親眼看看這好世道。”去年我家蓋了新磚房，我攆着媽媽在院里走了一圈，孫子孫媳們也都跟在後邊，把新房的樣子詳詳細細地給她說了一遍。她也到處摸一摸，問一問，高興得直說：“托咱毛主席的福，托咱毛主席的福呀！”

日子越過越痛快，我也越活越年輕。現在貧下中農弟兄又選我當貧農協會主任，我是共產黨員，那沒有說的，一定好好為咱貧下中農辦事，永遠跟咱毛主席走，搞好集體經濟，把革命進行到底！

（齊化記。張培力圖）

苦儿恩仇記

平谷县城关人民公社社員 魏承启

旧社会好比一眼万丈深的苦井，我是这井底下的一个苦儿。在那黑洞洞的苦井里，我没见过父母的笑脸，没听过父母的笑声；得不到温饱，见不到光明。我真好比黄连树上挂猪胆——根苦、梢苦、全身苦。提起那苦日子真是一言难尽啊！

苦中苦，求乞难活穷人命

难上难，卖姐拆散一家人

在我曾祖父那辈，老家遇到灾荒，野菜挖尽，树皮吃光。为了活命，曾祖父便一条扁担两只筐，担着儿女去逃荒。那时间，穷人是越逃越荒。万般无奈，只好就在平谷县东寺渠落了脚。

到我爹爹那辈，家里仍然穷得鬼不缠。爹爹是弟兄两人，大伯从十六岁起给地主郭轩扛活，一直当了二十六年牛马，到头来只落得空手赤脚，孤身无靠。爹爹从小受疾病、饥寒摧残，身体瘦弱，地主不肯收他当长工。当时家里除了妈妈、姐姐，还有两个哥哥，都很小，不能干活。但是怎能呆

在家里餓死呢？爹爹只好去挨門乞討。

爹爹走遍了渠河兩岸，走遍了千村萬戶。夏天，太陽晒得道路火燙，他的光腳丫子被燙起了水泡；冬天，冰雪掩埋了道路，他只穿着一雙單布鞋，雙腳凍得像個大紅蘿卜。听媽媽說，有一次爹爹的腳疼得實在支持不住，一頭倒在雪地裏。當他想到家里人餓得大人哭、小孩叫的時候，他就咬着牙站起來，一步一拐地往前走。一只要飯筐子，春夏秋冬沒離過爹爹的手。媽媽常說：“這只要飯筐子是全家人的命根子！”討飯的日子實在難熬呀！有一次，他到一個大門樓前，腳還沒站穩，一條惡狗就撲上來了，撕破了衣服，咬破了皮肉。他疼得在地上滾叫，地主却在院里飲酒作樂，猜謎划拳。後來，多虧一個長工用一塊破布幫爹爹包紮了傷口，送他走出了村莊。那長工還從懷里掏出了兩個窩頭，放在爹的筐里……。

儘管早出晚歸，到處奔跑，一只要飯筐子怎能養活得了一家老小六口人！那時候，我家三五天不見一粒米是常事。日子實在混不下去了，爹爹只好忍痛將十几歲的姐姐送給人家當童養媳。送走姐姐那天，我母子幾人抱在一起放聲痛哭，爹爹蹲在一旁低頭掉淚。

天蒼蒼，爹爹餓死埋外村

地茫茫，媽媽改嫁轉他鎮

姐姐被送走之後，媽媽天天流淚，爹爹長吁短嘆，心上像壓了一塊石頭一樣。大伯仍舊扛活，爹爹仍舊討飯。不

久，发生了一件使我永远难忘的惨事。

一年冬天，北风一連吼叫了三天三夜，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天阴沉沉的，要下雪了。我家的破土房像个过风道，土炕冰冷，衣被单薄，我弟兄几个挤在炕角的一床破棉絮里。年老的爹爹穿着一件又破又小的旧棉袄，挎上筐子，顶着刺骨的北风讨饭去了。

那天晚上爹爹没回来，急得我母子几个蹲在炕角一夜没合眼。天亮开门一看，鹅毛大雪正在下个不停。妈妈盼爹爹，急得直掉泪。她想给我们煮点野菜，又没柴禾，只好安慰我们说：“听妈话，你们忍着点，等爹爹回来，妈给你们煮白薯吃。”我们饿得难受极了，但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再饿也不叫一声。

几天过去了，还是不见爹爹的影子。妈妈担心地说：“怕你爹……”说着妈又哭起来了。又是几天过去了，积雪化去大半，但爹爹还是没有消息。这天，妈妈叫哥哥去找大伯回来，又让大伯去南山根找爹爹。

第二天，我大伯就往南山根去找爹爹。走过一村又一村，见人就询问，逢人就打听，仍旧不知道爹爹的下落。一天，大伯走到太务村边上，碰到一个长工模样的人。我大伯一问，那人便领大伯去到村外一个新起的土坟旁边，告诉大伯：那天下午，风雪正紧，有个讨饭的人来到太务村，那人冻得浑身哆嗦，几乎讲不出话来。他刚走到地主家的大门楼，正碰上地主的狗腿子出门，那家伙恶狠狠地骂道：“真他妈的扫兴，出门就碰到叫花子……”接着迎面就是一口吐沫。

俗話說“人窮志不窮”，那討飯的人一聽氣上心來，氣得渾身發抖，想伸手去拉那狗腿子講理，不料一頭栽在門檻上，就再也沒有爬起來。這長工正在這家扛活，見到這事又氣又恨。後來，回到屋里拿出一條破席，把屍體卷起來，拉到村外埋了……。沒等長工講完，伯父便痛哭起來。

當大伯把爹爹的屍體運回來的時候，一家人哭得死去活來。那時我才三歲，看大人流淚，我也趴在爹爹尸首上哇哇地哭叫。

爹爹入土後，媽媽整天掉眼淚，不吃也不語。後來，媽媽無路可走，只好改嫁到別處去了。臨走之前，她不知在哪兒弄到一塊布，給我們每人做了一双布鞋，还把破衣服拆拆洗洗。到走的那天，她含淚對伯父說，“他大伯，好好把幾個孩子拉扯大吧！我對不起你死去的兄弟……”話沒說完，媽媽便泣不成聲了。舊社會就這樣把我們母子逼散了。

媽媽走后，大伯仍舊扛活，哥哥抱着我到處流浪，挨戶乞討……。

黑狗子，抓丁奪走同胞親 好兄長，開樓迎接子弟兵

真是“禍不单行”，爹爹死后不久，大禍又臨到大哥頭上。

那時候，日本鬼子已占領了平谷縣，一些披着中國人皮的漢奸，賣國求榮。平谷城里的偽軍，給鬼子搶糧拉伕，坑害百姓。人們恨透了這些狗仗人勢的東西。因為他們的衣

服顏色和秫秸差不多，所以人們給他們送个外号叫“棒秸队”，又叫“白狗子”。平谷城里的日本鬼子为了镇压和監視中国人，在东寺渠大桥头上建立了一个炮楼，炮楼里住着一排“棒秸队”，这几十条恶狗在这一带鬧得烏烟瘴气，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

有一天，保长領着几个伪兵走进我家。他瞪起三角眼，从东墙看到西墙，然后像凶神一样把文明棍朝炕上指了指；大哥还沒来得及穿棉袄，伪兵像恶狗一样扑上来，把大哥五花大綁捆了起来，就拉走了。我哭着去喊大伯，等大伯回来，連大哥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对着青天連連跺脚說：“这是什么世道！”接着又对我說：“快把棉袄給你大哥送去！”我听大伯的話，把棉袄送到桥头碉堡里。大哥出来接棉袄时，我見他胳膊上一道道血痕。他低低嘱咐我說：“好好听大伯的話……”大哥还沒說完，一个伪軍便把我赶了出来。

沒过几天，我大哥被赶去挖战壕、修堡垒，不知受了多少棒打、折磨，弄得大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又过了些时候，敌人才每月准大哥回家一趟。他回来后，一家人总是抱在一起痛哭一陣。但是，大哥因怕連累全家，又不得不流着伤心泪离开我們。

我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望大哥回家，可是总盼不回来。日子真难熬啊！更可怕的事又发生了。敌人强迫大哥当伪兵，他死活不干，在敌人棍棒的逼迫下，大哥被迫穿上了“棒秸队”的衣服。有一次，大伯父見到他，嘱咐他說：“德儿，咱可不能像那些黑心烂肝的家伙，坑害穷百姓啊！要对

得起你死去的爹爹。”大哥滿含眼淚望着大伯說：“您放心吧！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爹爹是怎樣死的。您瞧着吧！我一定會對得起咱窮人……。”

那時候，平谷地區處在敵我拉鋸的形勢下，八路軍常常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不是拔掉一個炮樓，就是繳獲幾條槍支，或是打死幾個鬼子和偽軍，弄得敵人惶惶不安，草木皆兵。鬼子炮樓的門，日夜緊閉着。敵人的炮樓能鎖住大哥的身，可鎖不住大哥的心，他一心向着為咱窮人的八路軍。

這年春天的一個黃昏，八路軍像神兵一樣突然對炮樓發起攻擊，幾十個偽兵慌得手忙腳亂。我大哥趁機喊道：“樓下的兄弟們，里边繳槍！”他邊喊邊打開樓門，咱八路軍一擁而入，幾十個偽兵做了甕中之鱉。戰鬥不到一個小時，就勝利結束了。炮樓在火光中化為灰燼，等城里的日偽軍趕來增援時，人民子弟兵早已滿載而歸了。鬼子氣得吹鬍子瞪眼，又派遣幾十條惡狗把守橋頭，還暗暗監視我家。

三天後，大哥從咱八路軍的連隊里回來看望我和大伯父、二哥。他剛進家門，幾個警備隊員便皮笑肉不笑地跟進來了。只听領頭的說：“老兄，長官請你赴宴。”“謝長官，我不敢奉陪。”大哥知道不妙。“千載難逢，還是去痛飲一杯吧！”大哥知道其中有蹊蹺，趕忙婉言拒絕。偽兵突然把臉拉下來罵道：“不識抬舉的東西，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說時遲，那時快，一個日偽軍飛起一脚把我踢倒，又立即把子彈頂上槍膛，對准大哥的胸口。沒一句話工夫，大哥又被五花

大綁捆了起来。他回过头来对我小弟兄俩說：“我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了，你們好好听大伯的話，将来为咱家报仇……”大哥还要讲下去，一个伪兵用枪托边打边罵說：“死骨头，还报他娘的什么仇！”說完就把大哥拉走了。

阴森森，敌寇計穷用毒刑 血淋淋，大哥不屈被杀身

第二天，大哥給家里捎信，說他被押入平谷監獄里。后来又听說，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严刑拷打，逼問他是不是八路軍的間諜？为啥开樓“投降”？他始終拒絕回答。敌人沒計可施，便把他吊起来打得皮开肉烂，还往鼻子里灌辣椒水，让他坐老虎櫂。一切刑罰都用尽了，但大哥仍然咬着牙，不吐一字。敌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落得个垂头丧气。

好不容易，伪軍才让我去探獄給大哥送飯。我走过了阴森森的大院子，看見一堵厚牆，牆上一个小洞。一个看守的伪軍把洞口打开，我从洞里看見大哥手上带着手铐，脸上一道道的血印，上身衣服撕得破破烂烂。我不由得难过起来，眼泪落在飯罐里。我正想和大哥讲几句话，看守的伪軍一个耳光，把我赶出了獄門，我只好一步一滴泪地往家里走去。

过了半个月，敌人审問不出什么結果，要我大哥找保人释放。那时村上坏人当道，誰来担保呢？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不但不保，还暗中陷害，加油添醋。不久，敌人把我大哥从城里拉到东寺渠村北边場上杀害了。消息传到村里，地

主們乐得张开嘴說：“穷小子，該死！”穷哥儿們低头叹息：“唉，挺好的一个小伙子！”大伯和我小弟兄 俩哭着把大哥埋了。

紅旗飄，解放人民来救星 春风吹，組織起来鬧翻身

革命风暴吹散滿天烏云，广大人民喜气洋洋鬧翻身。

一九四六年，共产党領導的八路军解放了平谷城。城里的黑狗子有的当了替死鬼，有的当了俘虏。紅旗在平谷城头上随风飄揚。

东寺渠的伪村政权的头子們見风向不对，心里不安，头目郭維洋就糾集地主、流氓暗地研究对策。他們听說共产党要成立农会、妇联会、儿童团等，便定下先下手为强的毒計：各家地主要装出开明的面目，給穷人点甜头来收买人心；工作队一进村，便先接待，不要叫工作队到穷小子家里；另外，先把坏地分給穷人装个門面；再把本村的地主富农子弟組成儿童团。总之，郭家的算盘打得再如意也沒有了。

地主的少爷、小姐們根据他們老子的指示，不久便組織起“东寺渠儿童团”，正副团长是郭自合、郭玉蓮。而貧苦儿童被迫挤在外边，不能参加。

一九四七年七月的一个早晨，工作队来到了东寺渠。地主們听說工作队一早到了我家，上午就忙着准备接待，可是工作队的同志严厉拒絕了。这好比当头浇了一瓢冷水，他們只好耷拉着脑袋回家了。之后，工作队在我家住了下

来。他們真是穷哥儿們的自己人，整天串穷人家的門，坐穷哥儿們的炕沿，走穷苦人的路子。他們睡在炕头給我們讲什么是剝削，穷人为什么受苦，什么是階級压迫……。还給我們讲团结起来斗地主、鬧翻身的革命道理，穷哥們要組織农协会、妇联会，还要重新組織儿童团。往后，天下就是咱穷人的了。这样，我漸漸明白了些革命道理。

我把听到的革命道理，告訴給穷苦的小朋友們，他們高兴得蹦了起来。可是我們心里老是有个疙瘩解不开：为啥我們不能馬上成立穷



孩子的儿童团？我們跑去問工作队。他們摸着我們的肩膀問：“小朋友們，你們为啥要成立儿童团？”我大声回答：“我爹爹餓死，我大哥被打死，我們要报仇，要翻身……”小朋友們也一起喊起来。工作队同志笑着說：“好！好！咱們要成立新的儿童团。”他們問我：“敢不敢当儿童团长？敢不敢斗地主？”我回答：“敢！敢！”

一天，工作組領着一群窮苦兒童走進少爺、小姐們的兒童團團部，他們一見我們便吓得目瞪口呆。小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說：“你們的兒童團是假的，不是我們的組織，我們要成立新兒童團。”當工作隊宣布解散假兒童團以後，小朋友們一致推舉我為團長，我跑上去摘掉掛在門上的招牌，撕掉“閑人免進”的字條。那些少爺、小姐們便一聲不響地走出了門，回家報信去了。我們手拉着手圍着工作隊的同志，齊聲說：“我們一定努力完成任務！”

偽村政權的老傢伙一聽到這消息，大吃一驚。晚上，他們找到工作隊同志，問為啥解散原“東寺渠兒童團”。工作隊同志嚴厲地回答：“連你們的村政府都要解散哩！”當晚，民兵便把所有的地主嚴密地監視起來了。我們幾十個兒童團員配合民兵看守地主，在他們的房前、屋後、村口、路口，布下了天羅地網。

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開始了！農協會、婦聯會、民兵小隊成立了。從前站不到人前的窮哥們，現在揚眉吐氣了，我叔叔魏文池被選為復查主任，領着窮哥們斗地主、分土地……。這場暴風驟雨打碎了封建的鐵鎖鏈，廣大的農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我家祖祖輩輩地無一分，現在分到土地六畝、房屋三間、衣裳三十多件，還有箱櫃等物，家里不愁吃不愁穿了。翻身後的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愉快地勞動。春風吹到了渠河兩岸，一場春雨過後，布谷鳥叫個不停，田野上傳來陣陣歌聲，農民們臉上掛着笑容，忙忙碌碌，喜氣洋洋。

风雨变，頑軍“扫蕩”平谷城 烏云起，蛇狼糟害老百姓

俗話說：“不打死毒蛇，它会反咬你一口。”一九四八年頑軍“扫蕩”平谷县。这好比一声霹靂，烏云又把天空遮盖，牛鬼蛇神又紛紛钻出来，他們反攻倒算、杀人搶劫。无辜人民遭到網綁、毒打、杀害……。

东寺渠地主郭維臣有个姪儿叫郭自勤，杀人不眨眼，比三角蛇还毒十分。人們送他一个外号叫“独眼龙”。“独眼龙”在頑軍炮兵团当班长，这次，也随頑軍来到平谷县。他回家一看，家里样子大变。地主們一个个跟在他屁股后头哭訴，他叔父一遍又一遍地說：“穷小子們反了，分了咱家的土地，分了咱家的房子……”“独眼龙”一听大罵不休：“穷小子們敢到太岁头上动土，我郭家也不是好惹的，立誓要报此仇、雪此恨！”

当天晚上，“独眼龙”領着頑軍潜入了东寺渠，乘大家不备，突然抓干部、搶財物，鬧得鸡飞狗跳墙。土改时的老干部魏文达、魏文启、郭斌、张順等都被綁了起来。第二天黄昏，“独眼龙”又闖进村子。地主又一个个钻了出来，趁火打劫，搶掠財物。把貧农从分得的房子里赶出去，把群众的驴子拉走，連穷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剝下来搶走……。在一片混乱中，我伯父魏廷順、叔父魏文池、老叔魏如林，还有陈誠田和我，一併五花大綁捆起来。“独眼龙”看到我，飞起一脚，把我踢倒。我忍着疼边哭边罵。当我們五人被拉走的时候，地

主們却把搶來的豬羊宰了，大吃大喝，得意忘形。老百姓都恨得咬牙切齒，心里想：看你們還能橫行到几時！

恨悠悠，歷盡苦難險喪身
喜滋滋，重見天日慶再生

“獨眼龍”把我們帶到平谷城北門外的荒草場上，沒有馬上下毒手，又把我們押往通向下紙寨的路。夜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們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前走。到了下紙寨，還沒來得及喘一口氣，敵人便把我們關在驢圈里了。

第二天，天剛亮，敵人便開始審問我們。“獨眼龍”高高站在前邊，幾十個匪兵排在兩旁，刀出鞘，槍上膛，真是殺氣騰騰，不可一世。然後，郭自勤惡狠狠地說：“冤有頭，債有主！”說着他取出厚厚的一本帳，把東寺渠各家貧農分地主的地、房屋、財產的數目統統念了一遍。隨後，“獨眼龍”又取出一張狀紙，誣告東寺渠農會幹部打死本村“良民”一人。各地主都親自簽了字，划了押。

敵人一連三次嚴厲審問我，問我打死人沒有？我回答：“我沒打死人，別的人也沒打死過人，有一個地主是病死的。”他們又問我的老師是誰？我說不知道。敵人從我口中沒得到一個字，便氣得用劈柴棒打我，我氣憤地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敵人只好又把我們押回驢圈，只把陳誠田放了。

過了一夜，敵人要把我們四人押往三河縣。三河縣的土匪頭子殺人殺紅了眼，據說，只要是革命幹部，便別想從他

的魔爪下逃过。在我們被押往三河县的路上，忽然听到枪响，原来頑軍遇到了咱八路軍，敌人見势头不妙，便繞道逃走。魏如林老叔乘机逃跑了，敌人就用鞭子打我出气。天黑下来了，大約天快亮的时候，到了义和庄。这里是敌人炮兵团团部，我叔姪三人一入这狼窝，敌人便开始审問，但还是沒結果。不知什么緣故，敌人要我唱歌，我便大声唱：“国民党，一团糟，地痞流氓狗强盗……。”“独眼龙”一听大罵：“他媽的，揍死你这小杂种！”狡猾的頑軍团长見硬的不行，就来軟的，哄我說：“別害怕，你說了，我們放你。”我的回答还是不知道。不久，我們又被关进驴圈里，叔叔預測情况不妙。果然，三个匪兵冲到我們跟前，扒掉叔叔身上的衣服，把他紧紧捆上押往村外，我和大伯一前一后，叔叔走在中間。走到义和庄外，忽然啪的一声，一顆子弹从我头上飞过，回头看时，叔叔已經倒在地上。“独眼龙”手里端着大枪还没有收起来。我和大伯一时說不出話来，只听劊子手凶狠地說：“叫他們滾吧！”我們刚走不远，“独眼龙”突然又改变主意，喊道：“叫他們回来瞧瞧！”我爷儿俩慢慢走回来，看見叔叔头部血肉模糊。仇恨在我心头燃烧，我的眼睛冒着火星，我恨不得馬上夺过枪来，打死这些反动派，为我叔叔报仇！……

天已完全黑下来了，敌人把大伯又关进驴圈，把我放了。

我一脚高、一脚低地往野外奔去，幸好碰上了一个赶驴的老乡，我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对他訴說了一遍，他十分同情

我，让我骑上毛驴，把我驮回平谷。可是，有家我不敢回啊！第二天，我谢别了那人，踏过渠河，偷偷走到妈妈改嫁的地方。在那里，我躲着生活了二年半。

有一天，二哥突然跑来找我，母子三人抱在一起痛哭不敢出声。二哥说，大伯回来了，要他来打听我的下落。后来，国民党匪兵又抓我大伯，他也只好到我妈家里藏起来。整整两年，我们二人有眼见不到光明，有腿出不得门，有家也回不得。

土改复查之后，太阳又照到平谷地区，春风又吹到渠河两岸。穷哥们的土地、房屋、财产又夺回来了。二哥种地，我上小学，一家团圆。一九五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青年团，后来，党培养我学会木工技术，在北京工作了整整八年，团组织上和行政上先后八次给我奖励。一九六二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回到家乡以后，结了婚，现在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们夫妻恩爱，丰衣足食，全家欢乐。再往前看，人民公社正把我们引向更美好的前程，苦难的日月一去不复返了！人常说：“饮水要思源，疮好别忘痛。”我常常这样想：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怎么能有今天？党把我从火坑中救出来，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我永世也不忘党的恩情。海可枯，石可烂，听党的话，跟党走信念不可变，我决心在党指示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大步往前迈进！

（丁生俊 记。周毅 图）

一件破棉袄

昌平县兴寿人民公社兴寿大队副大队长 赵玉宽

现在，一到了冬天，不论骑车去开会，上大队部去办公，还是扛锄头下地干活，一抄起我的新皮袄，总不由得要想起在旧社会我穿的那件破棉袄。虽说那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可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永远也不会忘记！

一九三八年，我已经是七岁的孩子了，可是从来还没有嚐到过穿衣服的滋味，夏天总光着身子，冬天就“入蛰”了，一冬不敢出屋子。那时候，我们地没一壠，椽没一根，全家六口人（爹、妈、三个哥哥和我），都靠爹给地主扛活，妈给地主家做点手工过日子。爹妈没日没夜地给地主家干活，挣的工钱，还不够养家糊口，常常三天两头揭不开锅盖。没有粮食吃，饿得实在不行，就到地里挖野菜、采树叶煮着吃。到了冬天，树叶枯了，野菜也没有了，只好去讨一点糠和豆渣。就这样，飢一顿饱一顿，糠一顿菜一顿地凑合着过日子。至于说到穿的盖的那更甭提有多艰难了。我们全家只有一条里外露棉花的小破被，夜里大伙拉大网。我们弟兄几个那时全都沒穿过衣服，出外拾柴、挖野菜，就光着个身子。

我八岁那年，记得是一个夏天的晌午，爹突然高兴地叫

我：“寬头！来，給你件衣裳穿！”我一听就愣了，怪新鮮的，叫我穿衣服！哪儿来的？当时半信半疑地跑到爹跟前。一看，爹真拿着一件衣服，原来是爹的那件破褂儿改的单上衣。我一下子高兴地扑到爹的怀里，又蹦又跳；爹也乐得不行，摸着我的头直对我发笑。我穿上了衣服，爹就一直盯着看我，后来看得他眼里閃出泪花来了。我这时心里乐极了，也没顾着跟爹多呆一会，就蹦跳着跑到村里，见小朋友就嚷：“你们看，我也有衣服了！”那一天我们全家都乐呵呵的，平常过年也没这么高兴过。

我十二岁那年，地主把我爹辞了，家里没有吃的，爹就挑着担子上各村去给人家绑笤帚。绑一把笤帚，有的给一块窝头，有的给一块渣饽饽，爹都舍不得吃，总想着拿回来给我们吃。他常常挑着担子出去一天，也不吃一点东西。又累又饿，时间长了，一吃东西就吐。吃不下东西，爹也得强撑着挑担出去绑笤帚，因为家里几张嘴都得靠他养活呀！

不久，爹完全病倒了，家里请不起医生。我们眼睁睁看着他的病一天天重下去。爹临终那天，全家都站在炕前，我们兄弟几个又着急又伤心，一个个只是流泪，妈不住地痛哭。爹强睁开眼睛，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最后，他那没神儿的眼光，落在我的破单衣上了。盯了老半天，接着，难过地皱了皱眉头，眼里滚出了两滴热泪。停了一会儿，他长叹了一口气，艰难地咕囔着说：“孩子们什么时候能有一件棉袄啊！……我活着看不到了？”话音刚落，爹就昏迷过去了。我们哭啊、喊啊，可是他的眼睛再也睁不开了。爹就这样，永远

离开了我們。

爹死了，我們娘儿几个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媽請人說合，叫我到地主王俊生家扛小活，說是要錢，給碗飯吃就行。出去給人家干活，不能再赤身露體，媽就把爹留下來的破棉袄給了我。棉袄破烂得太厉害，媽就用爹過去綁筍帶時撿到的破布条破棉花疙瘩，湊合着補補改改，好不容易才給我做成了一件小棉袄。我穿上它，心里又是高兴，又是难过。我长了这么大这才是我第一次穿上棉袄。穿上它就想起苦死了的爹，可怜的媽，这袄上有他們的苦，有他們的泪啊！我不能再向媽要吃要穿难为她了，我要穿起了这件棉袄自謀生路去。

这时，我刚十三岁，人长得又瘦又小，根本就沒有力气。可是，王俊生每天叫我放五头牲口，还要割下三口袋草，弄到他家里。有一回，我实在累得走不动了，割下的草有一小堆沒弄回家里来，不知怎么給他知道了，回到他家，他对我啪啪就是几个耳光子：“他媽的，你这个穷小子，吃誰的你就恨誰啊？沒良心的东西。”我頂了他一句：“我放这么多牲口，还弄三口袋草，怎么說沒良心？”“还对嘴！好，不許你吃飯！”后来真的餓了我一天，第二天連打帶罵地把我赶出了他的家門。

我无路可走，只好去討飯。穷戶人家也都缺吃的，只好到地主富农家門口去討，但討來的不是人罵就是狗咬。有一天，到地主欧家千門口，喊了两声想討点东西吃，刚喊了一声，欧家千就出来罵我：“有飯喂狗也不給你吃！”接着，他

的一条大狼狗一下窜出来，把我扑倒在地，咬着我的脚拉着跑。我呼叫着救命，鲜血流了一地。棉袄的对襟、脊背全都被撕破了，浑身是血。欧家千这时站在旁边瞧着一边笑一边骂道：“他妈的，穷光蛋，看你还来要饭不来了！”说着用脚一踢，把我讨饭的饭盆子、饭碗全都踢碎了。然后他才把狼狗唤回去。我的脚还流着血，伤口疼得我直打哆嗦。不能老躺在这里，只得使劲咬了咬牙，站起来，空着两手，一瘸一拐回到家里。

妈看见了我，就抱着我大哭起来。她问清了刚才的情形以后，更伤心了。她说：“家里这一个破盆子破碗都让人家摔碎了，要饭吃这条道都不让走，真要逼我们去死吗？”说到这里，不禁又哭起来。这时，我的心像油煎似的，想安慰妈妈，可又说不出话来。妈突然不哭了，咬了咬牙说：“不能死！冤头！要有志气，活下去，我再艰难也要把你们拉扯大，长大后要报仇啊！”

过了年我十四岁了。正月初二，姨父告诉我：“石景山招劳工，跟我一起去吧。”我答应了。妈就又把那件被地主的狗撕得更破了的棉袄，用拾来的一小块破棉花、破麻袋片，给我重新缝补了一番。动身时，妈告诉我：“你出远门去做工，家里没东西给你带。这件破袄，白天是你的衣服，晚上是你的被子，你可经点心别弄丢了！”

到了石景山钢铁厂，叫我砸青石头。还算不错，头一个月挣了十块钱，我拿回家给我哥，叫他当本做点小买卖。谁知第二个月工钱就不给了，说下月一块算；等到再下一个



月，又說这月压支。好容易等到第四个月，我想把开支給媽媽送回去，哪想到有一天，工人中传开了，說工头“起黑票”逃跑了。我們沒一点办法，只好不干，到焦炭窖去措炭。

我措炭也沒有一个肩垫，炭箕子直接压在肩上，不光把破棉袄磨出两个大窟窿，連我的脊背也磨烂了，生了疮，疼得要命。已經是大夏天了，我連一件单衣都沒有，只好把破棉袄的棉花掏出来，当单衣穿。干了七个月，還沒发工資。有一天我去算帳，誰知道伪警察連打帶罵把我赶出来。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有什么主意，只好走吧，七个月白干了。来时穿着个破棉袄，离开又措着个破棉袄。干了一年多，什么也沒落下，只是肩上多了一个大疮疤。

轉眼又到了要命的冬天。我把破棉袄的棉花塞进袄里

去，穿上它，跑到門头沟給人家措煤。煤井五十多丈深，我每趟措三十公斤就够噲了，不料矿警見我就“噹”的一錘，打得我直发暈。矿警罵道，“誰叫你措这么一点，滾蛋！”

有一天我和一位王大爷一块措煤，他在我的后边，我們俩措着煤正往上边爬，已經到了离井底二十多丈深的地方了，突然一个矿警迎头走来，张口就罵：“他媽的，你竟措起石头来了。”接着，一脚把我踢到井底下去。这一下把王大爷也給砸下去了，王大爷昏了过去，我摔得头破血流，渾身是伤。这时候矿警还用鞭子来抽打我，又榨去我两个月的工錢，說是給王大爷养伤用。我把掙的錢都拿了出来，又措着破棉袄离开了这里。

到哪儿都沒穷人的活路啊！沒办法我又来到了石景山焦炭窰。有一天，我开自来水管，可巧水龙头坏了，水嘩嘩直流。日本鬼子看見，說我搞破坏，按在地上就打，打完后把我囚在木籠里。籠里四面是枣核式的釘子，动也不敢动，一天只給两个小窝窝头吃。到第三天，有一个伪軍从木籠里把我放出来說：“今天放你！”誰知，剛出来就給捆上了，三个鬼子把我拉到一个大空場外边，場子周围用鉄絲网围着。三个鬼子兵抬起我往里一扔，摔得我头破血流，一个日本鬼子不知咕嚕了一句什么，五条大洋狗从北边的房子里窜出来，一起扑过来咬住我，把我从东拉到西，又从西拉到南，我昏迷过去了。等我醒来时，棉袄上又是血又是水，几个鬼子围着我狞笑。后来他們把我送到石景山監獄里，我渾身是伤，血水浸透了棉袄。身上像針扎似的疼。幸好，獄里关的

尽是工人，他們給我包傷、擠膿，給我弄吃的。還向我說：“玉寬呀！你可是要記住，是誰害了咱們窮人，將來有一天我們要報仇呀！”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十五歲的時候，日本鬼子把我從監獄里弄到萬壽山等地修鐵路。八月里有一天，忽然傳來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我高興得歡蹦亂跳，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覺，爬起來穿好破棉襖，就趕回家去。一路上，我的心里真是七上八下。心想出來兩年多了和家里沒通過音信，不知媽媽、哥哥都還活着沒有？又想到，出去時，就是穿着這一件破棉襖，現在回來了，還是只有這件破棉襖，什麼都沒掙着，只是棉襖破得更不像樣了，身上又多了些傷疤。……

想着，走着，到我們村邊的時候，突然一個穿灰軍服的當兵的攔住了我，我忙說：“我是這村的人呀！”那個兵忙說：“我們是八路軍，你別怕。”他問了問我的情況，就把我送到旅部。到了旅部就給我端來大米飯吃。我不敢吃，旅長來了逼我說：“不吃不送你回家呀。”我才吃了。

旅長親自把我送到家里，媽還活着，見了我又驚又喜，媽看見我瘦成這樣，還是只穿了件破棉襖回來，忍不住哭了起來。旅長安慰我媽說：“八路軍來了，以後窮人要當家做主了，日子會一天天好起來的。”並拿出十元邊區票叫我安家。

從那以後，我們家生活就全變了。土改時我分了三間房子十畝地。後來加入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家里生活過得越來越好。現在家里，甭說做件棉衣不費什麼事，皮襖都穿上了。家里還有收音機、自行車，這些在過去都是想都

不敢想的东西呀。我媽現在六十八岁了，她老人家过上了今天的好日子，总也不忘过去，她常嘱咐我：“你穿上了皮袄，可别忘了那件破棉袄啊！”是啊，我哪儿能忘記那件破棉袄，那上面有爹的苦、媽的泪，有地主打我的棍子印，有日本鬼子洋狗留下的牙齿印，有我自己的血和泪啊！我今天常常想起它。想起它，我就心里发热，就永远忘不掉階級仇恨和階級斗争，就想多为大伙干点事。我想，为了我們永远不再穿那样的破棉袄，为了让普天之下的穷哥儿們都不穿那样的破棉袄，我今天就得牢牢記住那件破棉袄！

（赵永森 記。王德娟 图）

闖出苦海去

通县小务人民公社社員 卢秀荣

說起我在旧社会里过的那大半輩子生活，真叫人揪心！那段苦日子，虽說已是陈年的老帳了，可那些事，一滴眼泪一滴血，都在我心里刻着呐，永輩子也忘不了。

办喜事，欠下閻王債 新婚别，除夕守空房

記得我十七岁那年，腊月里头嫁到西槐庄王家。左右乡邻們都說：“这个苦命的丫头，也算是有个着落了。”

那王家也是个穷得叮嚀响的人家。公爹王公道，为人正直、公道，为穷哥儿們奔走借貸，不辞辛劳。到末了，連自个儿家里仅有的几亩薄田，也叫財主老爷霸占了去；两間土房，也叫他們扒走。为这个，人們都管他叫“王公道”。可是他家又哪里来的錢結这門亲事？等过了門，我才知道，那天办亲事的錢，都是跟地主老財借的，真是：旧債未清，又滾上新債。不曾想，往后一重重灾难，就打这次办喜事开了头。

我只記得，那天我一坐上轎就哭，一直哭到西槐庄。我

哥哥陪着轎子走了一路，快进庄子时，他拍了拍轎帘对我說：“妹子，快到人家了，別哭啦！”

照說办喜事还不該欢喜嘛，哭个什么劲呢？唉，这事儿，得打头上說起。八岁上，自打我父亲死，我就开始記事了。头年因为盖房，父亲欠下地主的債，总也还不起，地主左一回催，右一回逼，硬是要扒我們家的房子，我父亲挑着一家人生活的重担，能不发愁嗎？那会儿，他又租了地主王鉄毛的二亩瓜地，看瓜受风，愁上加病，就这样送了性命。临了，連一副棺木也沒有，还是跟人借錢买的。

父亲一死，家里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十六岁的哥哥，只好去給財主扛小活。我跟我媽，麦秋时节，起五更爬半夜地去拾麦穗儿，过着吃了上頓愁下頓的生活。后来，我媽把我托到亲戚家，就去天津帮人。我就像个沒娘的孩子，东家住几日，西家住几天，到处看人白眼。小小年紀，受尽熬煎。

坐在轎子里，小时候受苦的情景，一桩一件，就跟画儿似的浮現在眼前，越想越心酸，眼泪儿就像断綫的珠子似的往下掉。我忍住眼泪，想着到了王家，兴許有个盼头了吧！誰知新婚第三天，我男人就給財主扛活去了。有什么法子，欠下財主的閻王債，就跟掉进了无底洞一样，永无出头之日。

人說，“捎信的腊八，要命的糖瓜（即腊月二十三，送灶吃糖瓜）。”这話真不假。腊月二十三，我刚住完娘家回来，討債要帳的就堵了一屋子。只听见，有要轎子錢的，有要米

錢、面錢的，一个个像无常鬼似的吵着嚷着，沒完沒了。我那会儿还是个小姑娘，刚进门也摸不着头脑，吓得脸刷白，心直跳，就跟怀里揣着头小鹿似的，躲到西屋不敢作声。我公爹好说歹说不成，要帐的铁青着脸硬要带人去说话。我追出来，说好话，人家连理都不理，吆五喝六地就把我公爹带走了。

转眼就是年三十。按乡土风习，年夜得点上红灯，一家人围着炕桌热热和和吃顿团圆的羹饽饽(饺子)。可咱们家，公爹一大早就叫要帐的给带走了，我那男人又在外给财主扛活，家里只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凄凄惨惨。要点灯没油，要包饺子没面，就连烧水的柴禾都没一根，只好孤身摸黑坐着。左等右盼，盼着公爹平平安安早早家来，翁媳二人一起过年。可大半夜都过去了，还不見家来。盼呀等呀，空空的一间大屋子，漆黑漆黑，连一丁点儿热气儿都没有，冻得我缩成一团，挤在炕角上，又是冻，又是饿，手里拿着一块冻得梆梆硬的窝头，一口一口地干啃着。只听见有钱人家叮叮噹噹剁肉切菜，嘻嘻哈哈吃酒猜拳，一阵阵爆竹连天；只看见有钱人家里里外外灯火通明，出出进进辞旧迎新。一个人思前想后，心如刀绞一般。“咱穷人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想到这儿，又咸又涩的眼泪扑簌簌落在窝头上，我一头扑倒在炕上，止不住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不知什么时候，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猛然间，一阵砰砰的敲门声，把我从恶梦中惊醒，顺手摸在枕头上，只觉得冰湿一片。我急忙下炕去开门，门一

开——扑面一股寒风，进来的原来是我公爹，欢喜得我不知怎么好，亲亲热热叫了声“爹”。我公爹也不答理，一低头上炕，吧嗒吧嗒蹲在炕沿上敲烟袋锅，也不言语。我问长问短，不见一声回答。老半天，只听见一声长叹，我心里发慌，不知出了什么事，又不敢再问。黑屋子没一点响动，真叫人心发毛。呆了好一会儿，公爹才开口：“帐，人家限明天一天，务必还清，要不就得拿人顶帐。”我急了：“咱家哪来的钱哪！”公爹说：“借去。”我说：“上哪儿去借呀？”公爹慢慢抬起头，也不看我，喊了一声：“天哪，多糟才是咱穷人出头的日子啊！”

离乡土，异地受煎熬 会亲人，相逢不相识

“穷乡难舍，故土难离。”人不到走投无路，谁肯离乡背井出外去闯荡。为躲债，我公爹一去无消息。我只好回到马合店娘家哥哥家。哪知我哥家也是没吃的，一样艰难，住不下去，只好拖着病去天津找我妈。后经中人介绍，我也跟我妈一样，上有钱人家给人支使去了。

头一回去一个姓曾的人家。那天，我母亲一路送我，一路千叮万嘱咐，要我到人家那里，手脚要勤快，多做事少说话，处处顺人心意，我听着应着，实在也不能领会。乍一去给人支使，也不惯，哪懂得什么叫人情世故。只想着自己十七八岁这样命苦，越想越不是滋味，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眼泪，动不动就爱哭。主人看着不顺眼，才三个月就把我辞

了。以后换了人家，百样小心，起早睡晚，整天不闲，挨打受骂，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闹点毛病，也得咬牙挺着，挺不住也不敢歇。要不饭碗又要给砸了！心想：熬吧，熬吧，凭我这一双长满老茧的手，还能把人饿死！

就这样苦熬苦煎，过了四年。一天，天擦黑的时候，我正在上房干活，听说我哥哥从老家来了，我三脚两步赶忙跑出来，一见到多年不见的亲哥哥，一头扑上前，高兴得我不知说什么好，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哥一闪身，说道：“看是谁来了？”原来，我哥哥身后还站着一个生人，一看还不认得。我哥笑了笑，说：“这不是我妹夫嘛！”细一瞅，嗨，可不是他！说来心酸，可怜我们夫妻，新婚三天，一别四年，一直没见过面。如今他都是二十岁的大人了，长得挺高的个子，难怪咱夫妻相见不相识！

这一年，我二十一岁，跟着丈夫回到乡下，在我娘家马合店租了间土房，几年辛苦，省吃俭用，攒下几个血汗钱，置了三亩薄地，夫妻二人，辛勤耕耘，糠菜半年粮，勉强没饿着肚子。这一年，我添了第一个丫头，第二年又得了个小子。一家人脸上有了笑容，屋子里也有了热气儿，满以为这下子可有个指望了。不料想，炕还没睡热，脚跟还没站稳，我婆家西槐庄的财主，听到信息红了眼，又找上门来逼旧帐、讨旧债，恶狠狠地硬将咱家三亩地给霸占了去。家乡绝了生路，没法子，一家大小四口拉拉扯扯就去北平找活路。在北平，丈夫出去东跑西颠卖苦力、拉人力车，我给人奶孩子，辛苦熬命。真是大人受苦，孩子也跟着遭罪。就这样，一家大小穷

掙扎，窮對付，還是吃不飽穿不暖，吃了今天還不知明天烟
囱里冒不冒烟。

拉洋車，難熬臘月寒
當奶媽，餓死親生子

“屋漏偏遭連夜雨，行船又遇頂頭風。”我三十五歲這
年，日本鬼子占了北平。國破家亡，人心惶惶。臘月又近年
關，物價一日三漲，窮人真是踩在刀尖上過日子，一步一艱
難。

丈夫拉車掙不來錢，我也沒活可做；孩子穿着露肉的衣服，凍得直哆嗦，也出不了門，一家大小張着嘴，重担子全壓在我男人一個人肩頭上了。數九寒天，北風刺骨，他天天出去拉車，掙的錢一家大小一人喝不上半碗“共和面”打的稀湯湯“粥”。唉，這哪是人喝的粥啊！“共和面”是橡子面做的，又苦又澀，不吃吧，肚子餓；吃了，又難受得不行。丈夫喝了這半碗粥，又怎麼拉得動車呢？愁得我這兩道眼眉整天打着死疙瘩。怎麼辦呢？我對丈夫說：“奎兒他爹，上哪兒借點兒去吧！”

“唉，咱窮成這樣，誰還肯借給咱哪！”丈夫擱下碗筷，粥也不喝了。

可是，不懂事的孩子，喝了自己碗里的，還要盛。一看鍋里空空，小的哭，大的叫，吵得我心煩意亂，一頭是火，拽過三個孩子，一人打了一頓。越打，孩子越是哭得哇哇叫，躺在地上打滾不起來。丈夫看不過，就把自己的半碗粥分

給了他們。回頭沖着我說：“你不知道孩子為什麼哭呀！”說着說着，自己也流下淚來。孩子是娘身上肉，天下哪有不疼自己孩子的娘！一蹲身，我也抱着孩子哭了起來。哭着哭着，只听丈夫吼了聲：“別哭啦！”轉身就向門外沖出去。我急忙放下孩子，追到外邊，一看，車沒了。丈夫肚里空空，頂着吼叫的西北風，又去拉車了。我直愣愣地站在風口，望着丈夫搖搖擺擺的背影一點點遠去，沒影了，好半天我才進屋。

千難萬難，熬到開春，丈夫再也支撐不住了，他一病不起，實在不得已，我只好帶着七個多月的重身子去給人侍候月子，才去一個多月，再也干不了，回家第七天就生了。窮人還講什麼坐月子！生下孩子，什麼吃的也沒有。那會兒，丈夫身體也沒大好，一家大小吃什麼呢？沒法子，我只好強打精神掙扎着起來，把剛生下十二天的孩子放在家裡，由丈夫喂些稀湯白水，自己就去給有錢人家奶孩子，手里抱着別人家的小少爺，心里惦着自家的親骨肉，那叫什麼滋味呀！真是“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打掉門牙只好往肚里嚥哪！沒幾天，我的親生孩子就在家裡活活餓死了。丈夫偷偷拷個筐把孩子扔到皇城根外野地里，也不敢對我說。等我一問，這才明白，一着急，奶水也斷了。奶水沒了，人家也就把我辭了。回到家，夫妻淚眼對淚眼，丈夫一跺腳，說道：“苦死在外，不如餓死在鄉。走，回家鄉吧！”

秋草黃，弃儿哭断腸

扛活苦，丈夫一命亡

九月里，秋草黃。一家人拖儿带女走上了回家的路途。

那天，天阴沉沉的，就跟压在头顶上一样。我身上背着五岁的小德元，走啊走啊，越走越沉，腿脚抬也抬不动。小德元长着連背疮，瘦得皮包骨头，簡直沒有一点儿人样。渾身軟得直不起腰，背在背上直往下出溜。丈夫說：“把这孩子扔了吧！”我也沒言声，就把孩子給了丈夫。丈夫抱着孩子走了一程，实在舍不得，又把孩子交到我手里，說：“你，你抱着吧！”

到了郭县地界，天都快黑了。走啊走，路也瞧不到个头。想着孩子有病沒錢治，拖到如今这种地步，眼下生活又沒着落，往后的日子更不知怎么过，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加上又累又餓，心急如火，一狠心把孩子往路边斜坡上一扔，紧着步子就往前走，跌跌冲冲走出小半里，这才松下脚步，听着风声里远远传来孩子的哭叫，做娘的心，就跟鈍刀子割着一样。只見丈夫放下行李卷，一口气跑回去，眼泪花花的，把孩子拾了回来。我一把摟过小德元，坐在黄土路上止不住伤心地嚎哭起来。

說是回家，哪儿是咱的“家”呢？回西槐庄吧，地无一壠，房无一間，又沒个亲人。唉，还是去馬合店找我哥吧。到了馬合店，不想他已經拖家带小到关外逃荒去了，听說后来还叫日本鬼子抓了“劳工”。天下这样大，可就是沒有咱穷人

落脚的地方呀！

有什么法子，日子还得往下过。为了养家活口，我男人带着病身子就去东四庄给财主扛活。他年纪才三十五六，未老先衰，看起来就像五十出头。原来已经得了痲病，整天咳咳巴巴，皮里抽肉，面无血色。狠心的财主，嫌他气力不济，重活抓不起，就把他撵走了。家来没歇上两天，他又上瓮子店李财主家，强撑硬干，夜里睡不着，一口一口咳出来都是鲜红鲜红的血！

俗话说：“扛活告不了老。”财主雇活，雇的就是卖命活。我丈夫，就这样拖着重病去扛活，从瓮子店来，又上东槐庄；从东槐庄来，又上罗庄。拖呀拖，拖了一年零七天。这年（一九四七）九月二十二，他才三十七岁，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苦了一辈子，临了，可怜只裹了一身破棉袄，连口棺木也没有，还是穷乡亲送来几块薄板钉了个匣子，这才把丈夫草草掩埋了。

苦婆饭，死里求活路

喜翻身，永世不离党

丈夫一死，就跟一座大山倒了一样。我一个孤身女人，还拖着几个孩子，苦日子可就更难熬了。万般无奈，我只好背着德海，牵着德元去要饭。

每天顶着三星出门，太阳落坡才回家来。走远了，到大红门、鹿圈、马驹桥一带，破庙里宿，别人家房檐下睡，一夜冻醒好几回。小德海的小腿冻得又青又紫，直叫唤，小德元

跑一边又蹦又跳，乱跺脚。母子三人紧紧依着靠着偎在一起，就盼着太阳早早出来呀！



記得有一次去沈村討飯，走到一家財主門口，剛一開口，那家財主就轰出一條狗來，把我左腿咬了個大口子，鮮血直流。那財主還一邊呲牙咧嘴嘻嘻笑，說什麼：“窮要飯的，看你

還來不來！”我氣憤不過，拿棍就打。財主見我打他的狗，可火了，又喚狗朝我撲過來。兩個孩子吓得哇哇哭叫，我只好護着孩子往後退，末了，只好把我討來的一塊饅頭扔出去，這才把狗引開。忍辱含悲爬起來，一拐一拐朝前走，還得去討飯呀！

不管是刮風下雪，陰天雨天，風里來雨里去，大年初一

也得出門。不出去，指什么吃呀！

一九四八年，春雷一声响，来了共产党。咱穷苦人总算熬出头了。

一九五〇年春，闹土改，咱家分了地又分了房，几个孩子也都上学念书了。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咱一步一脚窝，一心一意跟党走。如今，我三个儿子都在社里劳动，一个个壮壮实实，一天到晚乐乐呵呵。大儿德奎也娶上媳妇成了家。前年我又抱了小孙子。吃罢饭往热炕头上一坐，瞧着小孙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儿，水灵灵的小眼睛，只觉得咱的日子真是越过越美气，越过越舒心啦！可是，地主、富农还偷偷搞鬼，还想骑到咱脖子上，还想推咱进火坑。这是大白天做梦，一百个办不到！

飲水思源，忆苦思甜，咱可不能忘本。毛主席指给咱的阳关道，咱可不许离开一步呀！

（黄式宪 记。罗 炳 图）

血 泪 四 十 年

大兴县凤河营人民公社社员 馮殿荣

振清明儿就要进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去了。我真没有想到，我这个穷老婆子的儿子能进北京，能到毛主席跟前去。我给他打点好了行李，娘儿俩坐在炕上，他瞅着我，我瞅着他，半天说不上话来。两个小孙女在炕上闹着玩，小孙女二换哭了，大孙女和平把一块饼干塞到她的嘴里，二换又笑得像一朵花……。我瞅着欢蹦乱跳的小孙女，瞅着就要进京的清儿，心里翻腾着说不上来的滋味。我瞅着，想着，过去的苦事一桩桩、一件件又翻上心头。

(一)

我在旧社会滚了四十年，旧社会就像一口油锅，把穷人的骨头都熬焦了！那会儿，振清爸爸给人家扛活，整整扛了十二年！我拉扯着四个孩子滚啊爬啊……，天天盼着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可盼啊，盼啊，眼睛都快睁裂了，眼泪都要流干了，好日子就是盼不来，苦日子就跟冬天的黑夜一样，总也没个头！

咱扛活的东家叫张振英，是大兴县延营街的一条地头

蛇。解放那陣，他帶着槍逃跑，還朝咱追的人開槍，叫咱們用機槍掃死了。可過去，他有錢有勢，又在國民黨里當副營長，在延營街上可就霸了頭。誰要是稍一不順他的眼，立時就能把你捆走。村里人見着他都不敢抬頭，孩子們聽到他的咳嗽聲連哭都不敢哭了。大伙都說：“張振英站在當街一跺腳，延營街兩頭都亂顫！”

振清爸爸就是在这个惡霸家里扛了八年活。八年沒看過一回好臉，八年沒一天輕閒過。早上，星星還沒落，就得起來餵牲口、挑水、掃院子……胡亂扒幾口飯就下地了。后晌，又是頂着星星才能回來，到家還得打油、買醋，伺候人……做不完的牛馬事。俗話說：“硬漢子也經不住常年折騰。”振清他爸的身子骨眼看着一天天垮下來，脊梁也彎了，三十幾歲的人變成了小老头。孩子們整天見不着爸爸，都快不認得他了。

那會兒，我老是盼着過年，心想：到年下，就能拿回點工錢來了。三十塊錢在富人手里算不了什麼，咱窮人可就是一年的用場啊！哪知道，天氣越冷風越緊，人越有錢心越狠。頭一年，張振英照數給了錢，到第二年以後，哪年也沒照數給過，不是說振清爸把犁使壞了，就是說把牲口使病了，要扣工錢。第五年上，張振英又想出了新花招，把振清爸爸一年的工錢都騙去了。那年年三十，張振英特別和氣，把三十塊錢一個不少地交給了振清爸，也沒說使壞了犁，也沒說使病了牲口。振清爸納着悶剛要往外走，張振英立刻就把他叫住了，麻子臉上露着獐笑，要振清爸跟他的狗腿子們耍牌。

振清爸一心只惦着家里，哪有心思耍牌呀！一看振清爸不干，张振英的脸跟着就变了颜色，凶神似的说道：“挣这么多的钱就想溜走啊？大年三十的，可别闹得大伙不痛快！”没办法，哪敢惹他呀！振清爸硬着头皮耍了两次，两次就把三十块钱全输光了，急得什么似的。张振英的笑脸又露出来了，拉着振清爸说：“这点钱算什么？你也不能光输不赢啊？来！再来一次！我借给你！”说着真的拿出了三十块钱来，振清爸知道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可又不敢说什么，就苦着脸求他说：“东家，放我回去吧！一家人都在等着我呢！”张振英收起笑脸，瞪起三角眼说：“不识抬举就给我滚！愿到我家来的人有的是！”振清爸又气又急，但是怕以后被辞工，就咬咬牙又坐了下来，三要两要，三十块大洋又被张振英捞回手里了。

就这么着，不光这年的活白扛了，还得白给他扛上一年活！振清爸到家就一头扎到炕上，哭着把这件事说完，一家大人孩子听了哭成了一团。穷人过的就是这样的眼泪年啊！

(二)

记得在我大女儿小荣十三岁那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烧杀、抢夺、糟踏妇女，无恶不作。张振英和延营街别的地主老财们，也和鬼子勾搭在一起，向穷人敲诈勒索。他们想出了很多花招，什么“门户钱”、“村差费”……没有地也得拿五亩地的钱。他们在这当中大发国难财，那一年，年头又不济，穷人简直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活路了！那阵

子，連糠菜也吃不上，白薯叶成了寶貝，吃完白薯叶吃树皮野草，大人还撑得住，孩子可受不了哇！四个孩子都餓成皮包骨头了！

一天黑夜，我們全家挤在破草房裏熬时辰，五岁的小妞偎在我怀里，直說冷，我用破得露花的棉袄裹着她，她还是冷得打顫。摸摸她的小臉，燒得怕人，我知道孩子病了。看着孩子煞白的小臉，我又急又疼，我使劲地摟着她，哄她說：“小妞！明儿媽带你瞧病去，睡吧！”小妞睜着沒了神的眼睛說：“媽！我不瞧病！我要吃餛餞！”听孩子这么說，就像針扎我的心一样，孩子是餓坏了啊！我的眼泪就跟断了綫的珠子一样，一串一串地滾下来，澆在孩子滾燙的臉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求爷爷告奶奶地到处借錢，想給小妞瞧瞧病，可富人家都知道咱家穷，誰也不願借。我跑了一个上午，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看看小妞，已經不发烧了，小手小脚冰凉，眼睛直直地瞅着我，鼻子一撮一撮地抽着气。我抱起孩子，眼泪又涌了出来。小荣以为妹妹还是要吃餛餞哩，就說：“媽！我給妹妹要块餛餞去！”說完就跑出去了。那陣子，我的心全在小妞身上，也沒拦挡她。誰知她出去了半过晌，还不見回来，我又放不下小妞，就叫振清去找了一会儿，还是沒影。天快黑下来了，我想，不对！得去找！就一狠心放下小妞，奔出了大門。

我問遍了街坊邻居，有的說沒看見，有的說，好像看見她到南大庙里去了。这下我可急了，那里好人少，坏人多，可别出了什么事吧？我一气跑到南大庙，庙門关得鉄严，叫了

半天，里面才横横地回答：“没有！这庙里哪有孩子来！”听声音，是看庙的傅二。

我只得又折回头往回走，一路上心里乱得像团麻。我一会儿想到傅二的为人，平日偷鸡摸狗，捣鬼暗算，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会不会把小荣藏了起来？刚才他为什么不敢开门？……一会儿又想，也许小荣到外村去耍饽饽了，这会儿已经回家，哄着小妞吃饽饽了。……想到可怜的小妞，我就加快了脚步，孩子在揪我的心哪！到家一看，哪里有小荣的影子；看看小妞，气出得更细了，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我的心像被火烧着了一样，干着急，什么办法也没有。振清爸很晚才回来，听说这事，急得满屋乱转，唉声叹气。

那阵子，我就跟疯了一样，见人就說，见人就問，振清爸也到处找，到处打听。一些风言风語的說法也都传出来了。有的說小荣叫傅二拐走了，有的說叫他害死了，还有的說掉到河里了……。我不敢相信这些說法，我害怕这是真的，我总是自个哄騙自个，心想：說不定一会儿我的小荣就会跑回来，真的，我的亲闺女怎么舍得离开媽呢？

第三天上，猛地跑来个人告訴我：“大嬸，你家的小荣有下落了！”我又惊又喜，半信半疑，赶紧問他：“在哪儿？”他看我这么高兴，脸上立时露出很难受的样子，不言語了。我心里一惊，害怕地問：“怎么？小荣她？……”“小荣給人扔在井里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連忙往井边跑去。跑到一看，一群人正围着一个水淋淋的尸体。我拨开人群，一步

赶上前，“轰”的一声，我的头好像炸了！那可不是我的小菜吗！她的眼睛狠狠地往上翻着，就像在使劲地瞪着仇人，我这才相信，我的小菜真的离开妈了，多嘴也看不到妈了！我浑身的血往头上冲，一头扎到地上，抱着孩子的尸首大哭起来。……

振清爸气冲冲地跑来了，他一把拉起我来，说：“别哭



了！凶手已经跑了！我们告状去！要不给孩子报这仇，我就不姓张！”

振清爸对我說，孩子死得冤，凶手的心太狠！乡亲们告诉他，那天小菜跑出去到处要饽饽，傅二看见就起了坏心，他把小菜领到庙

里，先給她餽餽吃哄住她，以後就說要帶她上天津去玩，其實是要把她賣到窯子裏去。孩子不干，哭着要回家，傅二就把她的嘴堵上，藏了起來。以後我們找得緊，他狗急跳牆就下了毒手，在夜里把她扔到井裏去了，還怕孩子淹不死，又扔下一塊大石頭，孩子头上的大窟窿就是給石頭砸的！……

那年頭，咱窮人死了，哪有錢買棺材呀！別說孩子，就是大人，不裝棺材也是常事。打官司已經借下了印子錢，可不敢再借了。俺們小榮就是用兩片破蓆一夾，丟到亂葬崗子裏的。我不願離開閨女，坐在那裏哭了一場又一場，後來還是振清跑來對我說：“媽！小妞的眼睛直往上翻。”我才想起，家裏還有個快斷氣的孩子。到家一看，就剩一口氣了，抽着，抽着，小手一扎撒，就閉上了眼睛……我想哭，可是已經哭不出來了，眼淚流完了！我心里像滾鍋一樣難受，我的小妞！你是媽眼睜睜地看着死去的啊！

后晌，我拖着沒了一点勁兒的腿，第二回又走上亂葬崗……

(三)

咱雖然也知道“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餓死不借帳，屈死不告狀”這兩句話是沖誰說的，但是為了出這口氣，為了給屈死的孩子報仇，我們下定決心要打官司。我們變賣了一切能夠變賣的東西，并狠了狠心借了五分大利的印子錢，到縣里遞了呈子。誰知道，錢花了，呈子也遞了，結果杳無音信。衙門里那批傢伙平日對付窮人的能耐有

的是，就是一点不管咱穷人的事，这又是一場冤枉官司。旧社会真是哪里也沒有咱穷人的出路啊！

連着死了两个孩子，打官司又借下了印子錢，日子就更沒法过了。振清爸还是給张振英扛活，可是每年都拿不回錢来，利錢越滾越大，欠下了还不完的債。打那以后，张振英对振清爸更不当人看待了。一天到晚不让你手脚有一会儿停，既不給吃饱，还整天罵罵咧咧的，說什么“吃我的，喝我的，借我的，再不好好干就把你赶出去！”振清爸忍着气干活，餓着肚子下地，腰越来越弯了。那年大秋的一天，振清爸爸实在餓得不行了，就想回来找点东西吃，剛走到半路，眼前直冒金星，一个跟斗就摔倒了。幸亏乡邻广順家的出来看見了，把自己家的晚飯給他吃了，才活了一条命。

那天晚上，振清爸偷偷地跑回家来，眼里噴着火，含着泪对我說：“孩子媽！不是我狠心，实在是受不了这份气、这份苦啊！孩子餓死的餓死，叫人害死的害死，打官司打不成，扛活受不了张振英的气！我們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啊！以后，孩子全交給你了，是好是歹，就听天由命吧！打今日我要离开延营街，离开这活地獄！”說完，他一跺脚就出了家門，头也不回地向西走了。……

全家大人孩子又哭成了一团。

孩子爸爸走了以后，我們的日子就更沒法过了，张振英串通了三大队①三天两头到家里来耍人要錢。那会子我算

① 三大队——一种反动地方武装，他們跟国民党反动派一样，騎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当地人又叫它“白脖”。

豁出来了，反正我就是这条穷命，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要钱，没有；要人，走了！要杀要剐全由你们！一天，张振英带着武装狗腿子，一进门就用枪指着我说：“你男人当了八路，快把他交出来！”我说：“谁知道他当什么，他是叫你们逼走的！你叫我上哪去找？”张振英拉长了麻脸吓唬着说：“今天找不出你男人就把你带走！”说完就叫几个“黑狗”在屋里乱折腾起来。翻了一阵，什么也没翻出来，炕上除了一张光蓆以外，什么也没有，张振英解不了恨，就用枪托子把窗户打破，把吃饭的碗砸碎，临走又照我身上给了两枪托，骂着说：“杂种养的！一天找不到你男人，你就一天别想安生！”

我的这个穷家，就这样被他搞得家破人亡了！

打那往后，我就领着剩下的两个孩子过起要饭的日子来。那年头，要饭也没处要啊！穷人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哪有多余的钱粮接济人？那些狠心的富人看到咱穷人饿得难受，他倒更开心了。光凭要饭，怎么能要得上口呢？一到晚上，孩子们就饿得躺在炕上不动了，再饿，就喝凉水。看着两个孩子捧着瓢，仰着脖子，一口一口贪婪地喝凉水的样子，看着他们那灌满了凉水的肚子，我的眼泪就嘩嘩地流下来。那阵，振清已经懂事了，看见我流泪，就不喝凉水了，说：“妈，我不饿了！”可做妈的知道，孩子在梦里还叫饿呢，怎么就不饿了呢？孩子越是这样，我的心就越发跟刀搅一样难受。

三女儿小折那年十三岁，除了整天挨饿外，还不幸在头上长了一个疮，因为没钱医治，越来越大，满脸满身流的都

是脓。后来脸上、身上也长起来了，肉烂得一块一块的，里面生了蛆，爬得浑身上下都是，疼得她一天只会哭。一看到她那张又黄又瘦、脓水四流的小脸，一听到她饿得没了劲儿的哭声，我就想：这么下去孩子准活不成，不饿死也得叫蛆钻死，要是在世上活受罪，不如早些死了强，做妈的也省得成天看着难受。这个念头在我心里天天打转，打转多了，我就下了狠心。一天，我领小折去要饭，路过东大坑的时候，她又疼又饿的又哭了起来。我一咬牙就要把她推进坑里，孩子的小脸吓得煞白，两手紧紧攥住我的腿，直愣愣地瞧着我……。我的心又软了下来。可是，一想到往后的日子，一想到孩子活受罪的样子，我的心又狠下来。我闭上眼，不敢看吓傻了的孩子，掰开她抓住我的手，把她往坑里一推，转身就跑，听见孩子淹得叫妈的喊声，我的心全碎了，可是我没敢回头，心里说着：“孩子！可别恨做妈的，妈是叫你早点不受罪，早点离开这个活地狱啊！……”

我跟掉了魂一样，糊里糊涂回到家，一进门，我就抱着振清大哭开了：“孩子，我就剩下你这一根独苗了！……”谁知道，晚上小折被人给送回来了，一个好心的看庙老头，听到她的哭声，把她救起来了。我接过孩子，紧紧地搂住她，生怕别人再把她抢走，好像刚才不是我亲手把她推下坑去的一样。孩子还有些害怕，眼睛瞅着我，说：“妈！往后我不说饿了。”我哭不成声地说：“孩子！是妈不对，是妈一时想不开，往后，就是再苦也不……”我抱着孩子又大哭了一场。

打那以后，我下定决心：要死，就全家一块死！

我正急得要寻死，好心的邻居给我找了个差使，我就给一家地主当老妈子。在人家家里，我使尽力气干活，受气也不吭声，怕的是再丢了这个饭碗。就这样，我省吃俭用，卖死力气，再添补些野菜、树叶，一家三口总算熬过了三年。

(四)

一天，我从东家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屋里坐着一个当兵的，正搂着小折呢。我眼都气红了。这些野兽，还没欺侮够穷人哪！连这么点的孩子也不放过！我一把夺过孩子，瞪着他，说：“还我孩子！我跟你拼了！”那个兵苦笑了一下，慢慢地站起来，对我叫道：“清儿妈！我回来了！是我回来了！”我愣了半天，瞅了好一会儿，才“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这可不是孩子他爸爸吗？我哭着问他：“你真的当了八路军？”他拍拍身上的黄军装，指指帽子上的红星，说：“真的！我那天晚上跑出去，就在村里找到了游击队，以后就参加了八路军，跟聶司令打到东北，现在又打回来了！今天部队在采育休息，我请假回来看看，明儿一早，还得赶部队去。”我瞅着他，他可是大变样了，腰板直起来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完全不是扛活时的振清爸了，可就是一样没变，他那眼里还是藏着临走时的怒火，它更亮了，就像要喷出来一样。

晚上，振清拾柴禾回来，瞅着他爸爸吓得钻到我怀里来，孩子哪认得他呀？振清爸抚摸着孩子的头，叫着他的名字说：“别怕！孩子。我当的是共产党的兵，是毛主席的兵，是来解放咱们的！咱们的苦日子快出头了！”那天夜里，我们

全家都沒睡覺，听他爸爸讲了一夜，那些話至今我还忘不了。

振清爸第二天早上就走了。我沒留他，让他快点去打倒反动派，快点回来解放我們吧！共产党、毛主席，这新鮮的名字第一次在我心里生了根，我觉得他們生疏，但又是那样亲近，我天天盼着他們，盼他們快快来到延营街。

我盼望的日子到底来了。一九四八年，咱这儿解放了，延营街見到太阳了！张振英叫咱們打死了，三大队叫咱們收拾了，地主老財低下头了，穷哥們站起来了！在訴苦大会上，我把埋在心里四十年的苦水全倒出来了。我要报仇！我要伸冤！我要他們还我那死去的孩子：还我的小荣，还我的小妞，还我一家的血泪債！

很快就土改完了，我分了张振英的房子。分房那陣，有的人不敢要地主的房子，我說：“我要！我不怕！这是咱穷人的血泪盖起来的！他三大队再也回不来了！”我儿夜合不上眼，心里一陣欢喜一陣难过。喜的是打今儿再也不受苦、不受罪，再也不过牛馬日子了；难过的是，我那死去的孩子看不到今天，要是他們活着，都該成人了啊！我抬起头来，看着牆上的菩薩：神啊，神！我祷告了你四十年，可你一回也沒搭救过我，你反倒叫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受苦的更受苦，欺人的更欺人！你的心不公啊！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搭救了咱穷人，搭救了我穷老婆子一家！毛主席啊，毛主席！你才是咱穷人的真神哪！我拿出分到的錢，第一件事就去买了一張毛主席的像，把它高高挂起，把那张假慈假悲的菩薩撕下

来，塞到灶下烧掉。我给毛主席磕了几个响头，真神啊！没有你，就没有我穷老婆子今天！

那阵子，我高兴得浑身是劲儿，整天使也使不完，过去是给人家当牛马，今天是当家做主人，就是再累再苦也心甘情愿啊！从土改到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我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今年，我又翻盖了五间新正房，安上了电灯，一家人搬进这亮堂堂、暖和和的屋子，过去被我推到东大坑的女儿小折，现在已长大成人出嫁了，跟他的丈夫、孩子过着幸福的日子。那阵跟我要饭长大的振清，现在是党员，当了治保主任、保管员，振清爸复员回来，也当上了生产队的饲养员，我也抱上两个小孙孙了！拿这阵瞅瞅那阵，真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拿这阵的两个小孙女跟过去的振清、小折比，真是一个是金棒锤，一个是土坷垃！想想过去，瞅瞅今天，才知道今日的甜，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我多嘴也忘不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多嘴也要跟党和毛主席走！

振清明儿就要上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去了。去吧！孩子。咱们的日子好起来了，可不能忘了大伙。咱们生产队还有许多事儿要办，咱们国家还有许多事要办，人民公社的架子就靠你们这些年青人来撑了。三面红旗就靠你们来扛了，将来更好的日子也靠你们来创家立业了！去吧！孩子，要好好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多学点本事，日后好多为大伙办事。

（王广钧、李秀民、李开基 记。贾浩义 图）

喜翻身，永世不忘本

通县小务人民公社社员 刘 馮 氏

現在的一些小青年对我保存下来的討飯罐和破鏟刀觉得好笑。他們是在幸福窝里长大的，哪知旧社会的苦啊！

穷苦人生死无靠

受凌辱身染重病

我一天也沒有过过安定的日子。我原先的丈夫是东北人，叫吕敬凤，在鉄路上做小工，他有病，但是为了活命，也只好抱病去干活。有一天，下工后累得走道都打晃儿。天又下着大雨，路又滑，他想跟火車头赶回来，刚往上爬，脚一滑，眼睛一黑，便跌倒在鉄軌上。火車正好开动，把他齐腰一轧，活生生給轧成两截。

丈夫死了，工头还罵我“白虎星”“剋夫命”。在那种年头，穷人家的女人真是受尽了欺侮。

那年月，一个单身女人，还带着一个六岁的閨女，到哪儿去找飯吃？还是穷人怜穷人哪，刘臣他爹刘万德，也是咱們大兴县魯城人，看俺們娘儿俩可怜，收了俺們。那年他四十六岁，比我大十六岁，也是穷棒子，娶不起媳妇。說真

的，要不是咱們“筭門子搭筭門子”，他得打一輩子光棍。哪能像現在的小年輕的，二十來歲，工作還沒干出啥名堂來，就急着找媳婦。

我嫁給劉臣他爹，算是有了個頂天柱，可哪頂得住生活的艱難？物價呼呼迎風漲，他在鐵路上一個月六塊大洋的工錢，哪能養家糊口？原來，我還能幫人家洗洗補補，補貼補貼，沒想到我懷孕了，不能幫他干活兒啦。

清明節，有錢的人家張羅着祭祖，咱們家還是冰鍋冷灶的。晚上同丈夫一核計，要是苦死在外邊，還不如回家謀個生路。

心想：憑着一雙手，混口飯吃，總該成吧！這年的三月，我們一家就回到了老家——魯城。可是，劉家地無一壟，耙無一張，只有兩間破土房。我雖說是重身子，也只得硬支撐着，帶着小閨女起早摸黑拾柴禾，白天給地主婆子打雜。我丈夫也想法托人到地主家去扛長活，可是地主嫌他年紀大，精力不強，又沒種地的傢伙，而且常年在外面做工，庄稼活不地道，都不肯用他。那會兒真難啊！你送上門去給地主、富農們剝削，他們還挑肥揀瘦呢！後來，長工做不成，就給人家打短兒，听人家使喚。可這也不是長法兒呀？一天沒活干，就沒吃的。我又同丈夫一核計，想自己租地種，不看人家陰陽臉。我們向地主“馮雞屎”租地，他要現租，我把結婚時的一塊夏布和一身褂里的衣裳繳了現租，租了三畝什么都不長的鹽鹼地；後來鄉鄰們又幫忙請了個“會”，把祖上典當出去的四畝墳地贖回來。心想，這回滿可以自在地種地過日

子了吧。万万也没想到，头一年就遇到大涝，快到嘴边上的庄稼又落了个空。我急得仰天大哭。打那天起，咱家的锅盖就老连在锅上揭不开了。

接着，我就生下小刘臣。为了让我能吃上口粥，我丈夫硬着头皮去向财主借棒子，财主不但不借，反而侮辱了我丈夫一顿，说什么：“养得起猪就盖得起圈，娶得起媳妇还管不起饭。”我丈夫一气一急就得了重病。

为活命受尽煎熬

切齿恨永记心间

那种年月我怎么还能按常道儿“坐月子”？生下孩子的第二天我就下地拾柴、挖野菜去了。后来还是没辙儿，我又去给地主婆子洗衣裳打杂。整天马不停蹄地干，十个指头都磨起了泡，加上我又生下孩子不久，体力又弱，就此留下了虚弱病，手老是哆嗦；得了这个病，干起活来总不如先前利索。地主婆子看我这样，就把我辞了。直到现在，我的手一悬空就禁不住直打颤颤。

这么一来，我难上加难。刘臣他爹还病在炕上，一家四口，老的老，小的小，几张嘴吊着，要吃要喝，有什么法子，只好先讨点饭来度命吧。在鲁城讨吗？不！我丈夫上回借棒子受了地主的气，我说什么也不能再受侮辱，心想，穷也要穷得有骨气。每天，天上的星星还眨着眼，我就背着小刘臣带着讨饭罐和筐，悄悄地从村后走出去，到八九里地以外的半截河、安平去讨饭。一路连讨饭带拾柴禾，太阳挂树才回

家来。

討飯的日子可不好受啊！那时候，我身子骨虛弱，走不动道儿，也只得咬牙頂着，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倚在墙边或土崗上靠一下。有一回，一天只討了半个棒子餅，我舍不得吃，餓得腿打軟，就在地上走一会儿，躺一会儿，好不容易才挨到家。到家后掺点菜帮子、榆树叶、楊树芽子，做点湯哄孩子。还有一回，刘臣五岁了，我措着他弟弟小刘崑去討飯。天正下着大雪，西北风吹得人睜不开眼，連路都认不清。走不多远，就摔了一跤，好半天才爬起来，沒路可走，我們只好空着手回家，一进門，小閨女笑着迎上来，拉我的衣角，小刘臣就吊住我手里的討飯罐子，嚷着：“媽媽，我要吃餛飩！媽媽，我要吃餛飩！”等他掀开討飯罐一瞧，是空的，他气得把討飯罐往地上一摔，哇哇地哭起来了。我的眼泪禁不住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风雪夜走失亲人 图生机投奔他乡

頂过了寒冬腊月，眼看春节到了。有钱的人家欢天喜地，大包小包往家里买东西。可咱們家一把粮食也沒有，大年三十晚上，我丈夫就像尊石头人似的，痴呆呆地坐在炕上。孩子大的哭，小的叫，小刘臣直鬧嚷着：“媽媽，我要吃餛飩。”我含着眼泪，摸摸他的小脑袋哄着他說：“臣儿乖，別鬧，媽媽这就去拿。”孩子真的不哭不鬧了。我跑出門，可上哪儿去拿呀？心想，活着多冤啊！倒不如死了干净。

我昏沉沉地来到村后井台上痴坐了一会儿，望望天色，天上的浮云就像咱们家孩子的脸，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我又低头看看井里，我的影子晃悠悠的，像对我说：“孩子妈！你不能啊！你死了事小，可孩子怎么办哪？”我心一酸，又对着自己的影子哭了一场。我含着眼泪在井台上拾了点菜帮子，回家熬汤哄孩子。

晚上，屋里阴冷阴冷的，黄豆大的灯花，摇摇晃晃。我又向丈夫委屈地哭了一场，丈夫只是责怪自己，“都怪我，都怪我，连累一家大小，跟着我受苦受罪。我连一条牛都不如啊……”说着说着他就掉下了眼泪。半夜里只听他唉声叹气，约莫下半夜，鸡叫头遍，他悄悄地爬起来，又静坐了一会儿，就蹑手蹑脚地开了门，出去了。

我还以为他出去一会就回来，谁知道，这一去就不见回来。第二天，我才发现丈夫被苦日子逼走了。俗语说“家无主，桶无箍”，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我急得村里村外乱转悠，像掉了魂似的。

为了那些还未成年的孩子，我只得忍受着一切，拼命挣扎着活下去。整天，我又割草，又拾柴禾，连讨饭带劳累，加上又愁这个，又愁那个的，支持没多久旧病又复发了，喘气不匀，浑身直哆嗦，差一点没见“阎王”。

我病倒了，孩子没人管，终日饿得直哭，穷乡亲们看我太可怜，就借点棒子、白薯干给咱们度命。后来乡邻帮我打听到刘臣他爹在北京万顺旅店当小工，我赶忙托人带信叫他回来。他回来看我病着，怎么走得了？等我病刚好了一点，

他再去上工的时候，掌柜的翻眼不认帐，工钱没拿着，还挨了顿训斥，连衣裳铺盖卷儿也被扣下了。

这么一来，我丈夫的差事掉了，三股子麻绳一起断，真正“没辙儿”了。丈夫同我又核计，离开鲁城这个鬼地方，到海子里——马驹桥讨饭去。

当牛马积劳成疾

小闺女觅食丧命

俗话说：“腊月鬼门关。”一心想赶快逃出“鬼门关”，恨不能长上翅膀就飞。

刘臣他爹用废木头做了一辆小車，我在前面拉，他在后边推。三个孩子没棉衣，用一条破被絮裹着坐在車上；还带着一口破锅，一把破镰刀，一个讨饭桶，一根打狗棍，这就是咱们的全部家当。

一家大小顶着刺骨的寒风，披星星，戴月亮，没日没夜地走啊，走啊，沿道讨饭到了马驹桥。

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财主的心都是一个模子造的，一个样毒。有一回，我搀着小刘臣，背着小刘崑，顶着大雨到财主家讨饭。咱们走到人家大门道里，地主眼珠一瞪，骂道：“嘿！讨饭讨到门里边来了！到炕头上去吧？臭讨饭的，滚！滚！滚！”把咱们娘儿三个轰到雨地里。

后来讨饭讨到一个大庄子上，庄上有户大地主，姓陆，外号叫“陆庄子”。这个村的地都是他的，他家地多要扛活的，我丈夫在他家当上了长工，给他种园子。小刘臣也跟着

他爹，替地主放羊。



我丈夫
三星沒落就
起床挑水，
白天种地，
夜里还要喂
牲口，飢一
頓、飽一頓
地过着牛馬
不如的生活。
不幸又
得了痢疾，
整天拉稀，
但是也只得
頂住干下

去，不然，地主就不用你。

我不忍心，就割青草卖錢抓药，給他每天上工前吃点药，好頂得住啊！

我的那把割草的破镰刀，哪里还像个镰刀，薄得簡直像个草叶儿，都磨沒了。我使了它二十年，只要地上有草，我这把镰刀就沒閑过一天。我这十根指头和常人不一样，都是扁的。硬是割草图快，镰刀碰的不断流血，我也沒停过一天，筋疼得縮上去了，这不就癩了。

夏天青草多，我带着小刘崑，起五更爬半夜，走七八里

地到荒滩上去割草。太阳毒得像下火，到晌午，背上像放着个热烙铁，遇上大雨，就淋得像个落汤鸡。割了草还要赶紧赶到街上去卖呀，身上背着六七十斤草，怀里抱着小刘崑，走道还不敢慢走，在路上工夫大了，草晒干了，到街上牲口行就不收了，要不然煞你的价，一天就白干了。

就在那年夏天，他们爷儿俩在外扛活，我带着小刘崑在外割草，家里就一个小闺女，没人管，整天在街上拾破烂。她爬树摘果子充饥，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腰跌坏了，又淋了一场雷暴雨，浑身发烧，瘀血成疮，也没钱吃药，没多久就死了。

苦刘崑扫粮折腿

佃刘臣盼望大軍

穷人怕过寒冬腊月，眼看又到了腊月鬼门关，草也没割的了，家里经常不冒烟。穷人想穷法子，我就搀着小刘崑到集上扫粮食。那会儿，连孩子都知道粮食金贵，瞧见街上有一粒粮食，就像瞧见珍珠似的。看见街上有人鞋底上沾走了粮食粒，他就跟在人家后面跑，直到粮食粒掉下来，拣起来笑着送给我。

有一回，咱们娘儿俩在粮食行门前拣粮食，小刘崑拣到粮囤子跟前去了。我没瞧见，只听到“哇呀”一声惨叫，我掉过头一看，小刘崑瘫在地上喊“妈妈！”我上前一瞧，可怜他的小腿被粮行掌柜的用脚踩折了。我揪住掌柜的说理，他凶声恶气地把我一搯，骂道：“谁请你们来的，臭讨饭花子，

糧食少了，都給你們弄走的……。”天哪！那年月窮人有理上哪兒去說去！

回到家里，聽說小劉臣也被管家的打了。這孩子就是倔強，同地主家小少爺在地里格房子玩，小少爺被泥坷垃絆了一跤，額上跌青了一塊，他上前揪住小劉臣，賴他碰的。小劉臣罵他“孬種”，他哭起來了。驚動了管家，他不問青紅皂白，上前就給小劉臣兩個耳光子，小劉臣不服氣，又朝小少爺罵了一句：“狗仗人勢，有本事再比比。”管家又上前把小劉臣頭朝下、腳朝上的“打夯”，還罵道：“你的苦胆從屁眼里冒啦，活兒不干，欺侮起小祖宗來啦！你還想活命不！你給我滾蛋。”說着又把他往地上一摔。

小劉臣從地上爬起來，一聲沒哭，擦擦鼻子，歪着脖子，冲着管家說：“狗崽子，等大軍來非宰了你不行。”馬駒橋是拉鋸區，人們都說大軍好，孩子也學着這麼說。

小劉臣回到家里，剛進門就哭起來，說什麼也不肯去放羊了。一頭撲到我懷里委屈地大哭起來，直是央求：“媽媽，我不去了，好嗎？他們盡欺侮我，我不干。”我听了孩子的話，心里像針戳，可那陣子，印把子在人家手里，忍着吧。我還是狠着心哄他：“孩子去吧，甯怕，有媽哩，等大軍替你報仇，送你上學，等着吧，乖。”他听我這麼說，點點頭，眨眨眼，真的又去放羊了。

惡地主垂死掙扎

出苦海重見天日

咱們窮人除了盼共產黨，還有第二條生路嗎？——現在

的青年多好啊！安安逸逸，只一桩心事，搞好生产，党就在眼前。那时候光听说共产党八路军怎么好，就是找不到，咱们咬紧了牙关，盼呀！盼呀！有时小刘臣在梦里也叫起来：“大軍叔叔，大軍叔叔！”

果然，一九四七年秋上，八路军真来了，“陆庄子”等地主们早吓得像兔子一样蹿了。共产党一到就实行了减租减息。咱们虽没租地种，可我丈夫扛长活的工钱长了三石谷子。

村里村外，穷人脸上都乐得开了花，直高兴得咱家小刘臣乱蹦乱跳。五月节，咱们家又做粽子又下面，一家子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乐和饭。

没料到，粽子叶儿刚晒干，“陆庄子”带了一帮地主、富农，骑着高头大马又回来了。

“陆庄子”回村后，把咱们扛活的工钱又给减了。那是怎么个减法呢？一天早晨，“陆庄子”的管家，带了几个狗腿子，不问情由把我丈夫绑到中心大场上，四周用枪围起来，对着穷乡邻说我丈夫“聚众闹事，勾结共产党”。真是只有天晓得，要是我丈夫真的跟共产党走了倒谢天谢地了。我一瞧这光景，急得嚎啕大哭。后来地主传话过来，说：“把涨的三石谷子退回去，今后老老实实干活，事儿就算了结了。”我听到这消息，就东凑西拼，把谷子凑齐送回去，我男人才免遭一死。

那会儿，我心里嘀咕，共产党什么时候再来呢？后来听有的穷乡邻背地里说：“快了，一定来，再来就不走了。”我

說：“就盼着呢，等八路軍回来，要把‘陆庄子’他們活剝皮才称心。”我說了這個話，心里說不出来有多舒坦。

可不是嘛！正在腊月里，最困难的时候（一九四八年底），共产党当真又来了。土地改革的时候，咱們一家再也不在外头受苦了。回到魯城，分田分地。由互助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真是一步一步往天堂里升啦！我今年六十三岁了，日子越过越开心，眼前是什么日子，过去咱們是什么样儿？最近村子里的地主、富农还不老实，咱們可千万要加小心啊！咱死也不能忘記过去的苦，更不能忘記共产党、毛主席給咱們穷人的好处。

（栢 柳 記。沈今声 圖）

[附录]

土皇帝——“南霸天”

——海淀区羊坊店恶霸地主刘喜亭罪恶纪实

出便門，往西看，
刘家园子一大片。
井又深，牛头罐，
一人打水没人换。
砂子米，夹生飯，
又难吃，又难看。
推大磨，起猪圈，
外带挑水看場院。
筋磨細，骨压弯，
一年到头累死算！

这是解放前流传在海淀区羊坊店一带的一首民谣。它生动地描写了恶霸地主刘喜亭剥削农民的凶狠嘴脸，又渗透着多少贫雇农的血汗和愤怒！

刘喜亭原是羊坊店的一个地痞流氓。在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他勾结一伙土匪强盗，路劫了一批军餉——一車銀子，发了横财；又巴结上了清末北京的九門提督（日本統治时期的北京市长）江朝宗，当了江朝宗的干儿子。

他依恃这个封建大官僚之势，做上了“官产总署西南郊专员”。以后便利用职权，明抢暗夺；又在“官产留置”的幌子下，把大片大片清朝贵族的土地霸为已有。刘喜亭成了有财有势的暴发户，便进一步吞田夺地，搜刮民财，尅扣雇工，为非作歹，在西郊当起了土皇帝，成了有名的“南霸天”。

刘喜亭家的土地东起西便门，西到丰台区的小井、岳各庄，不多不少整整七百亩。然而这里每寸土地上，都记载着农民的苦难；刘喜亭的发家史，就是无数农民丧家破产的血泪史。请看数不尽的悲惨事件中的几个例子。

农民金宝福在父亲死后，因生活无着，把自己的二十三亩土地典给了葛家，自己去当苦力。后来，他想贖回土地而后出卖，以养家度日。哪知姓葛的起了歹心，企图霸地不让贖回。金宝福就到法院控告。葛家见势不妙，就以厚礼相送，买通了刘喜亭。刘喜亭见有利可图，就参与其事，假造了一张佃户字据，写道：

“金家之土地二十三亩，出租葛家，没有年限。丰年不增租，歉年不减租，卖马不离槽，租随地转。”

意思是说，无论把地卖给谁，葛家也有种地的权利。因为刘喜亭财大气粗，法官便见风使舵，一过堂就根据那张假文书判了个“金宝福家不得贖地”。老金花了钱，丢了地，有冤无处诉，只好忍气吞声靠讨饭度日。而狡黠奸诈的刘喜亭见时机已到，便混水摸鱼，以“官产总署西南郊专员”的名义宣布，那二十三亩地是“旗地”，要“官产留置”，全部充公。所谓“公”，就是刘喜亭自己。从此，这块地就改变了姓氏，被刘

喜亭霸占了。

刘喜亭一向官运亨通，日本統治时期，他变成了“爱护村”村长和联保主任。之后，国民党一来，他又变成国民党北平市第十六区的書記和联保主任。他依仗权势，巧立名目，夺取土地。刘喜亭規定，农民的土地必須有三道地契，即在土地轉卖过程中的三家契紙，才算合法，否則一律充公。小屯的农民关文成有四十亩菜地，因为沒有三道契紙，就又被刘喜亭充了“公”。农民关致祥有一亩半好菜地，早被刘喜亭垂涎。为了霸占这块地，这位联保长向关致祥派了“自治費”。关致祥借錢交清了。沒过三天，刘喜亭又派保长来要錢。关致祥知道他們是故意刁难，就去找刘喜亭說理。刘喜亭却威胁說：“如果到期不交，就要以抗捐論罪。”关致祥惹不起人家，只得忍辱含垢地交了第二次。哪知到第六天，那位联保长又派警察来收“自治費”！关致祥再也无能为力了，在警察的逼迫下，把那一亩半菜地交給了刘喜亭，以地頂捐。受尽欺凌的关致祥，为此一病不起，不久就被活活地气死了。

刘喜亭有两副面孔，有时穷凶极恶，强占明搶；有时則乘人之危，假仁假义，誘你自投圈套，以夺取土地。农民蔡王氏有六亩五分香椿树地，因为生活所迫，把地典給了刘喜亭，典价二百元。几年后，蔡王氏省吃俭用，凑足原款去贖地时，刘喜亭把眼一瞪說：“你的地早当死了，还贖什么！”蔡王氏沒办法，只得眼看着刘喜亭把自己心头肉一样的土地夺走。农民李玉海在馬場有十二亩地。刘喜亭看中了这块

地，就鼓动他再买辆大車。李玉海听信了地主的花言巧語，就向人家借了五百元紙币买车。当时讲明要用“出九八当月三分利”，就是每借一百元只給九十八元，再扣当月的三分利息，实际只能拿到九十五元。这样一扣，五百元只剩下了四百七十五元。李玉海买了車，但人和牲口都沒吃的，又欠下七八个月的利息，就想再借一百元。刘喜亭当下算盘一响，五百元七八个月的利息，利变本，本再生利，連本带利共是九十六元九角。李玉海这一次借了一百元，却只拿回去三元一角。沒过多久，牲口餓死了，人也活不下去了。再去借錢，刘喜亭閉眼不理。李玉海絕了路，只有卖地。刘喜亭事先就派人放了风：“李玉海若卖地，只許刘家要，別人誰也不准买！”但在李玉海面前，他却說：“我帮你問問別人吧，我是不要。”过了几天，他又对李玉海說：“你的地沒人要。我好說歹說，有一家要了，但是只出八百五十元，多一个子儿也不行。”为了活命，李玉海只好答应了。八百五十元卖地錢，扣去本利七百多元，只拿回八十二元，沒半个月就吃完了。地卖光，錢花尽，李玉海一家只有出門討飯去了。

农民王家有地三十亩，父亲死后，土地給三个儿子分了，每人十亩。大哥不久去世，留下了孤儿寡妇，生活沒有着落。笑面虎刘喜亭就假装慈悲，乘机借給她八十元伪币，而以地契作抵押。当初王家三兄弟只分了地，沒分契，王家寡妇就把三十亩地的地契紙交給了刘喜亭。后来，三弟王玉华去种地时，刘喜亭出面阻拦，硬說那三十亩地是刘家的。王玉华沒有地契，讲他不过，想去政府控告，怎奈“衙門八字

朝南开，有理无錢別进来”，是怎么也告不贏有錢有勢的刘喜亭的。就这样，王家从此破产，大嫂被迫改嫁，两兄弟給刘喜亭当了长工。

有一天，刘喜亭騎着一匹走驴在村边闲溜，看見老农民匡德福在耕地。他就对匡家的八亩地起了歹心。他跳下驴，皮笑肉不笑地說：“二叔，你这么大的年紀还下地干活，明天我派几个人来帮帮你就行了。”第二天，果然有人和牲口来帮着耕地、拉粪。到下种时，他更加殷勤，二叔长二叔短地說：“种棒子干什么？还是种花生利大！我家有的是花生种。”第二天，他又派人送来花生籽，并且帮着种上了。一年过去了。第二年，刘喜亭照旧派人来帮着耕种。可是这年收成不好，匡德福又多病，生活成了問題。到大年三十晚上，刘喜亭来到匡家，假装为难地說：“二叔啊，我家人多口杂，生活也困难，咱们的帐也該算算了。”还没等匡德福开口，他又接着說：“地里收的东西，得对半分！”匡德福猛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这时才看透了刘喜亭的黑心窝，知道自己上了他的圈套。算盘珠一扒拉，当年的收获都交給刘喜亭，仍然倒欠他的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匡德福将八亩地押給了刘喜亭。可怜勤劳善良的匡德福，就这样被刘喜亭活活逼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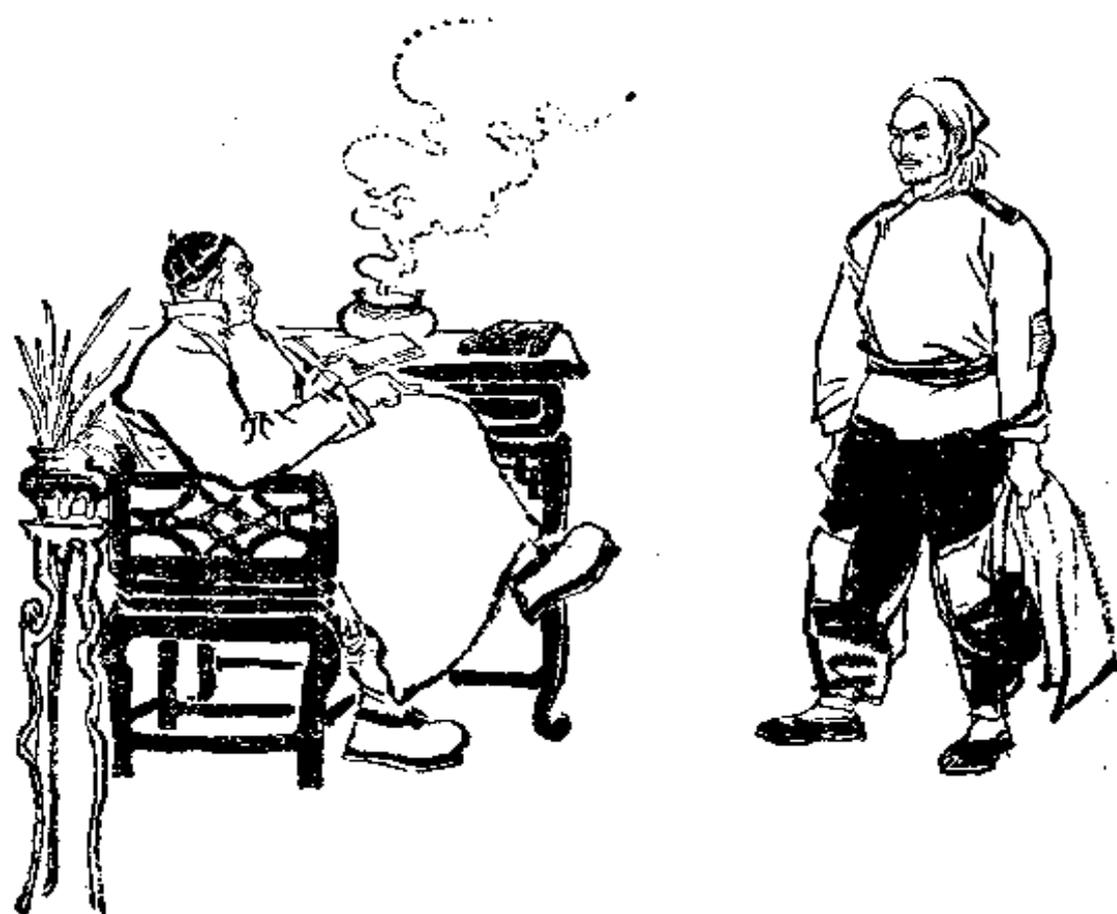
恶霸地主刘喜亭就是这样，在农民的尸骨和血汗里，建立起了他的家业。土地成了他的搖錢树，靠了这些黑手搶来的土地，轉过来残酷地剝削农民，驅使他們做牛做馬，为他干活，为他劳頓終生。太平桥万景全租种了刘喜亭二十

亩薄地。刘喜亭假惺惺地对万景全说：“我不多要你的，每亩地你交四块大洋吧！”老万一年忙到头，二十亩薄地没有收多少东西，可是地主一点力气没费，一下就吞进了八十块大洋。两年过去了，由于老万的辛勤劳动，薄地变成了肥地，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地主又想出了新的诡计。一天，他带着几个狗腿子前呼后拥地来到地边，瞅了瞅茁壮的庄稼，对正在耕作的老万说：“万二啊，我家的日子不好过，这块地我要抽回自己种了！”万景全听了这话，真好比晴天一声霹靂，只好苦苦哀求让他继续租种。刘喜亭假装善心地说：“好吧，地还让你种，不过每亩地租得八块大洋。”为了顾全一家六口人活命，老万只好每年多交一倍地租。第二年，粮食市场紧张，刘喜亭又逼迫万景全交实物地租，改为每亩一石白玉米，还要交一千斤芥菜疙瘩，二十个大冬瓜。有一年遭了雹灾，蔬菜都被砸坏了，刘家的狗腿子天天上门逼租逼债。万景全到处借钱，变卖完了家产，用高价买了二十石白玉米送到刘家。地租交清了，他却也倾家荡产了。一家人先是吃豆饼，后来只能吃野菜和树叶。没衣服，几块麻包片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过着忍饥挨冻的日子。

对于佃户，刘喜亭有很多刻毒的剥削办法。租种他家土地的农民，没有不吃过他的“大秤入、小秤出”的亏的。岳各庄的刘昆，租种了刘喜亭二亩地，讲明地租两石。年终交租时，刘昆怕地主捣麻烦，把新收获的粮食仔细晒，精心扬，挑选了足斤足两的二百斤粮食去交租。可是上刘家的秤上一称，却只有一百七十五斤。刘昆明知道那老狐狸用的是大

秤,也不敢辯解,只得又用留的籽种补上二十五斤,才算了事。

恶霸地主刘喜亭家业大,地亩多,平时就雇着长工和短工七八十人,农忙时还要加上六七十个短工。刘喜亭绞尽脑汁想办法剥削雇工。一年冬天,寒风刺骨,长工王广和在菜窖倒白菜。东家送来的剩窝头,冻得啃不动、掰不开。他就捡了两小棵白菜,切碎后熬窝头吃。这事被刘喜亭听说了,他一个电话通知了警察二分署,把王广和抓了起来,扣留了一天一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释放后,王广和赌气辞掉不干了。刘喜亭却说:“不干不行,你得先赔白菜。你知道那两棵白菜值多少钱吗?”王广和恐怕再生是非,只得又干了七



个月。他去算工錢，按規定得掙二百八十斤老玉米。地主不动声色地說：“两棵白菜就是七个月的工錢！”王广和几乎气炸了肺，一躁脚，离开了这座閻王殿。

王玉华給刘家当长工，讲明每年工錢是七石玉米。年終去領錢时，地主只給四石。王玉华問：“还差三石呢？”刘喜亭眼皮也不抬，就說：“那三石交兵役費了。”这話一出口，誰还敢言語？再多話，就会被抓了壮丁。有个姓董的农民是逃难到北京的，因为身强力壮，被刘喜亭看中了，他假心假意地說：“你也沒地方去，到我家吃頓飽飯吧！”老董风里来雨里去，为刘家整整干了五年活，地主連一文工錢也不給。直到老董被国民党兵的流弹打死，連条褲子也沒有，只在腰里围着一块破麻包片。长工李德祥，每年掙工資三百六十元伪币。到年底，刘喜亭忽然主动給涨到一千元，一結帳还剩下四百元。李德祥想进城买点东西带回家，到市場一打听，一部旧小說《彭公案》还卖六百元呢。原来他一年劳累，还换不回一本小說。

刘喜亭家的长工，“干的是二五更的活，歇的是坐着的晌”。早晨天不亮就得下地，晚上不見月亮不收工；中午歇晌，只許坐着，不許躺着。为了让雇工給他卖命，他用較高的工資买通几个带头干活的“掌班”，雇工干活赶上掌班才能按时拿到工資。可是掌班力气大、技术高、工具順手，一般雇工就是累死累活也不容易赶上啊！刘喜亭对待长工极端刻薄，平时不給好飯，过书时也要想办法不让雇工吃好。刘家每年春节不得不按习惯让雇工吃面、吃肉。上午是吃茄

子炸醬面，劉喜亭怕長工吃得太多，就故意讓伙房多放茄子，少放面。中午吃肉，劉喜亭親自抓起水瓢往熟肉鍋里兌涼水，還放进整把的大鹽和几勺葷油，一鍋肉被他弄得又苦又膩。長工們沒法吃，他就說：“扛長活沒這份福氣，連肉也不吃！”勉強吃了肉的人，就會拉肚子，他就說：“扛長活的太下作，肉吃得太多，都吃得拉稀啦！”

惡霸地主劉喜亭把長工的血喝盡、肉吃干，他自己過着極端奢侈豪華的生活。他吃的是雞鴨魚肉，大米白面；穿的是皮衣革履，綾羅綢緞；住的是雕梁畫棟，深宅大院。羊坊店四百多間房屋，劉家就有一百八十三間，他自家住着兩處宅子、四十間房。還豢養着四十條惡狗，為他看家護院。他出門騎的是走驢，太太、小姐則坐着一輛圍紅氈、掛串鈴的小轎車。劉喜亭不僅在經濟上盤剝窮人，而且还橫行鄉里，作威作福，為非作歹。劉家有一條電話綫直通警察分署，他一句話，就殘害得一家農民家破人亡。貧農姜德海受不了劉喜亭的剝削和壓迫，拒絕給他做工。劉喜亭就派狗腿子在夜間去姜家“查戶口”，乘機將姜德海狠狠地毒打了一頓。

一九四〇年八月，偽政府雇人去當炮灰。劉家長工劉貴，生活沒法混下去，願意賣身當兵。聯保主任劉喜亭答應在劉貴走后把十六塊大洋送到劉貴家。十月底，劉貴回家追問此事，並且找劉喜亭索款。劉喜亭貪污了這筆錢，反而誣告劉貴“抗兵私逃，借事行搶”，一個電話，劉貴就被抓到警察二分署。劉喜亭又買通了偽軍，以“抗兵私逃”的罪名，把劉貴槍斃在大紅門。農民韓榮以“抗交兵役費”之名，被抓

去当兵。韓荣不願送死，逃回本村，又被刘喜亭买通国民党军队，被残害在通州。刘喜亭还不死心，又抓走了韓荣的儿子去当兵，說要“父債子还”。

恶霸地主刘喜亭，就是这样，欠下了西郊农民一笔笔血債，广大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他在清朝末年、日本侵占时期和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一直是这一带的土皇帝。但是，他能永远統治西郊嗎？不！

东方升起了火紅的太阳，共产党和毛主席来到了北京。恶霸地主刘喜亭的靠山——国民党反动統治被打倒了，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作恶多端的刘喜亭沒逃出人民的法网，人民政府依照人民的要求，枪毙了这个恶霸地主。現在，这里的人民，在人民公社里愉快地劳动着，幸福地生活着，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建設着我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张宝章、邵庭、杜庆华 記。 王同仁 图)

橫霸“东冉”三十年

——龔家地主剝削史

提起龔家地主，海淀区东冉村无人不恨，无人不罵。人們說，已往几十年，龔家地主占着东冉村半边地，遮着东冉村一片天。其实，何止于此，远在西山脚下，龔家就霸着半頃多地；龔瑞在日伪时期担任伪保长，勾結日寇統治着周围十七个村。

从龔大（龔寬）、龔二（龔慧）到龔三（龔瑞）、龔四（龔敏）、龔五（龔謙），以至他們的侄子，无不家大业大，騾馬成群，山、田、林、牧无所不有。这些家业，包含着东冉村穷苦农民数不尽的血汗和眼泪，也包含着他們无穷而深沉的仇恨。

一 笔 橫 財

一九二七年，龔瑞在京东被馮玉祥率領的第一軍抓去往张家口馱軍餉。龔瑞和押送軍餉的連长两天工夫就混熟了。在路上，他一边和連长搭訕，一边琢磨：兵荒馬乱的时候才出英雄呢。連长这小子也是个粗人，要不在这一千多斤餉銀上打主意，多会儿我才能賺出个金地玉房来？田

园无际、牛羊成群、呼奴唤僕的发家远景，在他脑子里时隐时现。

这天傍晚，宿在一家客店里。刚吃过晚饭，突然店里一阵骚乱，不知谁在高声喊叫：“第一军败了，第一军败了，正往西撤退，路上小心散兵抢东西！……”

龔瑞和領队連长听到前院一片嚷嚷，就走了过去，一打听，才知道，第一军真的吃了败仗，馮玉祥已經退到蒙古了。

二人打听仔細，回到后面房間。

“嘿，該我三爷发财，天从人願。”龔瑞心想，就試探地問道：

“連长，您看怎么办？”

連长哭丧着脸，摇摇头。

“张家口危在旦夕；回北京，您交不了差。”龔瑞瞅了連长一眼紧接着又說：“您不如趁机逃走。……”

“逃，怎么逃？”

龔瑞眼珠一轉，貼近連长的耳朵：

“依兄弟愚見，您不如带着这笔餉銀远走高飞，图个富貴自在。”

連长沉思了半晌，点了点头：

“那末，我多給你几个脚錢，明儿就分手吧。”

“这，恐怕不方便吧？”龔瑞眯起眼睛佯笑着說道：“兄弟不貪这点脚錢，那餉銀……”他盯着連长的小眼睛沒說下去。

連长站起来，低着头踱了两步，說道：

“好，痛痛快快，餉銀撥你三分之一”。

“有一半餉銀还不够您半生用度么？”龔瑞隱隱帶着些憤怒的口吻說道。

連長低着頭沒搭腔。龔瑞心想：“何必跟他費這些唇舌，明兒甩掉那押餉的二十幾個大頭兵，趁空砸了這小子，更干脆。”又一想：“离家远，沒有人就伴，半路碰上仨倆人，拾掇了我还不容易，与其人財兩空，不如少弄几百平安回家。不过，还得下点功夫。”于是，他伸了个懶腰說道：

“兄弟不稀罕這倆錢，明兒兄弟就回去。您請便。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兄弟本想帮您把太太、少爷接出来，看来也无能为力了。”兩人悶坐了一会儿，連長像大梦初醒似地說道：

“哼，走不了。还有这些兄弟們呢！”

龔瑞笑了兩声，压低嗓子說道：

“不劳您操心，明兒上山，走黑道，甩掉他們，烏合之众还不作鳥兽散。我常年拉駱駝还没有这两下子！”

“也罢，”連長把压在眉上的帽沿向上推了推，下了决心說，“餉銀平分，回去后你帮我在家眷接出来。”

第二天，他們向山里走去……。

就这样，龔家发了一笔意外的橫財。

从此，龔家的气势越来越大，敲剝穷人的心也越来越狠毒。看吧，寬敞舒适的深宅大院盖起来了，长工短工雇上了，牲口土地也一天天增加着。龔家兄弟再也不出去东跑西颠了，駱駝队有长工給拉，地有佃戶、长工給种，只要坐在

家里一盤算，就小囤滿、大囤流；誰家的地好，賊心一動，地就是龔家的了。

毒設陷阱

一九三〇年秋，天旱一連三個多月，滴雨未下，地里的白菜都焉了。富家的水車從東方亮直轉到西方黑，可是沒有井的窮人家怎麼辦呢？只有禱念老天，可禱念得嘴皮都裂了口，天上仍然沒有一絲烏雲。

一天下午，貧農劉廣榮從自己仅有的二畝白菜地里回來，皺着眉頭，耷拉着腦袋，連人喊他都沒有聽見。

“廣榮，我叫您呢。”龔敏迎上來，“白菜怎麼樣了？”

“干死了。”劉廣榮有氣無力地答道。

“年景不好，也是天意啊！”龔敏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連連搖頭，“唉，沒辦法，沒辦法。莊稼人不好過啊！”他吐了一口煙，扭頭對劉廣榮說：“要錢用不？廣榮，我還富裕點。”

“不，我不借你們的錢；借了也沒法還哪。”劉廣榮知道龔家的錢不是好借的。

龔敏眨眨眼睛，拍着劉廣榮的肩頭笑嘻嘻地說：

“沒關係，沒關係，還不還都一樣，您沒有，我還能逼着您要？咱倆爺們誰跟誰呀，我給您送二十塊錢去，先用着。”

晚上，龔敏把二十塊錢送到劉廣榮家里。

“夜貓子登宅，無事不來。”臘月二十三，龔敏來找劉廣榮了。劉廣榮一聽龔敏喊他，心里就一驚，連忙把龔敏讓到

屋里。

“广荣，年货备办得差不多了吧？我这年可过不去了，恐怕吃不上饺子。这就得瞧你的了。”龔敏进门屁股没落座就开了口。

“四爷，您是说那二十块钱？还得请您宽宽，这不，棒子面今天都没了。”

“能瞧着我过不去年，广荣？”

刘广荣知道脱不过去，就说道：

“四爷，您宽限几天，年底就是折卖家具，我也把那二十块钱给您送过去。利钱，您缓几天。”

“话不能这么说，将本求利，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谁不收利钱？”龔敏铁青着脸子说道。

“四爷，我实在没办法，有一点办法，我也就全还您了。”

“说破了嘴，我也是本利全收。不过，你也挺为难，我看不如把你那二亩园子地卖出去吧，不卖也荒了，今年就没收几棵白菜嘛。”

“四爷，我一家六口就指望那二亩祖业了。”

“嘿，你指望祖业，四爷指望什么？叫四爷一家过年喝西北风？”龔敏瞪着两只蛤蟆眼逼视着刘广荣。

“广荣，就依四爷，把二亩地卖出去吧。”刘广荣的老母亲深知龔家的为人，又一想，今年不还这笔帐，明年利滚利，这二亩园子也顶不了那几十块钱了，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龔敏一听这话，就忙着算起帐来，二五一十、三五一十五的，二十块钱就变成了九十块，二亩地才折了六十块，还

差着三十块。

“四爷，这三十块等过了年說吧！”刘广荣哀告地說。

龔敏一算計，明年再按三十块收利，倒滿合适；可是，明年刘广荣除了这三間土房还有什么呢？哼，还是一盘端吧。就对刘广荣說道：

“广荣，你年下也挺难的，我看不如把房子也卖了，换了錢还能买点东西，我这儿呢，也清了。”

刘广荣一听，就像数九天吞冰块，冷得渾身打顫，他忍了忍才說道：

“不行。咬着牙卖那二亩园地就够心疼的了，不能再卖房！”

“嗨，你真想不开，这三間土房不卖，还能吃着它，嚼着它？”龔敏說着又轉过脸来对刘广荣的母亲說道，“您瞧，要是卖了房，无債一身輕，痛痛快快过了年，再找个地方搬家，不是挺好嗎？再者說，眼下您的土房抵三十块，过了年，您就是卖十五块怕也沒人要，不是姓龔的，誰敢在东冉村买房置地？”

刘广荣的母亲流着眼泪对儿子說：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

“好吧，房子、地全不要了。”刘广荣用尽全身的力气，低沉地說了这句话。

龔敏脸上挂着一絲吃人的笑意，从皮袍里掏出一张紅紙放在刘广荣的面前：

……刘广荣因无力还债，愿将园地二亩、土房三间卖与龚敬敏。……上有苍天，下有黄泉，此后房地一切事宜均与原主无涉。

立契約人 刘广荣

龚敬敏

中 人 × ×

中华民国拾玖年夏历十二月二十三立

泪水遮住了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契上的字，刘广荣把颤抖的手指按在契上。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啊，可是，昨天还是有家有业的人，明天就得拖家带口地去要饭！刘广



荣转过脸去，两颗豆粒大的泪珠滚下来，屋里静得仿佛泪珠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只有窗外的寒风悲愤地嘶鸣着。

多少人家就是这样被龚家赶得无家可归，多少田地就

是这样被龔家强占了去。

敲詐盘剝

富家肥死狗，穷家餓死人。

日本鬼子来的这年秋天，刘广荣拖着一家七口，没办法生活，只好找龔敏去打短工，龔敏一口答应了：

“可以，明儿鸡叫头逼你来上工吧。”

“那，我家里吃饭……”

“甬提了，咱们老街坊、老哥们的，誰还能亏着誰？这样吧，你干一天活，就拿两块去用着，不够再来拿。”龔敏假笑着說道。

“四爷，棒子面一块八角一斤了，有信儿說就要涨到两块了。”刘广荣失望地說。

“哎，我给你这两块钱，够买一斤多棒子面，可以让全家煮粥喝。你知道，在三爷那儿扛活的外地人，倒是管他个飽，他可每天得交给三爷两毛菜钱。我对你够寬恩的吧？”

“不瞞您說，我家七口人，这几天就喝点从粥厂打来的稀粥；您的老玉米要是有暂时用不着的，我想借几斤。”刘广荣低着头說道。

“嘿，你拿什么还我？两只臭泥脚丫子能踩出老玉米来？我那点老玉米，連牲口都还不够吃呢。”龔敏沉下了臉。

刘广荣幸亏是臭泥脚丫子，沒借成龔敏的老玉米。人們都清楚，誰借下龔家的閻王債，誰身上就是压上一座山，早晚得把你压死。

一九四七年夏天，大地就像燃起了火，热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熾烈的太阳晒得龟裂的土地嘎嘎作响，庄稼全旱死了。

这样的年月，哪有穷人的活路呢！腊月二十几，贫农耿德新一家子几天水米没打牙了，小的饿得哇哇哭，老的急得围着锅台团团转。甭管怎么着，也得想法活下去啊。

那年，龔家的粮食都堆成了山。龔家門口拴着大狼狗，一蹦多高，铁链子哗啦哗啦地响，谁敢走近龔家一步呢？耿德新求爷爷告奶奶地才算进了龔家的大铁栅栏门。一进门，龔瑞叼着墨玉嘴的大烟袋就出来了，眼珠子一瞪，像要把耿德新吃掉似的，说道：

“你要借粮，敢拿利么？”

“三爷，有人在，您还怕跑了粮食不成？”

“一个月五分利，到时候少一颗老玉米粒，保公所也不饶你！”

耿德新借了三百斤粮。一回来，倒在炕上就落泪了：

“不是火烧眉头能借这样的债么！孩子他妈呀，孩子他妈，这债还得起吗？这不是要了咱们的命吗？”

过了年，还没到正月十五，耿德新就东扎一头，西扎一头，忙着把这四百五十斤债凑齐了。他推着老玉米刚进龔家門，龔瑞的眼睛就瞪圆了，冲着耿德新就喊起来：

“好小子，下回你还打算借三爷的粮食吗？”

“三爷，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那我问你，上次借的黄棒子，怎么还白棒子？三爷眼里

可不揉沙子！想打馬虎眼啊，沒門儿！你要还白棒子也成，但一百斤得多交十五斤的利息。”这样，耿德新又多拿了一笔冤枉粮。

龔家的債，不可借；龔家的活，不可做；龔家的地，也不可租。只要一沾龔家的边儿，这地头蛇就要吸尽你的血！

添租 佃

任怀苓刚从山东逃到北京时，靠給财主打鬃駝草过活。小伙子年輕力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了多少年，直到額上刻下了几条皺紋才攢下二百块钱，打算置二亩地。

龔瑞的耳朵真比黃鼠狼的还尖，早知道了任怀苓的打算，天天像条癩皮狗似的跟着任怀苓的屁股打轉，甜言蜜語地說：

“三哥，我有几亩地，你种頂合适了。天天往外跑，多不合算呀。你不是存下二百块钱嗎？我給你存着，啥时用你啥时取去；听说你盖房缺料，短什么有我接着呢。”

說的真比唱的还好听！任怀苓是个老实人，哪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心想：哪儿找这么好的人去呢？租給你地种，还帮你盖房。他就滿口应承了。

过了些日子，房盖好了，地也收拾得差不多了。任怀苓心想：这可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只要一交春，就开鋤种地，有的是力气，还怕地里不长庄稼么？

一天上午，任怀苓从地里回来，恰巧碰見龔瑞提着烟袋过来了，他就說了声：

“三爷，家里歇会儿去？”

但龔瑞連理都沒理，眼皮子一耷拉，一字一板地說道：

“老三哪，我的地要典嘍。”

任怀苓一听，心里扑騰开了，写了字，划了押，怎么又要典了呢？他吃惊地問：

“三爷，租約不是都写好了嗎？怎么又不租了呢？”

“写字？那是让你在这儿住啊！”

一听这话，任怀苓气得一句话也說不出来，他匆匆跑去找了中人。中人一听也急了：

“这老狗要涨租子！人家地还没鋤一下，怎么就涨租子了呢？”

但是，刀把子攥在龔瑞的手里，你能怎么样呢？还不是龔瑞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嗎？就这样，地沒鋤一鋤就涨了二斗租子。并重新写了五年的字据。

三年头上，地翻騰得可以了，白菜长得不錯。有一天，龔瑞到地里蹓躑去，一見地里的大白菜，就紅了眼，嘿嘿地笑着对任怀苓說：

“老三哪，白菜长得不錯呀，这回可要分你的紅利了。”

龔瑞回家連脚都沒落穩，一陣风似地就找中人去了，見了中人，劈头就是一句：

“我这几亩地可要典，典不出去我就卖！”

任怀苓听了中人的轉达，肚子都快气炸了，渾身哆嗦着說：

“好小子，你的心也太狠了！我刚把地养种好，你就典呀

卖呀的穷嚷嚷，要涨我的租子！”

“三哥，这年月，胳膊肘再粗也扭不过大腿去，地又不好租，我看你还是哑吧吃黄连，忍着这口气吧。”中人劝慰地说道。

地没种几年，租子就涨到一石二。

任怀苓心想：事不过三哪，这回该踏踏实实种几年地了吧。没想到吸血鬼龔瑞见穷人身上有油水好榨，哪肯罢休！

五年头上，任怀苓收了白菜以后，沟了几畦小葱，栽了十五畦黄瓜。他算计着，今年的收成比往年强，欠下的债该还还了。心里松了口气。

不料想，菜还没卖出去，龔瑞就上门来了。

“老三哪，我得涨租子。你吃肥了，也不能叫三爷挨饿啊！”龔瑞前脚进门，后脚还没迈门槛，就张开了嘴。

“五年的工夫，我二百块钱让你扣光了，还倒欠你的。我也豁出去了，苦，折给你龔三，菜，也折给你龔三。”任怀苓压着满腔怒火答道。

“啊，好小子！都折给三爷，你还欠着七百斤老玉米呢。你可放明白点，一个月不还，可是三百五十斤的利。”龔瑞恶狠狠地说道。

听了这话，任怀苓气极了，但他知道在那个世道，和这样的人是没法说理的，他下了决心，哪怕卖儿卖女也得还清这笔阎王债。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了几十块钱，托人到京北买了一千二百斤玉米，打算还给龔瑞七百斤，剩下的五百斤留家里自己吃。一想到龔瑞的大斗，任怀苓就发怵了，

一百斤老玉米頂多過出九十斤來。可自己又寬慰自己：多扣點就多扣點吧，還能把這五百斤全扣去？

萬沒想到，大車一趕進龔家大鐵柵欄門，就出不來了，一千二百斤老玉米，一粒也沒剩的，全被卸下來了！任懷苓聽人一說，心想：難道我光腳丫子的還貼你穿鞋的嗎？於是，他使足全身的勁，直奔龔瑞家。一邁進龔家的門檻，任懷苓就氣呼呼地沖着龔瑞喊道：

“龔三，你把糧食全扣下，讓我們一家子喝西北風是怎麼着？”

龔瑞醉醺醺地說道：

“真正豈有此理！你不知道漲小糧^①，小子？”

“我種你的地，跟你的糧漲小糧有什麼關係！”

“他媽的，三爺說漲就該漲！你說出個老天來也得漲！”

任懷苓真想揍這個吸血鬼，可是地主的武裝狗腿子在旁邊站着呢，哪容你動一動！

狼狽為奸

一九四三年，龔瑞當上偽保長。他為了給日寇效忠，就強迫全村青年練操。

一天早晨，貧農劉德成的兩個兒子對父親說：

“昨晚保長打發人告訴今兒練壯丁，我們今天還去不去做工？”

① 小糧：指放糧的利息。

“不去，家里几口人吃什么？今儿早晨就没有粥喝。饿着肚子，还练什么操？”刘德成说，“你们走吧，家里有什么事我顶着。”

儿子们走了。

早饭后，龔瑞坐在铁栅栏门内东屋的太师椅上，吸着那玉石嘴的长烟管，伪巡官姚轉品着香茶。刘德成跟着龔瑞派去的人进来了。

“二叔，宗杰哥儿俩怎么不去练操呢？”龔瑞笑咪咪地发话了，“你这样做不妥吧，啊？”

“这笑面虎，我得提防一二，一句话不对就麻烦。”刘德成想着，就小心地申述道：

“保长，家里揭不开锅，就等着他们小 哥儿俩 出去挣俩子儿呢……”

龔瑞示意地向伪巡官点点头。

“他妈的，还犟嘴！”姚轉一蹴茶杯，横眉怒目地骂道，“老浑蛋，真不知好歹。听我教训教训你，妈的……”

“巡官先生，”刘德成红着脸，转过头来打断了姚轉的斥骂，“有话好说嘛，您干吗出口伤人？我多少有点年纪了，您不过是个年轻人，您不好骂我。”

姚轉一拍桌子站起来，“妈的，骂你是好的，我还要打你这个老浑蛋呢！”说着，他举起了文明棍，照着刘德成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刘德成一闪身，文明棍打在他膀子上。

“有话好说，你怎么打人！”

文明棍又落下来，刘德成轉身跑到院里，姚轉追出来，龔瑞也跟着迈出門檻。

“二叔，练壮丁可不是儿戏……”龔瑞一边皮笑肉不笑地說着，一边向姚轉点头。文明棍像雨点般地落下来。

文明棍打在刘德成的腿上，折了。

“怎么样，老渾蛋？”姚轉丢掉半截文明棍，掏出手帕擦了擦汗，“米人，把他押到海淀西郊分局去！”

被打得渾身青一块、紫一块、皮开肉綻的刘德成，一瘸一拐地被押到海淀警察分局去了。

日伪时期，龔家和警察穿一条褲；国民党来了，还是这样。

一九四七年，楊春富典給龔玉富（龔寬的儿子）多年的二亩半园地，因无力贖回，被龔玉富强“买”去了。龔玉富又看上了楊春富园地上的两間园房，一定要“买”他的。楊春富說：

“园地給了你；园房不能卖。我一家子要飯吃，也得有个地方住啊。”

“由你。园房不卖，我也不强要。可是，园地是我的了，你不能在这儿住了。看你能把房子整个抬走？”龔玉富一甩袖子走了。

龔玉富天天催逼楊春富迁房。这天早晨，楊春富約了俩穷哥們帮着拆房。刚要动手，警察来了。

“喂，誰让你们拆的？报告派出所了嗎？”

“老总，拆自己的房还要报告？”

“天老子拆房也得报告，没我们批准谁也别想动。”

“那，我就去报告。”

“报告也白搭。龔爷要买嘛，不卖。自讨苦吃。”

伪派出所就是龔家开的，你报告也不批准，两个警察盯着，你拆房也拆不成。龔玉富随便给了俩钱，就把这两间园房拿过去了。

最后崩溃

就这样，龔氏父子靠着血腥的敲詐和剝削，家业越发越大，全家过着奢侈糜烂的罪恶生活。

看，龔瑞冬天身穿皮袄、皮裤、狐皮袍，头戴貂皮帽，二尺半的玉石嘴烟袋一架，就思谋着如何放债、收利、占地、抢房、勾搭女人；闲暇无事，留声机一放，麻将牌几圈；夏天，雪白的洋袜配着青呢便鞋，茧绸裤褂外罩纺绸大衫，吃罢四个菜的早饭，洋伞底下，摇晃着鹅翎扇，到地里蹒跚蹒跚，看看伙计们干活是不是卖命，瞧瞧谁家的庄稼长得好……。

龔瑞的大女儿结婚，陪送了綾罗绸缎的四季衣服，各种首飾、家具近十抬嫁妆。

一九四八年，龔家老太婆病重，筹备丧事，打算设灵堂、摆酒席、请僧尼念经、找吹鼓手奏乐，……大事铺张。

可是，走出龔家大铁栅栏门，你看，几十年来，在龔家地主统治下的东冉村，多少人家失去了仅有的几亩薄地，几间土房；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人家沿村乞讨，

远走口外；一把血、一掬泪，輩輩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正像《白毛女》里所控訴的：

“东家在高楼，佃戶們在收秋，流血流汗当馬牛！老人們折断了腰，儿孙們筋骨瘦，这样的苦日子沒有个头！”

不，这样的苦日子到了头！西山的枪声愈来愈烈，终于响起了憤怒的隆隆炮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人民含着热泪的欢呼声中，解放軍进駐东冉村。一九五〇年一月，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最終結束了龔家血腥的剝削史。

（李海泉 記。高 潮 图）

一九六四年 七月 廿 四日